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ILCDS)

通 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No.2

(2004 年 1 期)

策 劃 高田時雄 柴劍虹

主 編 郝春文

副主編 金滢坤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主辦

2004 年 6 月 · 北京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ILCDS) 通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

主編：郝春文

副主編：金滢坤

目 錄

- 1、今天，我們怎樣守護敦煌？……………柴劍虹(1)
- 2、2003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陳麗萍(4)
- 3、“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 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張小貴(25)
- 4、日本における最近 10 年間の古チベット語文獻研究……………岩尾一史(28)
- 5、明海大學和敦煌學研究……………荒見泰史(32)
- 6、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本に關する近刊二點……………辻正博(34)
- 7、讀《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劄記……………鄭炳林(38)
- 8、讀《李無虧墓誌銘》三題……………李宗俊(47)
- 9、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第六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要……………張涌泉(52)
- 10、敦煌研究院將舉辦“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張培君(53)
- 11、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問題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在昆明召開……………中國唐史學會秘書處 (54)
- 12、《甘肅考古文化叢書·佛教藝術》出版……………王義芝(54)
- 13、The introduction of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Jean-Pierre Drège (55)
- 14、《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介紹……………關尾史郎(57)
- 15、2003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陳麗萍(58)
- 16、稿約……………(80)

今天，我們怎樣守護敦煌？

——紀念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暨常書鴻先生百歲誕辰
柴劍虹（中華書局）

十年前，為恭賀常書鴻先生 90 華誕，我曾經寫了一篇題為《“敦煌守護神”的回答》的文章，先發表在《文史知識》雜誌上，後收入拙著《敦煌吐魯番學論稿》。當時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將常老在漫長的歲月中時時思考的幾個問題及我自己的體會簡略地告訴讀者：一、什麼是藝術家、學者的追求？二、如何把握人生的機遇？三、怎樣推進敦煌藝術的研究事業？常老以他既傳奇又平凡的一生出色地回答了這些問題，留給我們的則是無盡的思念與啓示。今天，作為“守護神”的常老雖已魂歸敦煌，而他所開創的敦煌藝術保護與研究事業正在不斷發揚光大、繼續前進，“怎樣守護敦煌”的問題時時擺在大家面前，要我們做出正確的回答。我想結合學習以常老為代表的“敦煌人”的精神來談談自己的粗淺認識。

一、正確認識敦煌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的深刻含義

從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到“敦煌學”作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的興起與推進；從千佛洞被遺棄於荒漠戈壁之中、珍貴文物遭劫掠流散到舉世公認為“世界文化遺產”；從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到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壯大，歷經百年滄桑，世人對“敦煌文明”的認識也經歷了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的過程。應該說，常老當時毅然決然離開“世界藝術之都”奔赴敦煌，最初主要是出於對敦煌藝術的強烈感受，及由此激發的愛國主義情懷；他到敦煌之後，從“巴黎蒙巴納斯的畫家”變為“研究、保護敦煌藝術的苦行僧”，面對藝術寶庫，遭受艱難困苦，遂又昇華為對“平民藝術”的熱愛與藝術家應為民衆服務的赤誠之情。在經歷了長期的保護、臨摹、研究工作之後，常老逐漸地領會了敦煌藝術的博大精深，認識到敦煌藝術是古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晶，是世界藝術瑰寶，因此守護它具有世界意義，這就在堅決摒棄民族虛無主義的基礎上，進而又旗幟鮮明地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劃清了界線。常老晚年，我有幸與他有過一些直接的接觸，雖然當時腦軟化的疾病已經影響了他的語言與思維，可我還是驚奇地從常老不多的言語中感受到他對敦煌藝術涵義的準確把握。他清晰地記得 50 年代對新疆與甘肅其他石窟的全面調查，指出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與研究敦煌藝術的多源性與更廣泛的意義。他行走已十分困難，而腦子裏依然活躍著從希臘到敦煌、從長安到扶桑的藝術傳播與交流的軌迹。他常用濃重的杭州方音說這樣一句話：“莫高窟不是哪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它是老百姓的寶貝；敦煌也不單單屬於甘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在日常接觸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常老對“吃敦煌”的“理論”與現象十分反感，可謂深惡痛絕：旅遊吃敦煌，出國吃敦煌，連攝影、畫畫、寫文章也吃敦煌——或是舍保護於不顧，唯以獲近利、小利、私利為重；或是保守資料，“奇貨可居”，視作個人“飯碗”。由此我想到，這些年來圍繞著文物保護、研究、開發、利用產生的大大小小的問題不少，往往是爭論歸爭論，做歸做，莫衷一是，實難協調。歸根結底是在“利益驅動”之下，對“文化遺產”的含義缺乏正確、統一的認識，使持“享受遺產，吃光用光”態度的人有了“用武之地”。

這些年來，在段文傑、樊錦詩兩任院長的努力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獲得了寶貴的國際支援（不僅僅是資金贊助，還有人員培養、專案合作），推進了事業的發展，這也符合保護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精神。但不可否認，也有少數人鑽了空子，違反規章制度，損公肥私。這是對敦煌文化的褻瀆，是一種“悖義”行爲，影響很壞。我聽說常老生前一直囑咐家人，他的畫除少數留給子女紀念外，要全部捐公，決不賣一張畫。尤其是他臨摹的敦煌壁畫與工

作筆記、調查資料等，是老一代藝術大師守護敦煌的歷史證物，也已經是寶貴的文物，應予珍惜。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想提出一個不成熟的想法與建議：作為“敦煌守護神”的常老，他也應該是代代相傳的“敦煌人”的代表，屬於敦煌，也屬於中國，屬於全世界；為了弘揚敦煌文化與敦煌精神，應該在莫高窟建立反映最全面、資料最完備的“常書鴻紀念館”（已捐在他處的可做複製品陳列）；國內外凡是對敦煌事業作出較大貢獻的人，也都可以在這個紀念館裏得到展示。勿庸諱言，在敦煌研究院 60 年的風風雨雨中，也糾結著不少的是非矛盾；常老非聖人，孰能無過？他者亦非足赤全人，焉得無錯？但是如果將其置於歷史大背景之中，放在守護人類文化遺產功與過的天平之上，捨棄個人得失恩怨，著眼大局，放眼將來，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與評價。

二、用科學發展觀來推動敦煌事業的不斷前進

守護決非守成護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守護的觀念、方法自然會不斷地得到更新。由於年齡與身體的關係，常書鴻先生在 80 年代退出了第一線，儘管他一如既往關注著敦煌，也不可能再參與一些具體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新的觀念與方法的實施，乃至新材料的發現與利用，都要靠繼任者與年輕人來做。事實上，敦煌研究院這些年來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可以告慰常老於九泉之下。然而，也應當承認，如何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敦煌事業的問題，常老在位時，不可能提到議事日程，今天也還有待於進一步明確與落實。

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容是均衡、可持續的發展與以人為本、以創新為動力的發展。首先需要說明，均衡發展並不是五個指頭平攤用力，而是指輕重緩急的科學搭配，使之結構合理。對於莫高窟來講，文物的安全存在是發展的基礎，因此保護始終應該放在第一位。過去有人指責常老只知道清沙整洞子，只抓臨摹，不搞研究，耽誤了研究人員的青春前程。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如果不重視保護，洞窟出了問題，藝術瑰寶失去了光彩，才是最可怕的。維護好才能研究好，這是大道理，用而不養、急功近利是一種短視行為。過去關於張大千先生剝離敦煌壁畫的是非之爭，其實道理不辯自明。（順便提及，國家不同意近期發掘秦始皇陵與唐乾陵，原因也在此。）這些年來，國家文物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在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上花了大氣力，加上國際間合作的加強，科技手段的進步，保護的條件與過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新的問題、新的矛盾也十分突出。比如隨著旅遊事業的大發展，每年到敦煌參觀遊覽的人越來越多，帶來的洞窟及周圍環境的惡化便不可小看，直接影響了敦煌各項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又如用真文物、真環境拍攝影視作品的問題及造假文物進行炒作的問題也常令院領導頭疼。敦煌研究院有好多部門，各有分工，各有側重，無論駐守敦煌還是蘭州，都應該圍繞與配合保護這個中心工作。我知道常老生前對千佛洞環境的變化就十分關切，他抓緊組織臨摹壁畫也有保護的目的。樊錦詩院長也為莫高窟能否長期完好無損而憂心忡忡，所以特別加大了保護的力度。這裏，我還要提出進一步加強敦煌研究院資料庫建設的建議。一是敦煌洞窟資料，應該以採用現代科技手段的數據化圖像資料為主；二是敦煌文獻資料，應該進行科學的圖書、檔案管理；三是相關的中外研究成果資料與參考、輔助的傳統典籍資料。這三方面的資料缺一不可，應該是相輔相成的。莫高窟是敦煌學的發祥地，應該成為全世界最權威、最完備，結構最科學，而且使用最方便的敦煌資料中心。這也是保證敦煌事業能均衡、持續、有效發展的重要條件。

開展敦煌研究的以人為本，我體會是一個目的、兩個層面。常老經常強調：“敦煌藝術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敦煌文明，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創造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結晶，屬於全人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然也應該繼續造福於全人類。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從事敦煌文物保護與研究的人，首先要樹立“人文關懷”的態度並付諸實施。這種關懷，是兩方面的，一是要為每年數以十萬計的來敦煌參觀、考察的人著想，為他們看好、看懂創造條件

（比如提供簡明易讀的參觀指南、在介紹洞窟基本內容的同時宣講最基本的敦煌歷史文化知識與文物保護知識等）；二是為常年在莫高窟工作的同志改善工作、學習與生活條件，尤其是在業務進修方面，院領導也下了大決心，這是培養人材的重要環節。我記得有一次常老在回憶敦煌藝術研究所創建的艱難時，也曾十分真誠地自責對年輕人生活與學習關心得不夠。他說：“那時有一股勁，光號召當‘拼命三郎’，忘記了長期奮鬥既要有好身體，又要不斷充實知識。”敦煌研究院成立後，各方面的條件都有了大的改善，但相對而言，在窟區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苦，尤其是對剛從大城市、從大學校園來的年輕人來說，鍛煉與關懷並行不悖。此外，以人為本還有另一層不可輕視的意義：只有讓更多更廣的人真正認識與理解了敦煌文化的價值，才能自覺地將守護敦煌文物當作自己神聖的職責，改被動的“防治”為主動的“維護”。我們常常感慨：當年美國人華爾納企圖再次劫盜敦煌壁畫、彩塑，是敦煌的民衆自發拿起鋤頭、木棍把他趕跑的。如果今天能通過深入人心的宣傳教育工作，激發出這樣的覺悟，我們的文物保護就會事半功倍。這些年來，我們的文物保護加大了“物”的投入（包括新科技手段），而比較忽視“人”的提升（包括人文素養的培育），這是應當改進的。六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談文物類圖書優化結構的短文，談到應該加大出版普及文物知識圖書的出版力度。文中舉了一個例子：文物出版社1959—1978年間曾印行敦煌藝術類小畫片30種25萬多套，每套定價在0.50元—3.00元之間，平均每張五六分錢。現在此類畫片早已絕迹，代之而起的是價格越來越昂貴的精美大圖錄。普及文物知識是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礎，也是加強全民保護意識的前提。還有展覽問題，也是普及文化知識的重要手段。這五六年，敦煌研究院為此作了很大努力，在京、滬等地舉辦的敦煌文物、藝術展引起很大反響。我建議今後的展覽應增添敦煌文物與周邊環境保護的內容。

敦煌研究的創新，是常老十分關注的一個話題。他在晚年，經常提及自己有許多沒有做完的事，有沒有實現的夢想。他這樣回答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為人，我還將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繼續做，並非簡單重復，而是在新的條件下不斷創新。例如常老一直夢想恢復敦煌壁畫原有的絢麗色彩，今天已經在運用電腦技術由研究院與浙江大學合作實施。又如採用數據化技術來儲存與複製洞窟內容，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今天也逐步變為現實。這幾年有人認為，敦煌學歷經百年，無論洞窟藝術還是藏經洞遺書，都公佈得差不多了，要出新成果就得有新材料。其實，新材料固然重要，已有的資料還遠遠沒有研究透，隨著觀念的改變，理解的加深，方法的更新，手段的進步，加上相關學科新成果的啓示與促進，會有許多新課題擺在我們面前。這幾年，北京的學者特別關注“敦煌學史”的問題，還為此召開了專題的國際研討會。與此密切相關的，莫高窟環境變遷史，敦煌物物流散史，敦煌文物保護史，敦煌文化交流史，敦煌宗教史，以及學界久議未決的藏經洞性質與封閉原因等等，都有待我們去研究。我認為，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新觀點、新成果，都應歸結到體系的創新。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要呈現嶄新的面貌，“敦煌學”應該建立起自己獨特而完備的學科體系，這是常書鴻先生等老一輩夢寐以求、為之畢生奮鬥的志向，也是我們這些後輩學人努力的目標。今天，只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們守護敦煌才會更有信心、更有辦法、更有成效。

2003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陳麗萍 (首都師範大學)

2003 年中國大陸地區的敦煌學研究, 在 2002 年的基礎上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據我們不完全統計, 本年度國內公開發表相關論文 573 篇, 出版與敦煌學相關的專著 42 部。論文總數明顯多於去年, 除了三家敦煌學專業期刊及國內各家雜誌的刊登外, 本年度有不少專著是近年一些敦煌學會議的論文集出版, 在內容上不僅比較集中地探討了一些專題問題, 數量也增多了。

本年度比較重要的敦煌學論文集有: 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分歷史文化卷(上、下)、石窟考古卷、石窟藝術卷出版(甘肅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集中展現了 20 世紀以來敦煌學研究在這幾個方面的較高成就。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7 月), 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繼《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後, 對該課題延續研究的成果彙集, 收錄已公開發表過的相關論文 37 篇, 主要包括歸義軍時期敦煌及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官制、民族研究等幾個方面的內容。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 全書分為背景介紹、兩關研究和敦煌學概論等三個部分, 收集自 1943 年以來有關“兩關”研究的舊說新論共 45 篇。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潘重規教授九五華秩並研究敦煌學一甲子紀念》(巴蜀書社, 2003 年 3 月), 該文集彙集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的論作 46 篇, 全書以對敦煌文獻研究為主, 兼及宗教、民俗等方面。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文集以對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為主, 以及對三位先生學術生涯回顧的紀念文, 共計 22 篇。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也有部分敦煌石窟及宗教研究的文章。

現將 2003 年度敦煌學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分為: 概說、歷史地理、社會、宗教、古籍、科技、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考古與文物保護、藝術、語言文字、文學、學術動態與紀念文、敦煌學數據庫建設等 12 個方面, 擇要簡介如下。

概 說

本年度對敦煌史地、宗教、文化、文學以及敦煌學整體發展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回顧並展望今後發展方向的文章: 如朱雷《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民間講唱文藝作品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紀的展望》(《新世紀敦煌學論集》), 從斷句、專有名詞、判斷寫作年代等五個角度出發, 考察敦煌講唱文學的底本, 指出只有多學科、多視角的考察, 才能更加有力、全面地發現和利用這批文化遺產, 從而各學科也可得到“互補”、“互利”的結果。馬德《以史論窟以窟證史——談敦煌石窟與敦煌文獻的結合研究》(《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上》), 通過石窟材料與文獻材料得互證舉例, 說明石窟與文獻結合地研究, 是今後敦煌研究的主要方向。劉正平《國外敦煌學及敦煌佛教研究概述》(《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 期), 敦煌文書面世後, 改變了國外漢學的研究面貌, 對文書中大量佛教文獻的研究, 是敦煌學與漢學研究的特色, 也因此造就了一批聞名學界的域外敦煌學家和漢學家。該文還探討了國外敦煌學與敦煌佛教研究的關係。楊際平《敦煌出土文書與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上》), 指出敦煌出土文書在經濟史研究的領域, 促進了對古代社會經濟制度和生產生活狀況的研究, 也取得了許多的成績, 今後的研究方向是應該更深刻地挖掘這批原始材料中的經濟史信息。李鴻恩《從中文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敦煌學的發展狀況與趨勢》(《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上》), 以文獻情報學理論為基礎, 運用數理統計等分析方法, 對敦煌學學科研究中的各項內容分析、評價後認為: 敦煌學研究在經過早期的個人研究階段後, 作為一門學科研究, 已經步入正軌。如今, 學術會議是促進文獻研究及交流的有效手段; 而有關學科基礎理論研究, 仍然是一個薄弱的環節, 今後應加強; 還應加強文獻資料工作, 提高文獻利用率。

敦煌文獻所指不僅包括藏經洞出土文書，還有大量的漢代簡帛文書，它們都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原始材料。就敦煌文獻與其他地區歷史文獻的比較，它們的研究價值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對這些原始文獻價值的認識有：顏廷亮《關於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問題》（《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認為四大文明彙集之地的敦煌，它與更多接受了外來文明的西域文化模式是不盡相同的，敦煌文化更多的是中原文化圈的西陲屏障和堅實存在。張德芳《簡論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敦煌陽關玉門論文選萃》），指出懸泉漢簡中保存了大量郵驛資料、西域各國使者往來的記錄、關於羌人活動和羌漢關係的簡牘，對秦漢郵驛制度、絲綢之路貿易和漢與西域的關係以及羌族史的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血液。范開宏《敦煌遺書及其價值淺說》（《山東圖書館季刊》2 期），認為就研究價值而言，敦煌遺書推進了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學、方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

本年度敦煌文獻整理的成果較多，專著如：《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9-24 卷相繼出版，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二、三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7 月）出版。王昆吾著《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3 月），全書由 13 篇學術論文合集而成，分敦煌學、音樂史、中國文學、越南與東亞文學等四個方面，探討以敦煌學為契機的中國古代文明對海外漢學的影響。

對敦煌文獻整理的其他成果有：周義釁《對敦煌學文獻歸類的探討與研究》（《河西學院學報》4 期）基於對敦煌學的認識，探討這一交叉學科的文獻歸類，從敦煌學的定義、概念以及分類實踐加以分析，對涉及一般敦煌學、領域敦煌學（敦煌宗教、敦煌文學、敦煌史地、敦煌藝術等）的文獻在《中圖法》中的歸類作了辨析。葉貴良《〈甘肅藏敦煌文獻〉殘卷未識原因初探》（《敦煌研究》4 期），認為歸類不當、原本失傳、屬雜贗品、失之考證、字迹難認等原因使得甘藏敦煌文獻還有 30 餘個殘卷有待識別。該文識別出了 8 個卷號，其他則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有關敦煌文獻得辨偽研究：朱雷《敦煌研究院藏〈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真偽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從典籍缺載、告身原式已佚、書法格式等五個方面推導證明《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非張大千的偽作。徐曉麗、鄭炳林《讀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兩件敦煌文書劄記》（《蘭州大學學報》2 期），刊佈了收藏於臺灣地區的兩件敦煌文書，並對這兩件文書的年代、價值等問題進行必要的探討。其中《辛酉年（901）歸義軍都押衙曹光嗣牒》揭示了 901 年二月唐朝中央向敦煌派出一個使團及其歸義軍政權迎接使團的安排。而《河西節度使道場文》則反映張議潮收復河西率領的六軍中有九姓胡軍可能就是張氏歸義軍時期以粟特人為主建立的軍隊。鄭炳林、徐曉麗《讀〈俄藏敦煌文獻〉第 12 冊幾件非佛經文獻劄記》（《敦煌研究》4 期），對沒有定名的 8 件文書殘片進行了定名與拼接，並探討了相關問題。其中 $\text{P.}06041$ 定名為《武則天為父母寫經發願文》與另一編號 $\text{P.}01042$ 可拼合，與同樣內容的 $\text{P.}4621$ 、 $2386d$ 的抄本雖不是同一寫本，但應寫於同時同地。 $\text{P.}06031$ 定名《沙州上都進奏院上本使狀》，其內容與格式與 $\text{P.}3547$ 基本相同。 $\text{P.}06007$ 定名《作坊使宋文暉副使安再誠煎膠請大釜狀》， $\text{P.}06036v$ 定名《吐蕃瓜州節度使上悉列夕亡五七建福文》，從該卷中可以得出大雲寺在敦煌城東。 $\text{P.}05988$ 號與 $\text{P.}2555$ 號《寶吳為肅州刺史劉臣壁答南蕃書》可以拼合，應為當年人為的分裂所致。 $\text{P.}06059$ 、 06019 號是《新集文詞九經抄》第 105-124 條的內容，與俄藏其他 6 個卷號如 $\text{P.}2153$ 號等可以拼接，他們是一卷分裂為幾，是敦煌文獻的一種新抄本。 $\text{P.}05474v$ 與 $\text{S.}6341$ 可以拼合為完整的《張議潮咸通二年（861）收復涼州並批答》。高啓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 期），是對《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期非佛經文獻的輯錄，共 139 件，作者盡可能的與文獻做出清楚的校錄。

回顧敦煌學史，離不開對相關人物的評價。施萍婷《敦煌學雜談之一》（《敦煌研究》3 期），首次全文發表田中慶太郎 1909 年在北京會見伯希和及參加北京部分學者為伯希和舉行的宴會、他見到敦煌寫卷的原始記錄。張弓《羅振玉與敦煌典籍研究——20 世紀敦煌典籍研究回顧之一》（《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榮新江《狩野直喜與王國維——早期敦煌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敦煌學輯刊》2 期），在早期敦煌學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國的王國維兩位先生之間的學術交往，可謂一段佳話，值得我們今天回味，也為我們今天發展中日學術交往樹立了楷模。王冀青《榎一雄與英藏敦煌文獻攝影——紀念榎一雄先生誕辰九十周年暨英藏敦煌文獻縮微膠卷攝影五十周年》（《敦煌學輯刊》2 期），回顧榎一雄於

1952—1954 年逗留英國倫敦期間，促成大英博物院和日本東洋文庫合作，為英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拍攝了縮微膠卷的經過。榎一雄回國後，大英博物院又為東洋文庫陸續補拍了未刊的斯坦因文書和文書殘片。這套縮微膠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敦煌學發展的基礎。本文披露了榎一雄和東洋文庫設法拍攝英藏敦煌文獻的前後經過，以及東洋文庫整理這套縮微膠卷的早期成果。樊錦詩、蔡偉堂《奧登堡敦煌資料的價值》(《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奧登堡在敦煌考察期間所做的筆記與圖片資料，對了解上個世紀初期敦煌莫高窟德整體概況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日]茂木雅博、孫曉崗《中日關於華爾納的評價》(《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介紹了華爾納剝離敦煌壁畫的數量與類型，作為文化遺產的破壞者，中國人對他的評價是譴責。日本人因為當時文化的侵略觀念所致，竟大肆鼓吹他的“功績”。以及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險與中國文物的外流》(《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馮志文《論王道士及其有關的人和事》(《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

20 世紀初期西方探險家在華的活動以及掠奪敦煌文物的話題依然在討論與反思中延續：孫聞浪《20 世紀：西方列強掠奪我國文物知多少》(《文史春秋》2 期)，20 世紀西方列強瘋狂掠奪我國文物的包括有甲骨文、敦煌藏經洞、吐魯番文書、晚清珍貴檔案……我國的文明遺物，橫遭貪婪的掠奪和野蠻的破壞，實在令全體炎黃子孫痛心疾首與無比憤慨。郝春文《如何評價 20 世紀初期外國“探險”隊在敦煌的活動》(《文史知識》5 期)，認為對上個世紀初期蜂湧而來的西方探險家在華活動的評價，當然要看到他們所做造成對我國文物破壞及流失造成的惡果，但他們在不同地區或領域的新發現或發掘活動，以及他們所做的相關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周勁思《斯坦因與敦煌文物的流失》(《華夏文化》3 期)，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及文物流失史，英人斯坦因可說是將敦煌文物帶進世界舞臺的最早、最重要的人物。斯坦因的敦煌探險直接導致了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自他之後，經過法、德、俄、日等國探險隊或考察隊的巧取豪奪，使大部分敦煌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此舉令中國人痛心疾首。但斯坦因卻因給大英博物館帶回了大量珍貴的敦煌文物以及東方學、考古學上的貢獻而被英國封為爵士。對英國而言，他當然是有功之臣；對中國而言，他是文化強盜。姜洪源《中華文化肌體上的傷痕——華爾納盜掘敦煌壁畫》(《絲綢之路》6 期)，揭露當年美國探險家如何用卑劣的手段掘取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以及其他盜取中國文物的行徑。姜洪源《俄殘軍安置敦煌莫高窟的經過及史實訂誤》(《檔案》6 期)，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一支 900 餘人的沙俄殘餘勢力於 1920 年 9 月逃竄到中國新疆省。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恐日久滋事，將其中原沙俄七河省軍區中將司令阿年科夫及所部 469 人遷往甘肅。甘肅督軍陸洪濤將這支殘軍安置在甘肅敦煌莫高窟，阿年科夫所部遷居敦煌莫高窟後，他們對敦煌石窟的破壞也隨之開始。

歷史地理

本年度敦煌歷史研究的單篇論作主要有：袁延勝《也談〈過長羅侯費用簿〉的史實》(《敦煌研究》1 期)，認為 2000 年《文物》第 5 期刊載懸泉漢簡《過長羅侯費用簿》釋文所記的開支帳目，實與神爵二年常惠奉命使烏孫迎取聘禮之事無關，而是西漢政府為打擊匈奴、安定西域，派長羅侯增兵西域時路過懸泉置的開支帳目。孫繼民《S. 11453 與 S. 11459 文書的初步考察——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之一》(《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對以上編號的瀚海軍文書進行了過錄，並認為可將它們分為五組，時代都屬於唐開元年間。這五組文書又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為文書牒尾，一類為牒文事目和勘印的登記賬歷，還有一類是請印牒文的登記和處理賬目。葉愛國《〈過長羅侯費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 期)，指出諸家定名的不妥之處，認為應將該漢簡定名為《懸泉置接待長羅侯等支出簿》。錢伯泉《墨離軍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1 期)，考察了瓜州墨離軍軍名的來由，認為是“墨離”是吐谷渾語“狼”的意思，初設時期的墨離軍以吐谷渾人為主體，歸義軍時期的瓜州，因為吐谷渾人勢力的龐大，墨離軍的軍政也由吐谷渾貴族慕容家族把持。

本年度歸義軍史的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的出版，使相關課題的研究呈現集中化的現象。除了《續編》所載的專文以外，還有：王豔明《瓜州曹氏與甘州回鶻的兩次和親始末——兼論甘州回鶻可汗世系》(《敦煌研究》1 期)，認為曹氏政權與甘州回鶻政權兩次和親的可汗分別是天睦與仁美，曹議金娶天睦可汗女，為曹氏政權立足瓜沙兩州創造了條件。嫁女

與仁美可汗的第二次和親，則使歸義軍政權徹底擺脫了甘州回鶻的控制，為兩地間贏得了長期相對和平的社會環境。[日]森安孝夫著，梁曉鵬譯《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官印及其編年》（《敦煌學輯刊》1 期），將敦煌文獻所見歸義軍節度使的官印按其所屬主人進行了排序，兼以梳理了歷任節度使的歷任官署。鄭炳林、徐曉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多妻制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4 期），指出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多妻制的出現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吐蕃統治敦煌以來存在的多妻現象；二是歸義軍節度使通過多妻制達到與敦煌各個大姓之間聯姻，以維護自己政權的目的地。從張議潮、張淮深到曹氏歸義軍的曹議金等，都採取多妻聯姻。歸義軍時期敦煌百姓中多妻是一種普遍現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為彌補因戰爭導致的性比例失調、人口銳減等採取的一項補救措施。

本年度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主要涉及農業管理、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商品交換等幾個方面。王克孝、閻廷亮《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手實文書的編制與類型》（《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認為唐代手實文書的編制，其涵義、內容有特定的要求。依據現有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梳理，其編制程式大致可分為四個步驟，因唐代後來廢除了鄉長，所以編制手實由里正負責。耿虎《也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和長安三年括戶——與孟憲實先生商榷》（《歷史研究》1 期），大谷文書 2835 號是一份研究唐代括戶的重要文獻，由文書來看，敦煌縣在長安三年括戶中的態度是積極的，李嶠有關逃戶對策的變通性建議在此次括戶中也被部分採納。逃戶的原籍地政府與逃戶的寄居地政府，對於不同括戶政策的態度很不一樣：大地主在政府括戶時的特別動向，主要不是表現在言論上，而是表現在行動上；逃戶的發生會影響到原籍地的租稅，而逃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是土地問題而非括戶政策本身。劉進寶《再論晚唐五代的“地子”》（《歷史研究》2 期），對學界“地子”即“地稅”的說法進行了再討論，認為地稅的範圍更廣，地子的範圍則小；地稅除地子外，還包括官布、稅草、稅柴等內容；地子是據地交稅，故而原則是由于土地擁有者所交，而非僱傭者。劉進寶《敦煌歸義軍賦稅制的特點》（《南京師大學報》4 期），敦煌歸義軍政權實行據地出稅的政策，其地稅主要包括地子、官布、稅草和稅柴。由於歸義軍實行請田制度，不僅賦稅的徵收完全以土地為據，就是部分差科的徵發也以土地為據。賦稅主要以鄉為單位徵收。歸義軍政權的賦稅制度既與中原王朝的制度有一致性，也有自己的創造和變通，但在發展趨勢上卻與中原王朝相一致，由此可以從一個側面認識唐後期五代宋初經濟制度的演變。金聖翰《唐代均田制下寬鄉的給田基準額》（《中國史研究》4 期），合理說明為何敦煌戶籍文書採用寬鄉受田規定，而吐魯番戶籍文書採用狹鄉受田規定。據此，在寬鄉敦煌，考慮到均田制限田功能，不免出現均田農民之間田土已受率的差別。依據這種差別否定均田制施行是不符合事實的。鄭炳林、徐曉麗《論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中國經濟史研究》2 期），指出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上從事商業貿易的既有兼具國際貿易性質的粟特人，也有從周邊政權及中亞波斯印度中原等地出使敦煌的商團。為此歸義軍政權專門設立了宴設司機構接待外來使節，同時敦煌還往這些地區派遣具有商業貿易性質的使團進行中轉貿易。敦煌出產貧瘠，但是市場上外來商品豐富。用於交換的貨幣有金銀錢幣、金銀器皿和絲織品等，這些東西具有質輕價重、便於攜帶。因此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具有國際貿易市場的性質。乜曉紅《從吐魯番敦煌雇人放羊契看中國 7—10 世紀的雇傭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 期），認為同是七世紀高昌時期的雇傭契，但是同時期的敦煌和吐魯番地區所表現的雇傭關係並不相同，一種是帶有承包責任形式的雇傭，一種純屬雇工、出賣勞動力；到後來十世紀，承包性越來越大了，勞動者在身份、地位上有更多的平等性；在經濟收穫的分配上，交付的東西是定額物，勞動者有比較大的自由。從契文內容分析比較，十世紀比七世紀有了一些進步，人身奴役性的雇傭成份在減少。杜建錄、吳毅《西夏手工工匠考》（《寧夏大學學報》4 期），指出西夏手工工匠種類齊全，分工細緻，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業發展的狀況與特點。如畜牧業發達，與之相適應的氈匠、毛錦匠、鞍匠等便應運而生。由修建寺院裝飾佛窟而興起石匠、塑匠、畫匠、壘匠諸行業，並經久不衰。敦煌等地自唐五代以來就種桑養蠶，故有絲織業諸匠的出現。

李正宇《敦煌歷史地理研究百年回眸》（《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介紹了敦煌歷史地理研究的概念、意義和由來，回顧了相關研究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取得的成績，最後認為，就敦煌學得各個分支的研究，歷史地理研究起步較早、成果豐富、體系充實，現在的研究是建立在成熟的研究方法與體系基礎上的，這對於百年敦煌歷史地理研究而言，既是一個好的總結，也是一個好的開端，預

示著以後研究更廣闊的前景。本年度有關敦煌沿革地理的研究有：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刊載了大量的論著，限於篇幅，就不一一舉例了。李并成《魏晉時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縣城考》(《敦煌研究》3 期)，作者數次勘察了位於安西、敦煌交界處蘆草溝古綠洲北部俗稱“巴州城”的古城移遺址，該文對所見古城址的殘狀、遺物等作了整體介紹，再依史書與敦煌文書所記，認為該城即曹魏屬敦煌郡，西晉改屬晉昌郡，北周所廢的伊吾縣城。朱悅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圖經〉纂修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敦煌研究》5 期)，對 P. 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的避諱特徵、書寫格式、文書中所涉及之沙州昇都督府的時間、驛路置廢的時間、西州岸頭府等軍政機構名稱、人名結銜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史事分析，就圖經的詳細編纂、添修時間做了一個盡可能細緻的考查。認為《沙州都督府圖經》自永徽二年以後在《沙州圖經》的基礎上歷經武周直至開元初，按照律令始終不斷地修纂。李并成《東漢中期至宋初新舊玉門關並用考》(《西北師大學報》4 期)，指出伴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及其路線的變化，玉門關關址有過幾次改徙。徵引敦煌遺書及有關史料，結合實地考察，發現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七(74 年)玉門關從敦煌西北故址東遷後，直到五代宋初，在新關址設立使用的同時，敦煌西北的故址並未廢棄，仍在中西交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新舊關址並用不替。艾沖《唐代河西地區都督府建制的興廢》(《敦煌研究》3 期)，考察了唐代涼州、瓜州二州都督府治所、轄區的歷次變動，而河西二府職權擴大為監督遷入其境之吐谷渾、鐵勒、西突厥及九姓胡人和唐廷特授的軍事專制、處理其他專項事務之權。趙貞《敦煌所出靈州道文書述略——兼論朔方韓氏對靈州道的經營》(《敦煌研究》4 期)，指出敦煌通使中原文書中所出現的靈州道，可證歸義軍時期靈州道對於維繫兩地之間聯繫的關鍵意義，韓氏家族把持靈州 40 年間的所行的措施，對保證中西交通的通暢起了有益作用。李并成《盛唐時期河西走廊的區位特點與開發》(李孝聰主編《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8 月)，指出盛唐時期敦煌是中西交通的主脈、民族交往紐帶、遮罩關隴、經營西域的基地，這些都是敦煌當時所具有的區位特點。

本年度對敦煌及周圍地區古代自然環境變遷的研究有：李并成《敦煌學與沙漠歷史地理研究》(《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認為敦煌學之歷史地理研究，不僅可以恢復數千年前河西地區的地理風貌，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原始史料，研究歷史上的沙漠化問題，對於今天沙漠化的防治和綠洲的開發，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借鑑意義。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 期)，對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的破壞狀況，作了細緻的探討。史實表明，早在河西漢代大規模開發始，因大量用作薪柴、飼草等，這一破壞即已發生。且危害匪淺。迨至唐代、西夏破壞更趨嚴重。及至明清伴隨著河西更大規模的開發，綠洲邊緣荒漠植被遂被更大面積的砍伐、采挖，由此引發更為嚴重的沙漠化過程。研究歷史上荒漠植被的破壞，可為今天西部大開發中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李并成《敦煌文獻與西北生態環境變遷研究》(《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敦煌文獻對唐宋時期敦煌、河西生態環境的狀況、祁連山區植被破壞與演變、綠洲邊遠旱生固沙植被的破壞與演變、綠洲沙漠化、古代物候資料的整理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侯仁之《敦煌縣南湖綠洲沙漠化蠡測——河西走廊祁連山北麓綠洲的個案調查之一》(《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將歷史文獻記載的南湖地區過去與其現狀進行了比較，相應推測出了當年的水草之地和今天的沙漠化地帶之間的變遷。

社 會

本年度對敦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論著有：法國學者童丕著，余欣、張建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03 年 2 月)，全書通過分析敦煌契約文書的書式及借貸機制，從而展示了敦煌古代社會所有的糧食作物種類，旅行與貿易活動等中古時期敦煌百姓的社會活動。

有關敦煌百姓社會生活概況的研究：毛漢光《敦煌吐魯番居民生存權之個案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為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敦煌吐魯番居民，他們的生產技術引自中原內地，其經濟發展是追隨中原農業的步伐的。當地的商業不是本地財富的積累一定程度的商業，而是中西交流的商業。郝春文《〈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幾個問題〉商榷》(《中國史研究》1 期)，指出唐五代時期敦煌的巷社並非官社，而是純粹的私社，官社雖然存在，但由於材料太少，很難做明確、具體的說明。敦煌的社邑雖是以各階級、階層混

合結社為主，但按階級、階層結社的現象也確實存在。依據具有實用性質的敦煌社邑文書進行量化研究，敦煌社邑的活動是喪葬互助活動最為頻繁，也最為重要；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動的頻率大體持平，亦均屬社邑的重要活動。蘇金花《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國經濟史研究》2 期)，認為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僧侶的社會生活已呈現出強烈的世俗化傾向。他們既隸屬僧籍又挂名俗籍，與世俗家庭依然保持密切的宗法和經濟聯繫，可以相互繼承財產和代償債務。僧人基本脫離了寺院的集體生活，多與妻兒姊侄共居同活，並象普通百姓一樣參加傳統私社。僧人名姓也多帶俗名俗姓。這些變化，是佛教寺院集體經濟和僧侶個體私有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世紀中國寺院僧侶生活世俗化的具體反映。

本年度有關敦煌法律文書輯涉及到的民事糾紛研究較多：李正宇《敦煌遺書一宗後晉時期敦煌民事訴訟檔案》(《敦煌研究》2 期)，對 P. 3257《後晉開運二年(945)寡婦阿龍訴訟案卷》的原件重新過錄，並就案卷在我國法學史、檔案史方面的價值意義進行了探討。該案卷內容之完整無缺、編排之合理有序，在我國檔案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陳永勝《後晉開運二年(945)寡婦阿龍地產訴訟案》(《蘭州大學學報》2 期)，對 P. 3257《後晉開運二年(945)寡婦阿龍地產訴訟案》的內容包括土地制度、民事訴訟中的變更之訴、證據制度及契約效力等法律制度，為我們進一步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深刻體察其特徵提供了佐證。鄭顯文《唐代債權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師大學報》1 期)，指出在唐代的法典及現存的敦煌契約文書中，有一些契約中具體的債權保障措施，即由雙方當事人制定契約，當債務人拒不履行債負時，通過訴訟等手段對債務人給予刑事懲罰；在契約中設定條款，通過國家機構強制牽掣債務人財物來實現債權；針對債務人無力清償到期債務，實行役身折酬的辦法，以力役折抵債務；責成債務人提出擔保；當債務人無力履行債務時，由擔保人代償等。上述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債權人的利益，維護了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對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有益的保障作用。陳永勝《敦煌寫本〈寅年令狐寵賣牛契〉中的瑕疵擔保制度》(《甘肅政法學院學報》3 期)，認為 S. 1475 號文書是對《唐律疏議》有關契約立法的民間實踐。這件買賣契約文書以生命物為標的，約定了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及瑕疵擔保規則，對進一步完善現代中國民事立法有重要啓示作用。

本年度對敦煌古代婚姻文化及女性問題的研究有：黃正建《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為敦煌文書中涉及婚嫁的有兩類，一類是《曆日》，還有與其他占卜術雜抄在一起的文書。它們既有用於擇日的，也有用於合婚的。該文主要介紹了婚占文書的本身，並結合唐五代有關占婚嫁的記載探討了當時敦煌婚占的實際情況。姚平《論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學術月刊》7 期)，旨在探討唐代冥婚墓誌、敦煌冥婚書儀、以及唐代小說筆記中有關冥間結婚和離婚的記載中所反映的唐代的冥婚現象及其興盛的原因。冥婚反映了佛教對唐人的死後世界觀的影響；唐代前期的經濟繁榮為重葬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唐代社會對男女之情的開放態度為冥婚提供了精神和心理條件；冥婚為死者親屬提供了增進族間交往、伸張權勢以及炫耀財富和地位的機會；冥婚習俗隨著唐代社會的衰微而漸趨消失。趙和平《唐代書儀中所見婦人書劄》(鄧小楠主編《唐代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8 月)，對唐代敦煌書儀匯總有關婦人書劄的內容做了較多的介紹，唐代婦女“女、妻、母、婆”四種角色在吉凶書儀中的規定，規範了她們在各種禮尚往來中的具體用語與如何在往來書劄中體現其身份；唐代夫到妻家成禮，並隨妻長期居住，作為一種風俗，最後得到法律的認可，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默認。

本年度對敦煌古代民間習俗的研究，涉及到飲食、占卜、看宅、喪葬、出行以及神鬼觀念等。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宴飲坐向和座次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 期)，從敦煌壁畫數十幅宴飲圖像這些圖像中，考察出它們不僅提供了宴飲場合、“會食”狀況、宴飲座制、會食人數等資訊，而且反映了當時宴飲的方位坐向、男女、座次等尊卑觀念。該氏《敦煌飲食研究劄記三題》(《蘭州商學院學報》3 期)，認為敦煌文書中將釀造酒、醋、醬稱作“臥”，將用油煎炸食品稱作“煮”。該文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了二字的本義及其演變過程。並利用敦煌資料，糾正了學界對“點心”一詞的誤解。該氏《敦煌文獻中的“須面”——我國最早的掛麵》(《揚州大學烹飪學報》1 期)，成書於元代的《飲膳正要》中的“掛麵”，被認為是記載掛麵最早的文獻。但敦煌文獻記載了一種被稱作“須面”的食物應當是中國最早的掛麵，它比《飲膳正要》的記載早了好幾百年。潘春輝《晚唐五代敦煌僧尼飲酒原因考》(《青海社會科學》4 期)，指出從唐五代敦煌社會因素看，敦煌好酒社會風氣的浸淫、敦煌寺院與外俗世界聯繫的緊密性、開放的社會輿論氛圍外，

敦煌還有一個僧人可公開、大量飲酒之開放的社會輿論氛圍，以及寺院內部存在著專為寺院供酒的“酒戶”及寺院戒律的鬆馳等三個方面對敦煌僧人飲酒提供了前提條件。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為決定論》(《敦煌學輯刊》1 期)，依據敦煌本解夢書和相面書中提出了“行為決定論”，將占辭預兆與人事實現間的不統一，用好夢好相的實現主要取決與自己行為好壞的理論來解釋。王晶波《敦煌相術與佛教占相內容異同論》(《敦煌學輯刊》1 期)，認為二者作為不同思想體系的產物，二者在碰撞過程中相互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最終形成了對兩者原有文化體系既有排斥也有借鑒吸收的敦煌相術文化。鄭炳林《俄藏敦煌文獻 Дх. 10787〈解夢書〉劄記》(《敦煌學輯刊》2 期)，指出俄藏敦煌文獻中保有兩片正背皆書冊頁裝的解夢書殘卷，內容與其他解夢書可互為補充。陳于柱《關於敦煌寫本宅經分類問題的再討論》(《敦煌學輯刊》2 期)，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敦煌占卜文書中的二十件宅經殘卷進行了重新分類，即為“五姓陰陽宅經”、“五姓宅經”、“陰陽宅經”、“八宅經”、“宅經一卷”、“大唐新定皇帝宅經”、“一般類宅經”七類。並依據文書內容，考察了部分寫卷的抄創時間。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以上博 48 號《後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文》為核心，揭示民生宗教神靈體系中的這一組成部分的基本特徵：墓葬神煞的“歷史延續性”遠遠超出鬆散型宗教中其他類別中的神祇，佛教的“入侵”，道教確立，改變的只是和地獄、天堂有關的信仰，墓葬領域則幾乎沒有觸動。余欣《禁忌、儀式與法術——敦煌文獻所見中古出行信仰之研究》(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8 月)，利用敦煌占卜文獻、具注曆、願文、牒狀及入破曆、契約等，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信仰對於旅行的實際影響。同時通過與各地大量新出土的簡帛文獻以及後世的曆書和其他選擇類文獻的比較研究，即試圖將它們置於整個術數史的視野中加以觀照，追尋它們在中古時期的承襲與嬗變的軌迹，揭示敦煌術數文獻的獨特價值。楊君《淺論敦煌符籙中的“善鬼護身”觀念》(《敦煌學輯刊》1 期)，指出中古神鬼觀念中的“鬼”，在敦煌符籙的表現方式中，卻可被當作為世人提供保護，發揮正面作用的保護“神”，這種觀念同樣豐富了中古民間鬼神觀念的內容。

宗 教

本年度對佛教文獻的整理研究有：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全書分為密教文獻概述、密教中的觀音信仰、密教中的啓請儀式及啓請文、密教東傳與中途文藝的關係等幾個方面，來探討現存密教文獻對佛教史研究意義與作用，以及敦煌密教文獻與遺存在密教研究中的地位。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用敦煌文書中的佛教資料，建立起中古時期敦煌寺院儀軌制度的框架，並分析了這些與中土既有關聯又有相當差異的儀軌制度的淵源和具體操作過程。

本年度敦煌宗教研究，以對佛教思想的流傳與民間信仰方式的研究較多：古正美《于闐與敦煌的毗沙門天王信仰》(《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指出于闐的毗沙門信仰，自 6 世紀或更早出現于于闐立國之後，幾經發展，形成了毗沙門天王共于闐國王護持于闐國土及國主的信仰主題。敦煌在文化上長期受于闐佛教文化的影響，因此在 6 世紀中期也出現了相關信仰，發展到曹氏時期，是敦煌歷史上毗沙門信仰發展的最盛時期。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中印文化對敦煌寺院的影響》(《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從敦煌寺院保存的文化典籍及追悼亡者的方式和流行的節日等幾個方面，看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對敦煌寺院不同方面的影響。楊君《從敦煌寫經看佛經在唐朝民間的來源及其流傳》(《甘肅教育學院學報》4 期)，作者以敦煌唐人寫經題記為基礎，再結合筆記小說等材料研究所得：當時寫經活動之所以興盛，一方面跟當時認為寫經是建立功德的主要途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在印刷術不流行的情況下，崇經活動對佛經的大量需求，只能通過寫經加以滿足。當時進行寫經活動的並非只局限於寺院與僧尼，普通信眾、官府與官員也是其主要的參與者。冀志剛《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燃燈與唐五代敦煌民衆的佛教信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5 期)，作者先將目前所見以燃燈祝願為主要內容的 44 篇文書，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類，通過對狹義文書分析研究可以看到：敦煌地區的燃燈活動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其中尤以正月的建福燃燈、上元燃燈和臘月的臘八燃燈最為重要；燃燈儀式是當地佛事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這些表象，最後得出結論：敦煌民衆的佛教信仰體現了佛教文明與中華傳統文明的互補與交融。它非常明顯地具有重功利輕義理的特點。燃燈儀式其實就是要將信仰落實為實踐，而且並不完全是為弘揚佛法，而主要是為獲

取現實生活利益。統治階層要利用佛教信仰整合秩序；普通百姓寄希望於消災免禍。濃郁的祈福色彩，掩蓋了本來的宗教目的，祈禱成爲最主要的內容。燃燈儀式與民間辭舊迎新、歡慶娛樂的喜慶活動聯繫在一起，對佛教信仰的進一步普及和深化起了推動作用。對佛教禮懺文的研究有：汪娟《敦煌寫本〈降生禮文〉初探》（《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對北圖 8347（生字 25 號）中《降生禮文》進行了整理研究，認爲這篇禮懺文是出自敦煌本地的寫本，抄寫年代應不遲於公元 974 年。該氏《敦煌寫本〈瑜伽佛禮〉初探》（《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對北圖 3451（水字 2 號）《瑜伽佛禮》文進行了校錄，並分析了儀節的程式與儀文的構成，再探討了該禮懺文與密教儀軌及其他密教文獻的關係。

本年度佛教經典研究中對疑偽經的關注比較多：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爲中心》（《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全面考察了目前所見經錄、寫本、石刻、變文中的《父母恩重經》，得出：偽經是爲了調和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而有的產物，因此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的被中國化，故而在民間廣爲傳抄，敦煌本偽經的發現就是最好的例證。鄭阿財《敦煌寫本〈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研究》（《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認爲該經文是形成於中唐時期的疑偽經，爲歷代藏經不收。其形成主要深受六朝以來觀音信仰普遍流行、唐代密教陀羅尼的風行及中唐以後佛頂信仰等影響。從現存版本的時代與地域來看，自經文形成以來，普遍流行於中國西北的吐蕃、西夏、遼、金等密教盛行的地區。北宋以後傳入中原，並延續至明代。該氏還有《敦煌疑偽經與靈驗記關係之考察》（《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指出偽經鼓吹特定教義能夠鼓吹人們諸多現實利益的動機，主要體現在佛教的“靈驗記”中，透過這些靈驗記的鼓吹，使得疑偽經更加普及和是深入，另一方面更顯佛教的中國化與世俗化。安忠義《甘肅省博物館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研究》（《絲綢之路》S1 期），認爲在這類作品的出現是佛儒鬥爭交融的產物，與當時敦煌地區特殊的政治背景有關，並且對五代及兩宋的四川地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1 期），利用俄藏敦煌文獻 П x. 00531 號、房山石經、俄藏黑水城文獻 TK. 117 號以及《大正藏》，對 P. 3920 號進行了校錄。經文強調“稱名即解脫”的思想，帶有持名密教的顯著特徵。張總《疑偽經典與佛教藝術探例》（《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列舉《佛說十王經》等九部較爲重要的疑偽經作爲個案研究，借此梳理它們在造像碑、摩崖、石窟、畫像塑形方面的拓展、演變之軌迹，揭示疑偽經與佛教藝術品之間的密切關係。

對敦煌禪宗史及相關研究有《中國禪學》第 2 卷上刊載的幾篇專文（河北禪學研究所主辦，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楊富學、王書慶《東山法門及其對敦煌修禪的影響》，認爲敦煌文獻對唐初創立的禪宗東山法門多有反映。證明該法門對敦煌禪修影響很大，從文獻記載看，唐以前敦煌禪僧修習形式有苦行、咒語、持律、觀行等多種，比較散亂。東山法門形成傳入敦煌後，由之演化出的南頓北漸思想始終受到敦煌禪僧人的青睞，他們以莫高窟、千佛洞和榆林窟爲場所，以東山法門闡發爲指導行持，明心見性。[日]田中昭良《神會研究與敦煌遺書》，將神會研究劃分爲兩個時期，早期研究又分爲無敦煌文書之前（1910-1925 年）和初步利用敦煌文書階段（1925-1955 年）；而從 1955 年至今，是神會研究在中外學者的努力下取得全面成果的階段。[日]伊吹敦《早期禪宗史研究之回顧和展望》，敦煌文書的發現促進了早期禪宗史的研究，而早期研究方法存在許多缺陷如：只點明禪宗寫本或刊本之多樣性，並沒有充分注意到其意義；大部分局限於禪宗內部，沒有考慮到以外的社會影響；考察禪宗的形成過程時，也往往以後世已有的觀念爲指導思想，先入爲主，突破性的論斷很少。這些也是後來禪宗史研究者應該解決和深化的問題。蔡榮婷《敦煌本〈佛說妙好寶車經〉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作者在研究禪宗牧牛詩時，發現禪宗初期的牧牛詩與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中的牛車喻有密切的關係，《寶車經》正是承襲牛車喻而來的經典。

對敦煌本其他佛教文獻的校釋研究有：劉楚華《讀敦煌〈觀音經注〉——P. 3904》（《新世紀敦煌學論集》），以 P. 3904 號爲例，分析觀音經注疏的緣起、分科特色和解釋的依據。黃征《敦煌草書寫卷〈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考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 期），在查閱傳世經文等多種重要資料的基礎上，並核對原卷真迹，對收錄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敦煌本 P. 2141 號《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作了訂補。董志翹《敦煌寫本〈諸山聖迹志〉校理》（《敦煌研究》3 期），根據《英藏敦煌文獻》的圖版，對 S. 529 號重作校錄、標點、注釋。[日]上山大俊著，劉永增譯《關於北圖劾 76 號吳和尚藏書目錄》（《敦煌研究》1 期），再次申論此吳和尚是法成，而非洪辯，並依據目錄談了法成藏書所反映法成的佛學學識。

本年度有關敦煌道教的研究有：柳存仁《〈老子化胡經〉卷八的成立年代》(《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對不同於 10 卷本《老子化胡經》的 P. 3404《老子化胡經受道卷八》的成文年代進行了考證，認為它是南北朝劉宋時的作品。劉屹《試論敦煌本〈化胡經序〉的時代》(《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針對學界認為敦煌 10 卷本《老子化胡經》的序文早於卷 1 的認識，提出二者可能都成書於唐開元年間，這對瞭解從公元 679 年的《老君聖紀》到開元年間 10 卷本《化胡經》的承襲關係和內容的演變，以及認識南北朝時期的《化胡經》系統等問題都有所幫助。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道教“三洞經書”和“三乘”考論》(《敦煌學輯刊》1 期)，認為“三洞”思想流行於東晉末年的江南，古靈寶經吸收並發揮了“三洞”概念，第一次將當時江南流行的《三皇經》、《上清經》、《靈寶經》等三組聯繫整合起來，同時又吸收了佛教的“三乘”思想，把“三洞經書”稱為大乘，而把其他幾乎所有經法稱為小乘。這種整合與劃分，對中古道教經教體系的統一影響深遠，並為後世確定了《靈寶經》在道教經法中的地位。王承文《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考證》(《敦煌研究》1 期)，指出敦煌本《靈寶經目》中保存了大部分已散佚的《洞玄靈寶三元威儀自然真經》和《靈寶威儀經訣上》兩部佚經，他們曾對中古道教科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因為流傳過程中的散佚，使得學術界往往將被徵引的前者當作唐宋材料直接使用。從後者的形制與出現的大量佛教用語看，其抄成年代應在唐初。楊森《武則天至玄宗時代敦煌的三洞法師中嶽先生述略》(《敦煌研究》3 期)，認為敦煌文獻如甘博 017《道教文約》、P. 2347a《老子道德經下》等中有關中嶽先生的稱呼，其實是道教三洞法師被授與某某先生的慣例，起初由中央王朝頒發，後來濫及全國各地。而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所出現的中嶽先生，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社會崇信道教的社會風尚。葉貴良《介紹敦煌所見的一部道教佚經》(《中國道教》4 期)，作者發現敦煌本《太玄真一三善行法發願經》與《天尊說三善發願經》同屬一部道經，並有所論證。馮利華《敦煌寫本道經〈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校讀》(《西域研究》2 期)，對《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中所錄 S. 238 號《金真玉光八景飛經》的校勘、標點作了補正。

古 籍

對敦煌文獻中的古籍整理以儒家文獻為主。許建平《〈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以第 11—17 冊未定名殘片為重點》(《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依照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對在諸經的排序，將俄藏敦煌文獻 11—17 冊中儒家文獻之碎片以《周易》、《尚書》、《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的順序定名，並注明相同內容的寫卷在其他藏本中的頁碼。該氏《殘卷定名正補》(《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將俄藏、法藏、英藏敦煌文獻中散見的十幾條儒家文獻進行校錄、定名。以及《BD14681〈尚書〉殘卷考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為該卷為唐高宗朝之後的抄本，與孔穎達《正義》所依據的文本相同，但二者仍有許多差異。李索《敦煌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學術價值新論》(《四川大學學報》1 期)，指出目前所整理出來的英、法、俄藏等敦煌文獻中，《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近 40 件。它們較阮元本更接近於《左傳》及杜注原貌，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上古文化、漢字構形、漢語詞義和語法的寶貴材料，在儒學學術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李索《英藏敦煌文獻 S. 85〈春秋經傳集解〉(殘卷)校正》(《敦煌研究》2 期)，從敦煌校錄本中選出 12 處異文進行簡要辨證，並議諸本得失。彭海《敦煌寫本〈古文尚書〉與漢代孔府壁本〈尚書〉淵源辨析》(《敦煌研究》2 期)，該文贊同前賢關於敦煌本《古文尚書》源自漢代孔府壁藏本的論點，辨析二者的關係，有助於梳理上古時代中外交流、部落遷徙的史事。劉長東《孔子項託相問事考論——以敦煌漢文本〈孔子項託相問書〉為中心》(《四川大學學報》2 期)，考論了項託的姓名里籍、事迹及其文化形象、項託的神格化，《孔子項託相問書》的民間性及其文化內涵等問題。劉長東《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考論》(《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就項託及《孔子項託相問書》，項託的姓名、里籍、事迹以及文化形象神格化，《孔子項託相問書》之民間性及其文化內涵等方面作了探討。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項託問答書〉簡論》(《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指出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與越南本《孔子項託問答書》之間有明顯的源流關係，越南本對敦煌本而言，有相當的參校價值。進一步分析諸本的內容、語言文字特點，即能發現俗文學在流傳過程中所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

對敦煌本類書的整理有：張涌泉《試論敦煌寫本類書的校勘價值——以〈勵忠節抄〉為例》(《敦煌研究》2

期), 舉敦煌本《勵忠節抄》中的 10 餘個例子與個傳世文獻校勘, 以證敦煌本類書特有的文獻學價值。屈直敏《〈敦煌類書·勵忠節抄〉校注尚補》(《敦煌學輯刊》2 期), 對王三慶《敦煌類書》中所錄的《勵忠節抄》一文校注中脫漏或待考的 40 餘條進行校補。

對其他古籍的整理研究有: 朱大星《〈文子〉敦煌本與竹簡本、今本關係考論》(《敦煌研究》2 期), 從篇目、體例、用字及有關史籍對照敦煌本、竹簡本與今本《文子》的差異, 說明敦煌本是竹簡本向今本演變的過渡本。李梅《試論敦煌本〈文選〉的語言文字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 期), 從藏於各國的敦煌寫卷入手, 闡述敦煌寫本在《文選》研究上的語言文字價值。范志新《俄藏敦煌寫本 φ. 242〈文選注〉與李善五臣陸善經諸家注的關係——兼論寫本的成書年代》(《敦煌研究》4 期), 參考李善五臣注, 揭示敦煌本無名氏注與陸善經注亦有某種聯繫。又依據寫本中既有顏氏《漢書》注, 又避唐中宗的名諱, 而以爲該卷成書當在唐玄宗以後。最後指出尤延之刻本參照了此寫本。李銘敬《日本及敦煌文獻中所見〈文場秀句〉一書的考察》(《文學遺產》2 期), 指出《文場秀句》一書存在著作品同名而撰者不同或未具撰者名字等多種記錄, 而且作品的內容亦有含混不清的問題。該文依據多種文獻資料, 探討並初步析清了它們的原貌及內容。楊秀恩《〈玉篇殘卷〉等五種材料引〈說文〉研究》(《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 期), 以近代回傳中國的《玉篇殘卷》及敦煌所出唐寫本等材料引用《說文》條目與《說文》進行互勘。這些材料爲清代許多校勘《說文》大家從未見及, 故於校勘十分珍貴。可證二徐之確者, 亦可正二徐之誤者, 或解決前人懸而未決的問題, 或證《殘卷》等引書之誤。

科 技

本年度科技文獻的整理研究依然以曆日與醫藥文獻爲主。

對敦煌曆日及天文圖像的研究與考察有: 劉永明《唐宋之際曆日發展考論》(《甘肅社會科學》1 期), 考察了唐宋之際曆日的發展狀況, 重點考察分析了曆注內容的充實和發展演變, 即從具注曆日到擇吉黃曆的發展, 陰陽術數與曆日相結合的歷史過程, 在術數的滲透下曆日選擇功能的加強, 曆日的流行、曆日對社會生活的滲透以及對文化的影響等。王愛和《英藏 S. 681v 與俄藏 Пx. 01454、Пx. 02418v 的拼接綴合與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 將 S. 681v 號、Пx. 01454 與 Пx. 02418v 號拼接爲比較完整的《乙巳年(945)具注曆日》, 可補全鄧文寬《後晉天福十年乙巳歲(945)曆日比較表》, 並可由此推導出多項新的內容, 尤其可以利用敦煌曆日總結出快速、正確的建除十二客的安置方法。鄧文寬《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兼論曆譜與曆書的區別》(《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上》), 作者認爲曆譜是由曆書轉化而來的歷史背景: 一是由於曆譜中增加了吉凶宜忌的內容, 二是這種轉化是從中國古曆內容泥書寫紙材的變化生髮出來的, 而不是來自域外文化的啓迪。以及該氏《敦煌曆日與戰國秦漢〈日書〉的文化關聯》(《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對敦煌曆日與戰國秦漢《日書》內容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加以比較, 在建除十二客、月煞、六甲納音、日忌與選擇、用事內容與語言等方面證明, 秦漢《日書》與敦煌曆日之間有許多相承的內在聯繫。進一步認爲: 竹木簡牘時代, 《日書》與曆日是配合使用的, 只有到了紙張廣泛運用的時代, 才有可能將二者合併書寫在一起, 完成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孟嗣徽《五星圖像考源——以藏經洞遺畫爲例》(《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下》), 從圖像學的角度考察英藏編號 S. 31, ch. lvi007 唐代絹制彩繪掛幅《熾盛光佛與五星神圖》、編號 Stein Painting 170, ch. lvi0033 五代紙制彩繪圖《計都神星·北方神星》和法藏編號 P. 3995《熾盛光佛與諸曜星官圖》中的五星神, 研究所得: 它們不僅反映出唐以來密教發展的軌迹, 也反映了古代中亞、西亞的佛教與天文圖像向東亞傳播的情況。而敦煌現存的五星圖像就是接受了以上影響的產物。

醫學文獻的研究有: 陳明《“八術”與“三俱”: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1 期), 認爲俄藏 Пx. 09888、Пx. 18173 等文書直接反映了印度古典醫學主流體系的“生命吠陀”理論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傳播, 還體現了以中醫知識去解釋生命吠陀的“文化誤讀”現象, 這對進一步研究中印古代醫學理論的交流有直接的重要意義。叢春雨《論敦煌中醫藥學的內涵及其學術價值》(《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下》), 敦煌中醫藥學研究的興起源自藏經洞文獻的發現, 敦煌中醫藥學的文獻價值爲: 寫卷大多爲唐以前的寫本, 有部分醫藥內容是首次發現; 其中的古藏

文著作，是研究藏族醫藥學起源的最新資料；針灸類、診法類、本草類、醫方類著作以及道易、佛醫的資料，都是古代醫學文化的珍貴遺產。而借助石窟壁畫表現的“形象醫學”是敦煌中醫藥學的特點。吳紅彥、劉喜平《敦煌遺書中有關方劑學的文獻研究》(《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 期)，認為敦煌醫藥文獻中最具學術和研究價值的當屬《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和《亡名氏脈經第二種》中的方劑。前者經初步考證其成書約在梁至隋唐期間，其整理當在宋代以前，其主要價值在於為研究《湯液經法》和古經方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深入研究敦煌遺書中《輔行訣》與《傷寒雜病論》的方劑，不難發現，二者的確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作為重要的脈學專著，《脈經》中許多方劑早已佚失，無從考證。探查敦煌遺書 P. 3477、P. 3665，特別是《亡名氏脈經第二種》(P. 3287) 中的內容與《脈經》十分接近，可資校補。王杏林、許建平《S. 202〈傷寒論〉寫本校正》(《敦煌學輯刊》2 期)，對該卷重新校錄，得割記 16 條。沈澍農《敦煌醫藥文獻 P. 3596 若干文字問題考證》(《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 期)，考出敦煌醫學卷 P. 3596 為一篇古代醫方雜抄，原卷存 240 多行，200 余方。馬繼興的《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將其擬名為《不知名醫方第九種殘卷》。該文就卷子中的文字釋讀問題展開討論，根據語言文字基本理論並參以相關文獻加以考訂。王天生《敦煌石窟〈灸法圖〉特點及臨床價值探討》(《中國針灸》11 期)，分析了敦煌石窟《灸法圖》的特點及現實意義，共整理辨識《灸法圖》近 80 個穴位，同時說明《灸法圖》具有選穴少而精、方便安全、易於普及、真實自然、背部俞穴取二寸三分等特點，其倡導的灸療將對醫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值得今後進一步挖掘整理。張儂、王文《西北民間挑擦放寒方法的淵源及發展》(《中華醫史雜誌》3 期)，指出挑擦放寒方法為西北普遍流行的民間刺絡放血法之一。追溯其形成階段，在敦煌卷子 P. 6222 醫卷就有記載。

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

本年度對少數民族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專著有：F. W. Thomas 編著，劉忠、楊銘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3 月)，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6 月)，全書分緒論、上篇(回鶻文獻——回鶻文化的基本載體)、中篇(回鶻文化研究)、下篇(回鶻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等部分，書後還附有附錄、縮略語表、主要參考文獻等。全書分段回顧了回鶻語文獻的發現、收藏與研究、刊佈狀況，重點研究了回鶻語文、宗教、文學和科學技術四個方面的內容，並論述了回鶻文化與周邊民族的關係。《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中有關歸義軍政權與周邊遼、回鶻、黨項、唃廝囉等少數民族政權間交往及勢力消長的系列論文，對這一時期歸義軍史和西北少數民族史的研究頗有參考價值。

本年度吐蕃史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借助敦煌文獻對吐蕃本土歷史、敦煌蕃占時期歷史以及相關人物等都有所深入探討和研究：林冠群《漢文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失實部分”之研究》(《中國藏學》2 期)，作者採用史學方法，兼取人類學、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之觀點，以記載唐代吐蕃的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會文化的各個主題，諸如族屬、國號、飲食、居住、文字、禮儀、婦女及政問題、宗教信仰及政教相關問題姓氏及身份分類，以及倫理親情等，先擷錄各書記載，再以吐蕃金石銘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並參酌當代西藏社會的生活習慣、文化禮俗及民情風俗等，作為考據時之依據，予以辨正。陸離《吐蕃統治敦煌基層兵制新考》(《中國史研究》4 期)，考證出敦煌阿骨薩部落軍隊由充當作戰主力之“射手”(vphongs)和負責承擔“射手”的一些雜務並參與作戰的“護持”(dgon)兩部分組成，這一組合方式與西夏軍制“抄”的情況完全相同。他們實際上都來源於吐蕃軍隊中的“桂”(rgod 武士)、“庸”(g·yung 僕役)制度。金滢坤《吐蕃統治敦煌的戶籍制度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 期)，認為吐蕃在統治敦煌初期，就採取了嚴禁吐蕃將領乘戰爭混亂、社會動蕩之機而侵奪沙州人口、土地的措施；進而推行清查編造戶籍的措施。吐蕃在統治敦煌中後期，按其本部的部落、將制，結合唐代的鄉里制，重新編造了敦煌戶籍制度。其旨在於當局控制在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為其徵發勞役及徵收賦稅提供準確資料。此外，吐蕃統治敦煌的寺戶制度，將敦煌寺戶隸屬於吐蕃教團統治機構，教團的頂端為“都僧統司”，高居於各寺之上。都僧統司設有辦事衙門，擁有很大權力。趙曉星《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國藏學》2 期)，認為敦煌在吐蕃王國統治之下的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即落蕃官階層。生活在這一階層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不幸身陷吐蕃，他們身著蕃裝，卻又心向大唐。該文通過對敦煌落蕃官出現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歷史作用等問題進行分析，對這些落蕃之臣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落蕃官的每一段歷史都是由各種各樣人共同作用而成的，敦煌在落蕃後特殊的發展軌迹當然也離不開落蕃官的作用。他們幫助吐蕃統治者統治敦煌，穩定地方秩序，並為以後的歸唐奠定了基礎。石碩《附國與吐蕃》（《中國藏學》3 期），長期以來，附國問題不僅與吐蕃密切相關，且一直頗存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在附國是否為吐蕃，附國位於何處以及附國的下落即附國是怎樣滅亡的這三點上。該文從吐蕃史的角度以及具體的地理環境、文化與史實背景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了梳理和探討，認為附國非吐蕃，其中心位置應在今川西北雅礱江所流經的甘孜縣一帶，並從敦煌吐蕃藏文寫卷“編年史”的有關記載對附國入唐以後的下落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推測。蘇航《試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基層組織 tshar——以 Ch. 73. xv. frag. 12 和 P. T. 2218 為中心》（《中國藏學》2 期），把敦煌藏文文書 Ch. 73. xv. frag. 12 和 P. T. 2218 中關於 tshar 的記錄和有關唐朝軍隊中的基層組織“隊”的記載進行了比較，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由於敦煌地區長期存在“隊”的組織，作者進一步認為 tshar 實際即對應於唐朝的“隊”，是吐蕃統治敦煌以後對原來當地的組織方式的一種借鑒。陸離《有關吐蕃太子的文書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對與吐蕃太子有關的文書整合研究以為，P. 2255、P. 2326 號《祈福發願文》、S. 2146《行城文》、P. 3256 號《願文》、P. 2807 號《齋文》、P. 2807 號《行城文》的寫作年代當在 798-815 年，P. 2341 號《燃燈文》當成書於 787-807 年之間。而文書中出現的太子應為赤祖德贊的長兄臧瑪，臧瑪後出家為僧，王位即為其弟繼承。文書中也可透露出吐蕃王位繼承制度與其王統世系，以及蕃占時期河隴僧官制度等方面的資料。楊森《五代宋時期于闐太子在敦煌的太子莊》（《敦煌研究》4 期），認為敦煌文獻及石窟題記中所見的太子基本都是于闐太子，而太子莊是歸義軍官方為他們長住敦煌所設的，其廢棄時間則相應是于闐國亡國之時。而沙武田、趙曉星《歸義軍時期敦煌文獻中的太子》（《敦煌研究》4 期），則認為這些太子一部分應為于闐太子，一部分則為曹氏歸義軍府主的太子。這種隱約於官方文書中的曹氏太子，是歸義軍政權與中原正統之間明稱臣、暗獨立這一事實的又一種表現形式。

對古藏文文獻的整理有：胡曉鵬、楊惠玲《敦煌古藏文寫本〈吐谷渾（阿豺）紀年〉殘卷再探》（《敦煌研究》1 期），針對學術界對該殘卷存在的兩種爭論：下嫁的公主為文成或金城公主；文書的年代在公元 7 世紀還是 8 世紀。提出己見：殘卷中的 Mun-cheng 當是文成公主，殘卷所記事件相應是此後唐與吐蕃、吐谷渾之間的征戰平伐。仁欠卓瑪《〈羅摩衍那〉的敦煌古藏文譯本和漢文譯本的比較》（《西藏研究》3 期），該文從悉多的生平，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以及故事結尾等幾方面對敦煌古藏文譯本和季羨林漢譯本間所存差異比較，分析這些傳本在故事情節和所反映的思想內容上的分歧。從而認為這些細節上存在分歧是因不同的原文傳本所致。王南南、黃維忠《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上）》（《中國藏學》4 期），敘錄介紹的 24 個藏文卷號中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有于右任、鄧隆等人的漢文題識，這是流散在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獻所無法比擬的。二是文中提到的部分寫經生、校經生名字未見於上山大峻所公佈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275 名寫經生、108 名校經生中，彌補了其不足，有利於我們對敦煌吐蕃時期的佛教社團有更全面的瞭解。

本年度對回鶻語文獻的研究有張鐵山的數篇論文：《敦煌莫高窟北區 B159 窟出土回鶻文〈別譯雜阿含經〉殘卷研究（二）》（《民族語文》1 期），首次刊佈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和《俱舍論頌疏論本》三件回鶻文佛經殘片，並有相關研究。《莫高窟北區出土兩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敦煌學輯刊》2 期），首次刊佈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 B54:14《別譯雜阿含經》和 B59:69《佛祖歷代通載》兩件回鶻文佛經殘片，對回鶻文原文進行拉丁字母轉寫、漢文翻譯和注釋，並對殘片的翻譯年代、版本和翻譯方式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過眼記》（《敦煌研究》1 期）、《莫高窟北區 B128 窟出土回鶻文《八十華嚴》殘頁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4 期）、《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三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民族語文》6 期）等。楊富學《回鶻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3 期），指出不論就字型還是就回鶻文創制的歷史背景而言，回鶻文的來源都可推定為粟特文，從而否認了學界長期流行的福音體文字說；回鶻文創制之初，其字母並不固定，先為 18 個字母，後發展為 23 個；回鶻文的得名當來自蒙古人的稱呼，這種文字對後世蒙古文、契丹文、滿文的形成有重大影響。楊富學《居庸關回鶻文功德記所見 uday 考》（《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 期），對北京居庸關雲台回鶻文《建塔功德記》偈語所見 uday 一詞從語言學和歷史學角度進行細緻的考證。該詞指代的當為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而敦煌吐魯番出土的

回鶻文文獻也實證了文殊信仰在回鶻民族中的流行。

此外，還有聶鴻音《西夏文〈五更轉〉殘葉考》（《寧夏社會科學》5 期），俄藏西夏文 7987 號《五更轉》殘頁是迄今發表的第一件西夏民間俗曲，其形式可以溯源至敦煌的幾種漢文寫本，顯示出西夏民間文學與唐五代敦煌文學之間存在繼承關係。無論看形式還是看內容，敦煌曲子詞裏都沒有與西夏《五更轉》完全相同的作品，這應是一個純粹西夏語法翻譯的作品。吳其昱《敦煌北窟敘利亞文課經 (Lechonary) 詩篇殘葉考釋》（《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指出莫高窟北區所出的敘利亞文《詩篇》課經殘葉當為中國現存最古之本，亦可能為中國現存最早之舊約經文。最後還附有經文敘利亞文與希伯來文和希臘字母的轉寫。

考古與文物保護

紀忠元、紀永元主編的《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粹》（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彙集了兩關研究的大批相關成果，而這些成果以兩關及附近地域的遺址考古研究為主，如敦煌漢代烽燧遺址、敦煌懸泉置遺址、玉門關的所在、漢代長城遺迹、敦煌鄉、里的設置等，但這些成果大多以前都曾發表過。

本年度其他考古方面的論文有：蕭巍《雞首竈與雞》（《絲綢之路》1 期），以雞為造型的竈台在敦煌地區繁多的祭竈習俗中尚不多見，敦煌佛爺廟灣墓群 80、D、F、M 號西涼墓出土的雞首竈明器，選用雞的造型，是因為雞被古人視為避邪的陽物，這一古代習俗持續了幾千年未變。張瑞峰《敦煌市博物館藏“通信校尉”龜紐銀印淺識》（《文博》2 期），介紹了敦煌市博物館館藏“通信校尉”龜紐銀印。它於 1986 年在敦煌市七里鎮鄉三號橋村一古墓內出土，整個印章造型副真，工藝精湛。

對莫高窟洞窟及相關遺址的考古研究有：殷光明《從北涼石塔看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建造年代》（《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以北涼石塔與莫高窟、新疆石窟已經雲岡石窟早期造像間的對比研究認為：吐魯番石塔和石窟中早期造像的漢化服飾，是由酒泉、敦煌石塔上 V 行衣領，演化為莫高窟早期洞窟的豎式衣領，然後又隨北涼流亡政權傳入高昌，而雲岡石窟則是更遲受到河西的這一影響。[日]百橋明穗《敦煌莫高窟早期窟試論——隋代窟諸問題》（《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敦煌隋代洞窟漸漸擺脫北朝佛傳、本生故事的世界，進入了三佛、賢劫三千佛的世界；出現了小型經變畫的雛形；還可能對此前的北朝洞窟有所改造。考察這些歷史性的變化，應看到佛學和佛教史的背景，兼及美術史和考古學的角度。金申《榆林窟象牙龕佛像及想觀攜帶式龕像》（《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該作品的產地和作者應都在今克什米爾地區，其創作年代當在公元 8-9 世紀，其造型樣式應屬犍陀羅藝術風格，而這類小型攜帶式龕像的源流亦是古印度，曾經流行於整個中亞地區並傳入中國，在我國則一直流行至金元時期。馬德《宋乾德四年重修敦煌北大像的“二期工程”——關於莫高窟第 96 窟前第 2 層遺址的時代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5 期），認為莫高窟第 96 窟（北大像）前第 2 層遺址非西夏遺址，為 966 年曹元忠夫婦主持重修北大像前殿堂樓閣的“二期工程”所留。陳菊霞《〈大唐伊吾郡司馬上柱國潯陽翟府君修功德碑記〉考釋》（《敦煌研究》2 期），對敦煌研究院所藏 Z01112、Z01113 殘碑進行了校錄、考證，認定它為莫高窟 220 窟的造像功德碑，該碑對瞭解敦煌翟氏的族源、族望乃至敦煌翟氏的興起繁衍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劉進玉《敦煌石窟藝術應用顏料的產地之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 期），論述了敦煌石窟彩繪藝術顏料的研究背景、科學分析方法和結果。並根據史料所載結合顏料的科學分析，對敦煌石窟藝術所用的朱砂、鉛丹、赭石、金箔、石綠等主要礦物質顏料的化學成分、應用及其產地進行了探索。賈應逸《藏經洞遺書與和闐佛教遺址》（《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以敦煌本于闐文書與今和田的佛教遺址相互對照、比定，並以此探討古代兩地佛教發展的相互狀況。

利用石窟壁畫對歷史問題的探討有：沙武田、段小強《莫高窟第 454 窟窟主的一點補充意見》（《敦煌研究》3 期），考定 454 窟主室東壁門南第一身于闐國王像不是李聖天，而是 967-977 年在位的尉遲輪羅或其他。從于闐國王像與洞窟可能的幾位元功德主共存時間關係考察，該窟窟主為曹延恭，最後由曹延祿續修完成。張小剛《莫高窟第 256 窟至正年間“大宋國”題記考釋》（《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該窟東壁門北元朝至正年間所寫的“大宋國”題記，可能與南宋皇室後裔趙完普等人被元政府遷徙到敦煌安置的事件有關。謝繼勝《莫高窟第 465 窟壁畫繪於西夏考》（《中國藏學》2 期），通過對莫高窟第 464 窟遊人題記年代的分析確認該窟壁畫繪於西夏前期，進而比較第 464 窟與第 465 窟之間花卉圖案的細節，確認兩窟的壁

畫大致繪於同一個時期，然後將莫高窟北區這兩窟出現的上師像冠帽樣式與榆林窟及河西石窟所見西夏上師冠帽樣式對比分析，確認它們最初來源於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蓮花帽，是西夏上師的典型冠帽。最後討論了第 465 窟壁畫大成者像貼附紙條與此窟年代的關係。根據以上論據的邏輯聯繫，可以確認莫高窟第 465 窟壁畫是西夏時期的作品。

本年度文物保護的專著有：李最雄編著《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 月)，系統介紹了絲綢之路上石窟和土遺址的概況、石窟研究的內容、絲綢之路的環境特徵及工程地質特徵，以及砂礫岩石窟的主要地質病害及風化機理研究等。其中最易受到自然力破壞的土遺址保護問題，也是作者關注較多問題，結合多年實踐經驗，主要提出了：土遺址的建造工程及結構、土遺址的主要病害、加固實驗及加固工程等四個方面的建議。書中內容新穎、資料詳實，對於文物保護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潘雲鶴、樊錦詩主編《敦煌：真實與虛擬》(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 年 4 月)，該書首先描述了真實的敦煌，介紹敦煌石窟藝術的形成與發展歷史、敦煌石窟的精華，以這些真實的洞窟為背景，做出了石窟的虛擬展示、敦煌壁畫虛擬修復與類比演變、敦煌風格圖案電腦輔助創作等方面的成果以及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法。

本年度石窟保護的文章有：張燕、孫建榮《樊錦詩解讀〈條例〉》(《敦煌研究》2 期)，《〈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3 月 1 日起施行》(《絲綢之路》4 期)，指出隨著《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的頒行，對莫高窟的保護已經開始了法制化的階段。此外，一些關於石窟數據化修復與類比的論作，因涉及敦煌學資料庫建設的內容更多，本文歸類在敦煌學資料庫一項作介紹。馬贊峰等《敦煌莫高窟第 85 窟顏色監測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 期)，為說明敦煌莫高窟第 85 窟顏料目前所處的狀態，用色度計和 CIE1 976 年表色系統進行選點監測，並進行 X 衍射分析。分析、監測結果表明：第 85 窟顏料有 7 種顏色，其中綠色顏料是最穩定的一種。顏色的色度值不僅反映了顏料當前所處的狀態，而且對瞭解古代畫師調色、技法、配比等提供一定的線索，這些信息對保護修復有指導性意義。吳榮鑒《敦煌壁畫色彩應用與變色原因》(《敦煌研究》5 期)，分析了敦煌壁畫與中國畫之間的關係，從中國畫的繪畫色彩等方面分析、對比，對敦煌壁畫的敷色技法及各時期色彩應用演變過程等作了分析。同時闡述了敦煌壁畫色彩變化的自然條件、客觀原因及規律，並對顏料的古今稱呼與用法等作了研究。

藝 術

本年度有關敦煌石窟藝術的專著有：吳健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西魏》、關友惠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晚唐》(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 1 月)，是以不同時代的代表洞窟為介紹物件。關友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3、14《圖案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 月)，是《敦煌石窟全集》藝術類的重要一部作品，集中介紹了敦煌石窟中各種圖案畫卷，並有詳細的文字解說。以上專著的特色是注重圖文並茂，解說詳細通俗。

本年度的書法藝術作品不多，僅有黃征、江吟主編《敦煌書法精品選(二)》(西泠印社，2003 年 1 月)，以敦煌本《大乘起信論略述》為鑒賞物件。

有關音樂藝術的研究有：莊壯《敦煌壁畫上的吹奏樂器》(《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4 期)，先是介紹敦煌壁畫中吹奏樂器的概況，以及它們的種類、出現的場合、製作材料及源流等分別探討，其中篳篥、簫、箏、排簫、塤、角、笙等為例。王承植《外來文化交彙下的唐代琵琶音樂》(《戲曲藝術》3 期)，探討了中國琵琶藝術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期即唐代的琵琶流傳、改革、演奏等情況，希望藉此增進對唐代時期中原與西域音樂文化交流情況的瞭解。莊永平《唐樂古譜節拍探求》(《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 期)，根據對《敦煌樂譜》等古樂譜中的節拍符號研究，得到唐代樂譜中的“百、口”等同於今天的小節符號，“譜字”為小節內的節奏載體。而“、”原是一種鼓點符號，在唐時還不能完全看作是節奏符號。直到後來“譜字位”的節奏概念被打破，才確立後世工尺譜“、”的節奏概念。高金榮《高麗樂在敦煌壁畫舞姿中的反映》(《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從莫高窟 156 窟、220 窟、榆林窟 25 窟等洞窟的伎樂壁畫中對照出敦煌壁畫樂舞中存有高麗樂的印迹。[日]水原渭江《北京圖書館藏敦煌舞譜殘卷(No. 820)解讀》(《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作者解讀北圖這一殘卷舞譜出

現的“皇”字在整個舞譜中的含義，並推測其舞姿為上古時期已有的“皇舞”，而這個舞譜為簡單舞蹈。陳明《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敦煌研究》5 期)，以莫高窟 156 窟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為研究對象，從晚唐河西地區的樂舞背景入手，具體分析了歸義軍時期的樂舞狀況，進而探討了張議潮出行圖中的音樂是西涼樂，舞蹈是《萬年豐》、《永世樂》等。

對敦煌石窟藝術價值及淵源的探討有：霍秀烽《敦煌石窟藝術內涵及其價值》(《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介紹了敦煌石窟藝術所包含的內容，不同時期的藝術特色與風格，而敦煌石窟藝術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它能為各個領域的研究者提供形象的資料。楊雄《敦煌西晉墓畫與敦煌壁畫》(《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支持敦煌西晉墓畫與敦煌早期壁畫在空間和時間上是近親，在藝術源頭上也是相近的，前者是後者的另一個直接藝術源頭。黃文昆《十六國的石窟寺與敦煌石窟藝術》(《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認為十六國時期的早期石窟藝術，與敦煌石窟之間多有藝術交流與互動關係。榮新江《略談于闐對敦煌石窟的貢獻》(《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指出敦煌石窟有不少于闐瑞像圖存在，于闐人在敦煌也有供養和開窟行為，以及于闐的畫家和工匠都曾逗留過敦煌，這些都證明于闐人對莫高窟的建造產生過相當影響。而相關研究目前還未全面展開。張小琴等《觀觀極樂世界意蘊大千圖式——敦煌壁畫中的思維與構圖研究》(《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以西方藝術研究的方法闡釋了莫高窟 320 窟無量壽經變畫的美學意義。胡朝陽、胡同慶《論敦煌壁畫藝術中的節奏感與韻律》(《敦煌學輯刊》2 期)，從排列組合、線條與形象變化等三方面探討了敦煌壁畫藝術中的節奏感和韻律。

對石窟雕塑的研究有：鄒鋒《敦煌唐代彩塑中敷彩的作用》(《裝飾》2 期)，認為敦煌彩塑的特點在於“塑”“彩”兼備，敦煌泥塑的敷彩，在各個時期均有不同的特色，如：北朝時主要是用土紅、石綠、石青等顏色描繪佛或菩薩衣褶，以平塗為主要手法，簡樸沈穩；到隋代，彩塑上開始出現織錦圖案和色彩斑斕的瓔珞裝飾；唐代是彩塑的輝煌時期，此時敷彩更為富麗，貼金裝飾十分流行，表現一種莊嚴華貴的美；宋代之後，則是敷彩藝術水準的下滑時期。穆紀光《希臘“對偶倒列”與“東方維納斯”》(《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認為敦煌泥塑所表現的菩薩與西方審美理念中的“美神”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東方藝術也在無形中遵循了“對偶倒列”形式的人體雕像標準。

從藝術史的角度對石窟壁畫內容的考訂研究有：賀世哲《石室劄記——重新解讀莫高窟第 285 窟北壁八佛》(《敦煌研究》1 期)，依據北涼法眾所譯《大方等陀羅尼經》卷 2《授記分》等，認為該窟北壁八佛應為無量壽佛、釋迦牟尼佛、維衛佛、式佛、隨葉佛、拘樓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張元林《淨土思想與仙界思想的合流——關於莫高窟第 249 窟窟頂西披壁畫定名的再思考》(《敦煌研究》4 期)，再次確定了莫高窟 249 窟西披壁畫表現的是《維摩詰經·阿閼佛品》的內容，這在圖像學與信仰背景兩個方面都有依據可以證明。而 249 窟南北兩壁不同宗教思想體系的契合點，是當時佛教淨土思想與道家的天界思想合流的具體反映。劉永增《莫高窟第 249 窟天井畫內容新識》(《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認為該窟天井中出現的富有中國傳統神話意義的人物車馬，並不是單純的佛教或神仙形象，而是二者混淆的產物，表達了多重宗教意義。[日]八木春生《敦煌莫高窟第 257 窟研究一得》(《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推測 257 窟的創建可以定在公元 6 世紀早期，下限當在 525 年元榮到達敦煌之前。分析洞窟藝術風格的變化，可以更深的感受當地所受中原腹地影響的程度。

對經變畫的研究有：李玉璿《敦煌初唐的彌勒經變》(《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認為初唐的彌勒經變構圖與西方淨土十分類似，而這種構圖應是根據中原的粉本所繪製的，以此論證這一時期也是敦煌美術發展的關鍵時期。嚴智宏《唐朝前期的藥師經變》(《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以 220 窟和 148 窟為代表的藥師經變畫為代表，這兩幅可謂“空前絕後”的藝術作品正好可以梳理敦煌藥師經變畫的發展歷程。海住《莫高窟華嚴經變相的考察》(《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指出莫高窟的華嚴經變相從盛唐的第 44 窟一直延續到宋代，其故事描繪的主體、所繪製的位置等都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尤其是善財求法圖，越到後來其重要性越降低並減少了繪製。李月伯《從榆林窟第 3 窟文殊變普賢變看中原人畫對敦煌壁畫的影響》(《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西夏畫工從佈局設計、人物造型及筆墨的運用等方面積極向中原文化靠齊，表現出一種超群脫俗的雅逸風度，擴

充了原有的藝術表現手法。王豔雲《西夏壁畫中的藥師經變與藥師佛形象》(《寧夏大學學報》1 期), 認為西夏的社會經濟較當時的宋、遼、金比較落後, 醫藥水平也極為低下, 人們往往求醫於巫醫及原始的祭祀。佛教輸入後, 佛教中的藥師經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和信仰。因此在西夏的石窟裏出現了大量的藥師經變和藥師佛形象。在內容和藝術風格上, 早期多模仿唐宋以及西域回鶻藝術手法, 中晚期隨著民族藝術的逐步成熟和發展, 創造出了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作品, 還出現了獨有的曼荼羅式的畫面, 成為敦煌經變畫的新亮點。該氏《河西石窟西夏壁畫中的彌勒經變》(《寧夏大學學報》4 期), 指出在敦煌石窟中, 根據彌勒上生、下生經繪製的彌勒經變畫, 自隋代開始一直延續到西夏。同隋窟的上生經變、初盛唐以後上下同壁繪製的大幅經變相比, 西夏的彌勒經變無論在內容的繁簡上, 還是在藝術風格的多樣上, 都有了新的變化、發展和創造。追根溯源, 西夏出現彌勒經變畫的原因, 除了繪畫體裁和內容的傳統延續外, 也與統治階級對彌勒信仰的大力提倡和宣傳密不可分。

對壁畫中的山水畫研究有: 王伯敏《敦煌莫高窟壁畫山水五探》(《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石窟藝術卷》), 從佛國山林與畫中山林、空間的需求以及 61 窟五臺山圖三個方面論述: 山水畫在佛教繪畫中佔有相當比重、敦煌的畫工有充分利用空間的智慧、闡述了五臺山圖的內容、形式、表現特點以及作品在美術史上的重要性。趙聲良《敦煌唐代壁畫中山水的空間表現》(《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石窟藝術卷》), 唐代莫高窟的畫匠積累並總結出了一套較為成熟的空間表現方法, 如比例與遠近關係、疊壓和遮擋法、地面的距離感等, 已經開啓了宋人所總結的所謂“高遠”、“深遠”、“平遠”等山水畫表現法。孫機《中國墨竹》(《中國歷史文物》5 期), 從中國墨竹的淵源談起, 細數歷代畫竹法的特色, 而敦煌竹畫的成就, 在這一藝術領域中應佔有一席之地。

對壁畫中其他圖像的研究有: 沙武田《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考察》(《中國藏學》2 期), 通過對敦煌石窟、特別是莫高窟屬於中唐吐蕃統治時期洞窟中的供養人畫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這一時期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養人畫像的減少、東壁門上首次出現供養人、吐蕃裝男供養人與唐裝女供養人共存、僧人多於俗人、供養人畫像題記之簡略化等新特點與新現象, 並作了詳細分析。文中也對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壁畫《維摩詰經變》中出現的“吐蕃贊普禮佛圖”作了探討。陳康《敦煌壁畫射箭圖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4 期), 分析了敦煌壁畫射箭圖像所反映的民族歷史和北方少數民族騎射禮儀、特點。劉健《莫高窟壁畫中不同時期的三幅〈夜半逾城〉的藝術特點》(《社科縱橫》6 期), 就莫高窟初唐洞窟裏的三幅《夜半逾城》壁畫的不同藝術風格進行分析。張小剛《淺析敦煌藝術的鹿野苑中瑞像圖》(《敦煌研究》3 期), 莫高窟 231、237 窟的“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瑞像”與絹畫婆羅尼斯國鹿野苑中瑞像都不是初轉法輪像, 而是位於鹿野苑這個地方的瑞像。其原型來自那揭羅曷國的佛影像。沙武田《敦煌壁畫翼馬圖像試析》(《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石窟考古卷》), 認為敦煌地區石窟和傳統墓葬、模制花磚中的翼馬形象, 無論是連珠形象或其他形象, 其文化內涵都是中國傳統的天馬思想和神獸瑞應思想。[英]韋陀《敦煌繪畫中的取經僧形象》(《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石窟藝術卷》), 分析敦煌絹畫與紙畫中的僧人形象及其創作年代, 還有圖畫中出現的諸如背篋、虎、鳥、小金盒等的用途與意義。最後認為, 這些僧人不是傳統所認為的玄奘, 而是外來的胡僧; 至於金盒所盛, 為佛教中最珍貴的聖物——佛舍利。

語言文字

本年度敦煌語言文字研究的專著有: 王啓濤《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巴蜀書社, 2003 年 4 月), 以敦煌法制文書為起點, 對其中所見的語言現象的來龍去脈作出相應的闡釋。

探討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特色及其對後世影響的文章有: 楊秀英《敦煌願文社會交際稱謂詞初探》(《敦煌研究》2 期), 考察願文中的社會交際辭彙, 如人稱代詞、隱名代詞、表示復數的稱謂詞等, 綜合變文及相關文獻, 發現敦煌願文中雙音的稱謂詞佔了優勢, 其中有些是用漢語構詞法將佛教辭彙融入漢語, 創造出漢化的佛教辭彙, 這一點可以豐富和補充《漢語大詞典》的詞條, 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古代敦煌地區人們的語言習慣。陳明娥《從敦煌變文看中近古漢語詞綴的新變化》(《寧夏大學學報》4 期), 採用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 對變文中的詞綴進行全面透視, 初步揭示某些詞綴的運動軌迹, 並指明漢語詞綴的發展是

漢語雙音化的一個內在推動力。李永《敦煌變文可能態句法結構肯定與否定的不對稱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9 期), 敦煌變文中存在三種唐五代新生的可能態句法結構: “V+O+不得”、“V+得+O”、“V+O+得”。在表達肯定/否定語義時, 前兩種結構呈現出句法不對稱性。在漢語史上, 語言內部對這種句法現象進行了調節, 並使之由不對稱到對稱, 由不平衡到平衡, 實現了語言系統的最終優化。

本年度有關音韻學研究的文章也比較多, 主要有: 許建平《BD. 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敦煌研究》2 期), 先勘正了許多許國霖當年錄文的訛誤, 又以宋元遞修本及清刻通志堂本《經典釋文》一之對勘, 指出寫卷本身的訛誤。但該卷文獻學價值在於: 可補通行本《釋文》之脫漏並糾正其訛誤, 也可補通行本《禮記》鄭注之脫。徐朝東《與蔣藏本〈唐韻〉相關的敦煌韻書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 期), 指出 P. 2018 和俄藏 D x. 1466 兩種敦煌韻書殘片, 與蔣藏本《唐韻》是同一類韻書。它們的體例、切語、成書時間等與蔣藏本類似, 從 D x. 1466 中“番”可以推測此本韻書可能是唐開元至宋大中祥符以前所抄, 從寫本字體看, P. 2018 和 D x. 1466 可能是一本分置兩地。鄭賢章《敦煌音義寫卷若干俗字重考》(《敦煌研究》1 期), 對《敦煌音義彙考》中的七個俗字重新釋讀一番。黃耀堃、黃海卓《道騫與〈楚辭音〉殘卷的作者新考》(《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從避諱、楚音、按語、協韻、異文等幾個方面討論了 P. 2494 寫本的作者, 對前人提出該殘卷作者為道騫的論斷提出質疑, 並補充了一些為前人所忽略的有關道騫的資料。

還有對敦煌變文、願文及詩文中的辭彙校釋: 黑維強《敦煌變文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1 期), 選取“花台”、“體內”等變文辭彙 20 餘條校勘。吳蘊慧《〈敦煌變文校注〉校釋拾零》(《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 期), 對《敦煌變文校注》中 11 處錄文疏誤進行了訂正, 還對 3 處注釋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建宇《敦煌變文校讀偶得》(《敦煌研究》1 期), 對《敦煌變文校注》中出現的“播”、“浮”等 13 組辭彙進行校注。張小平《〈敦煌願文集〉校補》(《西域研究》2 期), 對《敦煌願文集》中《亡考妣文範本等》、《東都發願文》、《願文》等數篇, 對照《敦煌寶藏》、《英藏敦煌文獻》對其中錄文、校釋作了補校。劉敬林《敦煌文牒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1 期), 對敦煌文牒中一批難詞辨析確義, 校正誤字。如“度、出度、度印”、“回戈”等。趙紅《〈敦煌碑銘贊輯釋〉補校》(《語言研究》4 期), 核校《敦煌碑銘贊輯釋》一書的錯漏 20 條, 指出錄文、標點、考釋方面的問題, 並力求作出正確的答案。景盛軒、徐之明《敦煌佛經詞語考釋》(《貴州教育學院學報》5 期), 舉例說明敦煌寫經中白食、搏掩、便、成辦、差牙、撥撒、身生、已來、便轉等九個詞語具有其特定的含義。錢興《〈父母恩重俗文〉俗字辨》(《鎮江高專學報》3 期), 對北 8672 號(河字 12 號)《父母恩重俗文》中的部分俗文字的確定提出了質疑, 查考和比較進行了辨認與補充。

對敦煌其他各種文獻的辭彙考訂有: 王紹峰《說“捉搦”》(《敦煌學輯刊》1 期), 說明在《武子胥變文》中“大須存心捉搦”一句中其應當解作“防範、把守”為宜。張小豔《“寐”字考》(《語言研究》1 期), 考證了“寐”乃“寐”的換旁類化俗字, 揭示了正字“寐”與其別體“寐、寐、寐字等”之間的淵源流變關係。唐賢清《近代漢語副詞“可煞”的演變規律》(《中南大學學報》1 期), 總結了“可煞”演變的三個明顯特點: 一是由宗教文獻向中土文獻滲透, 宋代是過渡時期, 元明清時期完全確立; 二是修飾物件由多樣化向專一化演變, 由最初的修飾動詞、形容詞及其短語到專一修飾形容詞“作怪”, 明代是過渡時期, 清代完成; 三是語義逐步呈現相對統一性, 由最初的可以用做程度副詞、語氣副詞、或二者兼而有之到清代的語氣副詞與程度副詞合而為一。闕緒良《敦煌寫本 S. 1725 號“日別”考辨》(《文獻》3 期), 以敦煌婚禮書儀中“不可日別拜舅姑”的“別”字為例, 其放在名詞之後表示“每”的用法, 產生與魏晉, 南北朝沿用, 尤其在唐五代西北契約文書中流行, 宋以後少見。張小豔《刪字符號卜與敦煌文獻的解讀》(《敦煌研究》3 期), 從考察寫卷中“卜”號使用的場合入手, 揭示了“卜”號下所隱含的漢字相誤的緣由: 漢字的形式、音近、義近關係, 固定詞語的習慣作用, 上下文詞語及書寫位置的影響, 字迹不清等; 論證這些“錯”字對解讀敦煌文獻具有辨字釋詞、考察方音、校讀寫卷的意義。蘇暘《敦煌契約中的量詞》(《江南大學學報》4 期), 將《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第二輯中所收 186 個契約中所用的量詞, 如用於土地丈量、屋舍、車乘、農具、服裝、動植物等, 共分為十類, 並一一舉例論說。郝招《敦煌新本〈雜集時要用字〉中“相撲”一詞述略》(《體育文化導刊》11 期), 俄藏 D x. 02822 號文書原定名《蒙學字書》, 現定名《雜集時要用字》。該文書可能出自莫高窟北區, 時代為西夏。該寫本中詳細地分出二十部

常用詞語，作者研究了其中的“相撲”一詞。康保成《元雜劇的“賓白”與“表白”》(《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4 期)，借用敦煌俗文學作品的對比，研究認為元雜劇的“賓白”與“表白”皆與佛教相關。“賓白”當是指介於唱與白之間的念誦，其遠源是漢賦的主客問答，近源則是佛教論議的“賓主往復”；“表白”，繼承了佛教術語“表白”念誦、吟誦的名和義，與“賓白”相比，“表白”更加講究語調的抑揚與節奏的快慢，音樂性更強。張錫厚《是“根”，還是“恨”——重讀敦煌本〈十恨〉詩》(《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 期)，考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校錄的《十恨》詩，應為《十恨》詩。蔣冀騁《“歹”見於敦煌文獻嗎》(《古漢語研究》4 期)，《唐五代語言詞典》收有“歹”字，釋為“惡、壞”，並舉《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和《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的兩篇文書為證。作者則認為此字應是“支”字。

文 學

本年度敦煌文學研究的重要著作有：周紹良、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作家出版社，2003 年 3 月)，對敦煌詩的研究，歷來研究者因其整理物件和方法的不同，往往只能給人留下孤立的、分散的印象，甚至難以展示敦煌詩歌的全貌和總體認識。該書充分依據敦煌遺書內詩歌作品的原貌真迹，並廣泛吸納以往的敦煌詩歌研究成果，凡敦煌遺書內詩、詞、偈、贊等詩歌作品，均予以收錄，並寫出評書的校記，總數 4000 餘首，是目前海內外輯錄敦煌詩歌最為豐富的版本，充分反映敦煌詩歌的文學文獻價值，並進一步填補中國詩歌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文學的先驅性究竟始於何時？胡阿祥《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本土文學述論》(《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 期)，認為魏晉時期，各地區本土文學的發展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就河西地區而言，以敦煌一域為典型。當時可稱為河西本土文學的中心。而這並非偶然，歷史地看，河西文學，敦煌居首；且不僅文學，敦煌一地所出經、史人才及總體文化水平，東漢以還，也都居涼州之首，這與敦煌居河西西陲、更加邊僻，相對而言也更加穩定有關。

敦煌俗文學的研究，尤其是變文研究，依然是敦煌文學研究者主要關注的內容。劉瑞明《敦煌文學藝術性先驅作用例說》(《敦煌研究》4 期)，該文從敦煌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對後世的先驅作用的角度，就墜鞭、蜂向美女采蜜、淚水和泥、誤飲毒藥、四面楚歌、恩人自死、偈語首用、馮唐故事等為例進行了分析，認為敦煌詞與敦煌變文兩種文學體裁，開了後世文學創作的先路。伏俊璉《上古時期的看圖講經與變文的起源》(《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為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我國就有看圖講故事的技藝，進而以為變文是在中國固有的文藝形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佛教傳入中國後，借用這種形式宣揚教義，促使其更加成熟。李小榮《釋家變文原初意義之推考》(《敦煌研究》3 期)，從儒釋道有關變文文獻的考辨出發，確定釋家變文的原初意義，就文體而言，三教變文的共同含義都是對佛教經典的通俗化變易；就文本而言，是指講經文。釋家變文產生之初，就受到了儒家變文的深刻影響，同時釋家變文在吸收儒家講經釋義方法之時，又影響著道教變文的生成。全寅出《唐代變文話本小說初探》(《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從中國小說史的立場分析唐代變文，從它的形式及內容的演變過程看，便可以瞭解中國小說的俗文學性就從六朝志怪故事經過變文到平話一脈相承的關係。孫步忠《俗講及民間講書唱書促成了白話小說韻散相間體式的定型》(《敦煌研究》3 期)，白話小說文體的確立首先經過俗講者和民間講唱藝人的口頭加工，而講書、唱書的體式和其文本的形成促成了白話小說體式的定型。敦煌藏卷中的白話小說初具白話小說的規格，具備了後世說話和白話小說的形態，給後世白話小說以深遠的影響。王昊《試論敦煌話本小說的情節藝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6 期)，指出作為中國通俗小說的濫觴，敦煌話本小說體現了較高的情節藝術水平，這表現在注重首尾完具，有單體式亦有連合式情節結構；通過賦予敘事焦點、預設觀念框架、增衍輔助情節等方法整合情節，使之更符合生活、藝術的邏輯等五個方面。

對敦煌變文具體篇目的研究有：霍旭初《印度、龜茲、敦煌降魔變文比較——佛教哲理通俗化的衍變》(《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指出印度、龜茲、敦煌的降魔變，雖然各自所秉的佛教派別不同，所依的經本各異，降魔變的形式和內容也有各自的特色，時代相距也較大。但降魔變通過形象化，又向故事化、演義化、神化、通俗化發展衍化的趨勢卻是一致的。[日]砂岡和子《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降魔變文〉補校》(《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 期)，將現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

寫卷《降魔變文》與羅振玉印入《敦煌零拾》的錄文進行重新對校，從而保留現存原卷的面貌。同時又以羅藏本真迹文字，對《降魔變文》的文本研究作了新的補充。謝海平《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整治措施》(《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為敦煌本《舜子變》所透露的孝道觀念，其實是按照唐代社會所認可的孝道觀念的具體呈現。賈雯鶴《〈舜子變〉故事演變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1 期)，指出舜子故事的歷時性演變有著漫長而又廣闊的時空跨度，它最終形成的敦煌本《舜子變》故事，既有對過去傳說的繼承，也有自己的創新。《舜子變》故事的演變遵循了民間文學一般的演變規律，即由荒誕到合理，由樸野到文明。黃亞平《武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以敦煌變文為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2 期)，認為武子胥復仇的故事起自春秋末年，並形成了民間口傳和史傳記載兩個傳播系統，前者以敦煌變文及宋元戲劇為代表，後者以正史記載為底本。兩系統在流傳過程中相互滲透、取長補短，使故事不斷趨於完善。李莉《試論敦煌本秋胡故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5 期)，以敦煌本秋胡故事為核心，試述其演變源流，更主要的是探討變文的故事結局及其文化價值。何劍平《〈維摩詰講經文〉的撰寫年代》(《敦煌研究》4 期)，考訂出敦煌遺書中 5 篇《維摩詰講經文》的創作年代，其中 S. 4571 與 P. 101、P. 252 號的時代應在盛、中唐之際；S. 3872 號應產生於安史之亂以後、南宗禪盛行之時；P. 2292 號所在五代後晉之時。並由此以為，不同版本的講經文證明俗講僧的宗派來源是不同的，並且佛經注疏體對講經文的形式深有影響。孫昌武《敦煌寫卷〈維摩詰講經文〉的文學意義》(《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指出這一文體無論在表達方式還是在語言技巧上，都給後代的文學創作，特別是說唱文藝提供了借鑒。李樹輝《S. 6551〈講經文〉寫作年代及相關史事考辨》(《敦煌研究》5 期)，認為 S. 6551 講經文作於唐貞元十一年(795)四月或稍後。聖天可汗等指即懷信可汗。有關記述正是當時西域地區形勢的反映，表明西州在貞元八年(792)陷於吐蕃後不久便為回鶻所收復。至晚到長慶元年(821)仍為回鶻所據。而懷信可汗是第一位皈依佛教的回鶻可汗。

對敦煌本齋願文的研究有：王三慶《敦煌文獻中齋願文的內容分析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利用佛經，對佛“齋”的名義、佛教齋會的名目和類別、齋會的發展及其敦煌齋會文獻的意義等問題有所探討。該氏《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指出《諸雜齋文一本》一書，在齋文寫本的考訂、介紹、名稱、內容分析和價值判斷等問題存在的錯誤，以及亟待解決的補正。張承東《試論敦煌寫本齋文的駢文特色》(《敦煌學輯刊》1 期)，認為敦煌寫本齋文以駢體為體裁，在具備駢體文的五大文體特色外，在情采、詞句、風格、文字等幾個方面具有自己的特徵，如：在情感聲書法多哀思之情、在審美上走向庸俗、在文字上錯謔俗白等；另一方面，齋文作為駢體文在宗教儀文中廣泛應用的一大體現，同時彰顯了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文學與佛典的互動關係。

有關敦煌賦的研究有：張鴻勳《敦煌賦研究的幾點思考》(《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認為敦煌學界對敦煌賦研究存在的兩種差異，即對敦煌賦範圍的界定的不同而導致的錄文收集以及研究文化構成的不同。針對以上情況，作者提出自己的看法。總結出敦煌賦所具有的短幅小制、富於社會批判等五大特色。以及賦與小說、戲曲、說唱文學間的傳承關係。伏俊璉《敦煌賦及其作者、寫本諸問題》(《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 期)，對目前所見敦煌賦體作品的寫卷情況、作者、作品的創作時代和抄寫時代等進行了考辨。黃征《〈燕子賦〉研究》(《敦煌研究》1 期)，輯錄了《俄藏敦煌文獻》中可能是《燕子賦(一)》的卷號：D x. 00796+D x. 01343+D x. 01347+D x. 01395、D x. 05415、D x. 10741、D x. 04803，與《敦煌變文校注·燕子賦》的文本相對比，加以考證、校錄與綴合，並將內容相類殘卷 D x. 01304 校錄備考。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紮之一》(《文獻》2 期)，對俄藏 D x. 06176、D x. 10527 號考證、定名後認為，文書殘存為隋魏澹《鷹賦》及唐李邕《鵲賦》二題，前者為敦煌寫本已發現的惟一一篇《文選》以外的先唐詩賦作；後者僅存殘句，但可補敦煌賦存目。

對敦煌詩歌作品的相關研究有：楊挺《不存在兒郎偉文體和兒郎偉曲調》(《敦煌研究》1 期)，作者對敦煌文獻中大量的上梁文、障車文、驅儺文及《全唐文》中與兒郎偉有關作品辨讀後，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兒郎偉文體和兒郎偉曲調，與學術界流行的“兒郎偉文體”說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徐俊《敦煌先唐詩考》(《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從敦煌文獻中輯錄了先唐詩歌 72 首，並按照作者的時代進行了大致的排列，這些詩作最早有先秦的《荊軻歌》，降至隋煬帝的曲子詞一首，並依據傳

世文獻與諸家錄文對以上先唐詩進行了對校。劉景雲《後漢秦嘉徐淑詩文考》(《敦煌研究》2 期), 對俄藏敦煌文獻第 12213 號《後漢秦嘉徐淑詩文考》校釋, 並結合傳世文獻, 較全面的考訂了後漢秦嘉、徐淑夫婦的事跡及他們的傳世詩文, 從而肯定了該號文書的文獻價值。趙望泰《敦煌遺書 S. 5744〈祭某詩文抄〉本事探真》(《敦煌研究》1 期), 認為 S. 5744 殘卷所抄的五言詩及《祭文》所寫的史事, 實乃發生在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的張理、張琬兄弟二人為父報仇的事件。所以托名徐彥伯所作, 一是借助徐氏的才名, 二是因為徐氏曾兩次任職蒲州, 張氏兄弟也為本郡人而所做的附會。王勳成《從敦煌唐卷看劉商〈胡笳十八拍〉的寫作年代》(《敦煌研究》4 期), 依據敦煌寫本 P. 2555、P. 3812、P. 2845 號詩題後的小序, 考訂出劉商的《胡笳十八拍》應作於大曆四五年(769-770 年)他罷廬州合肥縣令之時, 從而解決了成詩的具體年代問題。胡大浚《敦煌寫卷中幾首佚名詩考釋》(《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歷史文化卷·下》), 與傳世的唐代詩文本對照, 考訂了敦煌寫本 P. 2555、P. 3619、P. 3812 中所錄的幾首佚名詩的作者, 並指出了敦煌抄本的錯漏對原詩作者及成詩年代的判斷造成的誤解。李誠《〈十吉祥〉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 指出《十吉祥》是具有濃厚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佛教通俗宣傳作品, 是用中國傳統言辭與情節詮釋佛教思想的代表作。張子開《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宗教學研究》4 期), 全面介紹和分析了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偈, 認為敦煌佛教白話禪詩中有一部分確實體現出了禪宗南北兩派的意涵。其他詩作雖然難以歸屬於禪宗, 但卻反映了廣義上的禪的觀念。在白話禪詩之外, 敦煌佛教文獻中尚有一批一般佛教白話詩。而上述佛教白話詩偈, 都應該納入中國俗文學、特別是中國佛教俗文學的研究範圍之內。

學術動態與紀念文

對 2002 年度敦煌學研究概況介紹的文章有: 陳麗萍、江海雲《2002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敦煌學輯刊》2 期)。

還有對上年度召開敦煌學會議的介紹有: 《“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藏學》2 期), 是對北京理工大學、敦煌吐魯番學會與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聯合舉辦的“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的介紹。

2003 年是敦煌學界前輩王重民先生誕辰 100 周年, 為了紀念先生對早期敦煌學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中國吐魯番學會共同主辦了“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位化國際研討會”, 會議以敦煌寫本的研究與修復, 以及紀念王重民先生為主題, 會後還主辦了“王重民先生生平展”, 對此次會議及相關情況的介紹有: 馮培紅《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位化國際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2 期)。此外, 還有周文駿、王紅元《王重民先生的學術成就——紀念先生誕生 100 周年》(《圖書情報工作》6 期), 羅德運《王重民: 敦煌學界的一代泰斗》(《圖書與情報》3 期), 周文駿《王重民目錄學研究述要——紀念先師王重民教授誕辰 100 周年》(《北京大學學報》3 期) 等文, 對先生的生平及學術成果進行了介紹與回顧。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2002 年舉辦“敦煌學漢語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集, 有對會議召開情況的介紹: 姚永銘《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教授紀念會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還有紀念三位先生生平及學術貢獻的文章: 傅傑《姜亮夫先生傳略》、方一新《蔣禮鴻先生傳略》、張涌泉《郭在貽先生傳略》(《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其他追憶與緬懷敦煌學界前輩的紀念文有: 陳滯冬《夢魂三匝繞敦煌——紀念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壁畫六十周年》(《四川文物》2 期), 根據當事人的記錄及其他材料, 研究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具體時間、摹本幅數及其著作權歸屬問題。指出張氏臨摹壁畫的目的並不是要給敦煌壁畫留一個副本, 而是借此探討中國古代繪畫的源流, 研究古代繪畫藝術鼎盛期的技法、制度和格局。張氏的臨摹活動改變了他自己一生藝術的取向, 為他最後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及沈建中《敦煌石窟寫經生——記臺灣敦煌學一代宗師潘重規教授》(《台聲》3 期), 雷公《納桑鋪路煥新彩無私師表引路人——緬懷恩師潘絮茲》(《絲綢之路》1 期)。

敦煌學數據庫建設

隨著敦煌學的全面發展, 敦煌學資料庫的建設在敦煌文書的修復、敦煌壁畫的復原, 以及將敦煌文獻的公佈推廣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本年度有關敦煌學數據庫的建設及相關探討, 在敦煌學研究中所占

比例較大。作為敦煌文獻四大藏地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於 2003 年開通了國際敦煌項目中文網站，該館館刊《中國國家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通訊》的第 3 期就是《紀念國際敦煌項目中文網站開通專號》。上文所說的“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字化國際研討會”的召開，也顯示出在科技發展的新時代，敦煌學的研究與高科技的結合越來越緊密。敦煌學界也希望通過二者的結合，找尋敦煌學研究更廣闊的前景。

本年度有關敦煌學數據庫建設的論作有：林世田、孫利平《IDP 項目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數字化》(《國家圖書館學刊》1 期)，界定敦煌文獻所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土地廟、敦煌西北漢長城烽燧遺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國、北朝、隋、唐以至於宋代的多種文字的古代寫本和印本。這批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書、四部典籍在內的古代文獻的整理是一項繁雜長期的工作，而敦煌文獻的數字化可以推進相關進程。劉華等《敦煌學數字圖書館遺書元資料標準的設計與結構》(《上海交通大學學報》S1 期)，根據敦煌遺書的特點及敦煌學領域專家的特殊需求，參考國際通用的元資料制定規則，提出了敦煌學數字圖書館遺書元資料標準，在該標準基礎上可從數位圖書館角度實現敦煌遺書的收集、整理、發佈及網上檢索。邵惠莉、沈子君《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開發與應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介紹了《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開發背景、入庫卷號及建設情況，以及數據庫前端編程和運行系統、應用程式。最後指出該數據庫的發展前景和擴展性。李鴻恩《敦煌研究文獻資料主題分析與標引》(《敦煌研究》4 期)，依據敦煌研究文獻分佈規律及檢索特點，提出了建設學科特色數據庫在文獻資訊處理方面的一般要求及工作細則。向君、盧秀文《開發專題文獻數據庫為敦煌學研究提供資訊保障》(《敦煌研究》4 期)，探討了敦煌學專題文獻數據庫建設的背景、步驟、方案、服務等，討論了專題數據庫的特點和具體分類。

徐文華等《基於紋理合成的圖像藝術風格學習》(《武漢大學學報》3 期)，以馬可夫隨機場模型的紋理合成演算法為原形，在結合圖像藝術風格的學習和約束的樣圖紋理合成演算法的基礎上，提出了面向物件的圖像藝術風格學習的演算法，並將其應用在敦煌壁畫虛擬的復原臨摹工作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潘雲鶴、魯東明《古代敦煌壁畫的數字化保護與修復》(《系統仿真學報》3 期)，提出了一整套數字化壁畫保護修復的技術，並描述了利用該技術進行數字化壁畫保護修復的系統體系結構及運行機制。首先提出了智慧化交互的壁畫臨摹輔助技術和基於色彩協調的壁畫色彩演變技術。然後介紹了根據相應技術實現的智慧化壁畫臨摹輔助系統和石窟壁畫文物保護修復輔助系統。文章的最後提出了在數字化文物保護、研究、修復與開發利用方面的進一步設想。陳任等《多維度對象數字化信息記錄技術研究》(《測繪學報》4 期)，對多維度對象進行數字化信息記錄，是對其進行虛擬展示、傳輸和分析等操作的基礎。在虛擬世界的建造過程中，多維度對象的空間及色彩等特徵的資料獲取始終是一項困難的，同時卻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以敦煌石窟中的文物對象為例，詳細討論了集成化的多維對象數字化信息記錄技術。並針對敦煌石窟中的典型代表文物：敦煌壁畫與彩塑的特點，提出了面向高精度記錄和展示要求的敦煌壁畫和彩塑物件的數字化獲取方法和規範。劉剛、魯東明《敦煌壁畫的數字化》(《敦煌研究》4 期)，討論了在敦煌壁畫的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如何利用多媒體與智慧技術集成，解決敦煌壁畫的色彩虛擬復原、敦煌風格圖案創作以及敦煌石窟漫遊等問題。楊西寧等《敦煌石窟藝術元資料標準的設計及實現》(《上海交通大學學報》S1 期)，通過對敦煌石窟藝術的分析，採用建模技術，研究並制定了敦煌石窟壁畫元資料標準、敦煌石窟彩塑元資料標準。它的目標是建設敦煌學數字圖書館，為敦煌學專家提供詳實、完整、全方位的數據資料。敦煌石窟藝術是敦煌學數字圖書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研究對象特殊、數據類型多樣、數字資源之間關係複雜，只有採用元資料才能正確描述其特徵，並對相應的數字資源進行合理的組織和管理。

“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小貴 (中山大學)

2004 年 4 月 23—25 日, “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正式召開。本次會議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國遠東學院、法國科技研究中心中國文明研究組及東方與西方考古研究組、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等單位聯合主辦。

4 月 23 日上午舉行了大會開幕式。隨後在國家圖書館館藏珍品展示室 (二層文津廳)舉行“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展覽。配合本次展覽,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同時出版了榮新江、張志清主編的同名展覽圖錄《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用精美的彩色圖版,展示了“中國的粟特考古新發現”、“石刻碑誌上的粟特人”、“古籍文獻與敦煌文書裏的粟特人”,並收錄一組以“粟特入華歷史的新探索”為題的研究論文。由於展室面積有限,圖錄裏有關碑帖的內容要多於展覽的實物,但展覽陳列的“百年粟特研究論著”,卻沒有在圖錄中體現,而其中不乏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和一些個人收藏的有關粟特研究的珍貴圖書。

以下本文按發表順序,對會上發表的報告內容做一簡要介紹。

4 月 23 日,會議主題“薩寶與貿易”(Sabao et commerce)

上午的學術報告由中山大學姜伯勤教授主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孫福喜、楊軍凱先生做了題為“考古新發現——西安史君墓發掘”的報告。楊軍凱先生《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槨圖像初探》,選取了史君墓石槨四壁浮雕圖像,依據有關文獻、祇教經典和神話傳說,結合歷年來出土和分散於各地及國外的有關圖像,對其內容作了初步解讀。重點是認為該墓東壁浮雕用圖像的方式表現了粟特人死後,其靈魂離開軀體,來至欽瓦特橋頭,接受祇神“善惡”的審判和裁決,善者進入天國,惡者墜入地獄的情景。

下午安排了兩場大會發言。第一場由法國遠東學院北京中心主任華瀾(A. Arrault)先生主持。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吉田豐教授《關於新出土粟特文、漢文雙語墓誌的粟特文部分》,對史君墓出土雙語墓誌的形制進行了簡單介紹,對粟特文進行了轉寫和翻譯。通過對粟特文墓誌的解讀,勾勒了墓主史君的譜系,並對其中涉及到的粟特文書體和語言問題也進行了討論。文章還重點探討了歷史研究中最有價值的地名和紀年問題,並對墓誌中涉及的五個稱號,進行了還原。姜伯勤教授《入華粟特人薩寶府身份體制與畫像石紀念性藝術》,在“薩寶體制以及納入中國身份制的胡人身份體制”這一歷史背景下,探討了中國墓葬所出祇教畫像石,並對其進行了分類。報告還對楊軍凱先生關於史君墓東壁浮雕圖像的解說進行了補充說明。

第二場學術報告由法國高等實驗學院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教授主持。倫敦大學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論粟特文古信劄的再刊》,討論了斯坦因(Aurel Stein)於 1907 年在敦煌西部“T.XII.a”號遺址發現的“粟特文古信劄”(Sogdian Ancient Letters),對其中的第 1 和第 3 封進行了重新整理研究。這是一封被丈夫遺棄在敦煌的婦人寫給她的母親和丈夫的信。繼 1998 年完成第 5 封、2001 年完成第 2 封信劄的重新校訂與完整翻譯後,本文是他全面重刊“粟特文古信劄”的繼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丁愛博(Albert Dien)教授《帕爾米拉的商隊及商隊首領》,比較了帕爾米拉地區的商隊和中亞及中國地區的粟特商隊,認為帕爾米拉材料僅限於帕爾米拉單一地區,而粟特人的材料則限於身處外國的粟特團體。兩個社會中都有商隊首領,但是商隊首領這一頭銜僅被在外國的粟特商團首腦使用,而這種現象未見於帕爾米拉人的例子中。粟特人可能從事的是小商販貿易,而帕爾米拉似乎更可能是一個貨物中轉中心。兩者都依靠商隊首領把他們安全地帶到目的地。日本大阪大學的荒川正晴教授《唐代粟特商人與漢族商人》,認為以長安為終點和起點,西方的中亞和東北方的東北地域,以及由大運河連通的南方江南地域都有眾多客商來往。這些客商在唐帝國完備的交通體制下,與掌握著通行許可權的各州官員密切接觸的同時,進行著交易活動,其中代表者即為粟特商人。本文在這一背景下探討了粟特商人和漢族商人之間的相互提

攜關係，這種關係在中國北部（華北）、蒙古和中亞等地貫穿著有唐一代。

4 月 24 日，會議主題“社會學與粟特聚落”（*Sociologie et communautés sogdiennes*）

全天安排了四場大會發言。上午第一場由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主持。耶魯大學韓森（Valerie Hansen）教授《絲綢之路對吐魯番經濟的影響》，認為絲路商人進行貿易的路程比較遠，但商品的數量不大，都是小規模的，七八世紀的吐魯番幾乎看不到絲路商人對當地人的影響，絲路交換在吐魯番整個經濟占的比率並不大。對此，榮新江指出韓森教授對絲綢之路貿易的評價過低，應以高昌，而不是以整個中國的經濟為參照系；發現的文書只能反映部分情況，不足以反映全貌。希彭斯堡大學斯加夫（Jonathan Skaff）先生《吐魯番粟特人家庭人口結構初探》，討論了西元 700 年前後有關西州（現代的吐魯番）粟特人的人口問題，主要是各年齡段的人口比例與漢族有何不同，表明吐魯番粟特人口組成特質不同於其漢族鄰居，但是有一些粟特人已經顯示出融入當地漢族社會的跡象。蘭州大學鄭炳林教授《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胡姓居民與聚落》，認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有大量的粟特人等胡姓居民生活，包括了該地所見粟特人及其胡姓居民的各個姓氏家族，其中部分漢化，但也有相當部分仍然使用胡名胡姓，保留粟特人的原始狀態。並根據歸義軍政權對少數民族的管理方式推測，晚唐五代歸義軍政權對居住敦煌的粟特人移民採取了部落制管理方式。

第二場由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主持，神戶外國語大學影山悅子博士《粟特人在庫車：從考古和圖像學角度來研究》，從考古和圖像學材料入手，考察了粟特人在龜茲地區的活動。通過與文獻記載及片治肯特的考古發現，勾勒了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粟特商人形象，指出由於龜茲人對粟特人形象的熟悉，所以把其作為本生畫和經變畫中商人形象的素材。糾正了作者于 1997 年誤認為出土焉耆的一個納骨甕，應是 1958 年出土于庫車地區的麻紮布坦村。這樣，庫車地區共出土了兩個骨甕。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出土於龜茲的東牆外，與中國史籍記載的吐魯番和敦煌地區的祆廟在城東相一致。文章還借助對和田與圖木舒克帶鑄模裝飾陶器的斷代，來判斷庫車麻紮布坦村兩個納骨甕應在七、八世紀，從而與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粟特商人形象一起，成為此時粟特人在龜茲地區活動的證據。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童丕（Éric Trombert）教授《中國北方的粟特遺存——山西的葡萄種植業》，在山西的西方伊朗定居民與西北遊牧民族融合的背景下，認為葡萄肯定從伊朗移植而來，山西的葡萄種植實際上很古老，是古老的粟特—遊牧民合作的遺跡。聖彼德堡東方研究院呂爾（Pavel Lur'e）先生《對早期伊斯蘭世界通往中國的陸路的幾點詮釋》，從地名及地理意義上分析了阿拉伯入侵之前早期伊斯蘭世界通往中國的由河中至長安的陸路情況，並闡明粟特人貿易的一些古代特徵。

下午第一場報告由榮新江教授主持。日本築波大學森部豐先生《自唐後期至五代期間的粟特系武人》，認為安史之亂及其後的河朔三鎮時期都有為數眾多的粟特系武人存在過。而且這些粟特系武人並不是純粹的粟特人，而是受過突厥人影響、持有半遊牧民性質的突厥人。文章認為河曲的粟特系武人移居河北，乃由當時河朔三鎮與唐朝的政治軍事關係制約。元和長慶後，由於二者轉向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共存關係，以及沙陀族移居，不再見來自河曲的粟特系武人移居河北的記錄。魏義天教授《中國的粟特柘羯軍》，從中文、阿拉伯文史料以及遊牧民的軍事慣例中，探討了柘羯軍所具有的職能和文化特徵，認為其是粟特人所擁有的一支特殊軍隊。並討論了沙晚所遺漏的漢文史料中有關其三處記載，認為 630 頡利失敗後拒絕歸順的柘羯軍，是為其牽制伊州（哈密）的粟特人；安祿山像所有粟特軍事首領一樣，組織了一支柘羯軍。

第二場由韓森教授主持。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薩保與薩薄：佛教石窟壁畫中的粟特隊商首領》，系統收集了佛教石窟壁畫中的薩薄形象，並從薩保和薩薄的關係角度加以論證，試圖揭示出佛教壁畫中薩薄或其所率印度商人在龜茲和敦煌地區向粟特薩保轉化的過程。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園調查記》，回顧了小洪那海突厥遺跡的發現，以及 1991 年、2002 年兩次進行實地調查的情況。儘管小洪那海碑尚未通讀，但是目前讀出的幾個字，足以說明這個石人是突厥可汗石像。並根據調查指出特克斯河流域就曾是室點密系突厥可汗早期活動的中心。而突厥石像下板瓦和筒瓦殘片的發現，則說明這裏原建有漢式碑亭或宗廟。同時這一粟特碑銘的發現也為解決泥利可汗在位年代提供了新材料。但問題的最終解決尚有賴於更為清晰的照片以及碑銘的完全解讀。

4 月 25 日會議主題是“宗教與藝術”（*Religion et iconographie*）。

全天安排了四場大會發言，並進行了大會閉幕式。上午第一場由童丕教授主持。法國高等實驗學院的

葛樂耐 (Frantz Grenet) 教授《粟特人的自畫像》，根據屈霜你迦和撒馬爾幹的壁畫 (還有摩尼教文書殘片)，指出以粟特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的存在，而且這個中心的焦點是粟特王，而不是粟特地區。由粟特人選擇的畫中世界不同於他們的真實生活。相反地，中國的畫匠較真實的展現了粟特人的各種商業行為。關於這種矛盾，部分由於當地的歷史環境：粟特本土國際貿易確實很少發生，同時當地的貴族勢力強大，所以在繪畫上會過多的表現；更深一層，粟特社會體現著重視戰時武士和貴族的價值；薩珊伊朗的道德觀，自五世紀以來在粟特地區廣泛流行，並一直延續到薩珊波斯帝國滅亡之後，這也是原因之一。加拿大獨立研究者盛餘韻 (Angela Sheng) 女士《從石到絲——西元 500-650 年前後粟特、鮮卑、漢、朝鮮與日本等各民族間喪葬藝術的轉換》，基於當時社會經濟政治變革與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事實，在 6、7 世紀喪葬藝術發生變革的語境下，從形制與用途的角度入手，認為日本的天壽國繡帳可能來源於中國的石槨制墓葬的啟發。從而從更深層次解讀其含義，並豐富了我們對異質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認識。故宮博物院施安昌研究員《河南沁陽北朝墓石床考——兼談石床床座紋飾類比》，對 1972 年 12 月 2 日出土於河南沁陽的北朝墓石床線刻畫做了描述，再將不同地區出土的九例石床床座加以比較，認為祆教在古代中國流行時曾經形成過圖像系統。另外，與祆教主題相關的一系列圖像，在中古時代曾被圖案化，成為裝飾紋樣而風行很長時間。

第二場由美國獨立研究者 Judith Lerner 主持。北京大學齊東方教授《何家村遺寶與粟特文化》，從考古學和器物學的角度入手，對何家村遺寶中的若干具有粟特文化特徵，而為唐朝所製造的器物進行了解說。指出這種反傳統的模仿本身也是文化創新的過程，如果不與當時人的生活、習俗和審美有效的結合，就無法流行；這些仿製品更多地反映了唐人的設計意圖，表明外來文化演變的軌跡；而且這種局部改造往往不涉及功能上的變化，只是審美上符合唐人的願望；有些仿效後的創新，已不能看到外來文化的痕跡，並成為 8 世紀唐代金銀器的較普遍做法，甚至影響到陶瓷器物的製作。無論這批器物為粟特工匠在中國製造抑或由中國工匠仿造，都需要有相應的技術、文化背景以及必要的樣品。山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張慶捷研究員《北朝隋唐粟特的“胡騰舞”》，以近年來考古發現的舞蹈圖案論證了文獻中的“胡騰舞”與“胡旋舞”乃來源於粟特地區的兩種不同舞蹈。並對“胡騰舞”的舞者、舞姿、伴奏、與酒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以補文獻之不足。北京大學段晴教授《筋斗背後的故事》，認為胡旋與胡騰均源自同一個粟特語詞匯，即一個基於 wrt-詞根的詞；胡旋是意譯，胡騰是其音譯。筋斗則是基於 *gart-詞根，屬於伊朗語的另一脈，並表達了粟特人的胡騰舞之魂。

下午第一場由齊東方教授主持。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黎北嵐 (Pénélope Riboud) 博士《祆神崇拜：中國境內的中亞聚落信仰何種宗教？》，認為漢文史料中的祆神可以與粟特本土相對應，但在華中亞胡人所信奉宗教的實際情況，比起僅用“祆教”的簡單概括遠為複雜。粟特的宗教混融並為當時中國人所認識。突厥—蒙古人的信仰同樣也屬“祆教”，這種用語上的混亂是由於 6 世紀末在中國東部和北部地方開始形成的突厥粟特混合文化造成的。會上黎北嵐重點介紹了法國集美博物館正在展出的一組粟特石雕，對其進行了初步解說。德國柏林獨立研究者王丁博士《南太后考：新疆博物館藏吐魯番安伽勒克出土的金光明經題記 (65TIN:29) 解說》，通過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考察，將南太后比定為粟特語的那那女主，認為胡天南太后祠為一座而不是兩座神祠。如考證得實，祆教史有望獲得一件地點、年代、內容明確的史料，但學者對此提出不少質疑。

第二場由吉田豐教授主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芮傳明研究員《東方摩尼教的實踐及其演變》，認為摩尼教的教義體現了極端的反俗世的觀念，但是東方摩尼教之實踐卻與教義大相徑庭，其動機轉變與主要布教者粟特人的品格特性頗有關係。哈佛大學的馬小鶴博士《粟特文 t' mp' r (肉身) 考》，分析了吐魯番新出粟特文文獻中 t' mp' r (肉體) 等詞語，用柏拉圖有關希臘文著作中的詞語做了比較，追溯了摩尼教科普特文、漢文和伊朗語、回鶻語文獻中的有關資料，揭示了摩尼教身體觀的複雜性。一方面，摩尼教很可能受到柏拉圖思想，特別是《蒂邁歐篇》的影響，將人的身體視為十三種無明暗力的組合，是囚禁明性的地獄、墳墓和牢獄。另一方面，摩尼教並不忽視身體、而是教導人們征服身體。

最後，由魏義天教授和榮新江教授進行大會總結發言，他們對支持會議的各方表示感謝，前者對各位學者的報告進行了評說，後者指出粟特人在中國這一研究課題未來發展的方向。

日本における最近 10 年間の古チベット語文獻研究

岩尾一史 (日本戸市外國語大學)

大まかに言つて、日本における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の研究は一旦 1980 年代前半に盛んになり、その後減少したが、1990 年代後半から再度増えつつある。特にここ数年、大英圖書館の 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http://idp.bl.uk/> 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に、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をめぐる研究環境は格段に改善されており、今後の研究の更なる増加・進展が期待される。以下、最近 10 年の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に関わる研究成果と動向を、簡単に紹介してみよう。

まず、山口瑞鳳氏が『チベット語文語文法』(東京: 春秋社 1998) と、『要訣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成田: 成田山新勝寺 2003)、『概説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東京: 春秋社 2002) を出版された。氏の長年に渉るチベット語文法研究のエッセンスとも言うべきものであるが、古チベット語から近世チベット文語 (17 世紀以降) に至るまで網羅する典拠数には圧倒される。

武内紹人氏の 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Kyoto: Daizo syuppan 1995) は、古チベット語契約文書を集成し譯注・研究したものである。古チベット語読解のみならず、契約文書研究、敦煌史研究等各分野において、文字通り劃期的成果である¹。また、氏はスタイン蒐集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紙文書、木簡の整理を担当しているが、その成果として紙文書全ての寫眞・録文・音節索引が 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3 vols (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7-1998) として出版された。木簡については、『中央アジア出土チベット語木簡の総合的研究』(平成 12 年度-14 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 (C) (2) 研究成果報告書 研究代表者: 武内紹人 2003) がある。その他には、"Three Old Tibetan contracts in the Sven Hedin collec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7-3(1994), pp. 576-587, "KH. Tib. 4(XT-4): Contracts for the borrowing of barley", *Manuscripta Orientalia*, 1-1(1995), pp. 49-52、[スタイン蒐集トルキスタン出土古チベット語文書一概要とカタログ作成プロジェクト]、『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I(1996)、121-137 頁、[歸義軍期から西夏時代のチベット語文書とチベット語使用]、『東方學』第 104 輯(2002)、124-106 頁 (逆頁) があり、また長野泰彦氏を研究代表者とする一連のボン教・シヤンシエン語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の一環として、敦煌チベット語文獻中に存在するシヤンシエン語文獻の研究、[Zhang-zhung 語およびボン教関連チベット語文獻の解析とデータベース化]、『チベット文化域におけるボン教文化の研究』(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國際學術研

究: 學術調査 研究課題番号 08041040 研究成果報告書 研究代表者: 長野泰彦 1999)、231-252 頁、長野泰彦、上田澄江両氏と連名で、“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ld Zhangzhung Language and Manuscripts”, Yasuhiko Nagano, Randy J. LaPolla (eds), *New Research on Zhangzhung and Related Himalayan Language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1)、pp. 45-96 を出している。

武内紹人氏を中心に若手研究者が集まり、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の研究會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ここに報告しておきたい。1999 年以來、ほぼ月に一度のペースで神戸市外國語大學にて行われ、規模は小さいながらも実質的な研究會となっている。今のところこの研究會で得られた成果は各人がそれぞれ研究發表するという形になっているが、5 年目を迎えた今、會として何らかの形で情報發信をすることも検討中である。

今枝由郎氏 (在フランス) には、“A propos du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999”, P. Harrison and G. Schopen (eds), *Sūryacandrāya : essays in honour of Akira Yuyam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Swisttal-Odendorf :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1998), pp. 87-94、「フランス國立圖書館所藏ペリオ將來敦煌チベット語文獻について」『佛教學セミナー』68 号 (1998)、83-72 頁 (逆頁)、がある。今枝氏は、後に紹介する昨今の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の校訂テキスト音節索引集作成における原動力である。

高田時雄氏の諸研究は、一貫して 9-10 世紀敦煌地域における多言語受容の解明を目指す。古チベット語關係のものを列擧すれば、「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3 卷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183-190 頁、“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 *Acta Asiatica* 78 (2000), pp. 49-70、「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發見寫本から見た敦煌における多言語使用の概観」、『石窟寺院の成立と變容』(平成 10 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 (2) 研究成果報告書 研究代表者: 桑山正進 2001)、「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的藏文資料」、郝春文 (主編)『敦煌文獻論集: 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1)、635-652 頁、「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項楚・鄭阿財 (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 巴蜀書社 2003)、267-273 頁がある。

佛教關係では、上山大峻氏の「吳和尚藏書目錄 (効 76) について」、『日本西藏學會々報』第 41-42 号 (1997)、3-9 頁があり、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漢語文獻「効 76」が吳法成の藏書目錄であることを紹介、研究を加える。また、敦煌チベット語密教文獻、密教圖像研究では世界的に第一人者である田中公明氏の諸研究が、書き下ろしの研究とともに『敦煌 密教と美術』(京都: 法藏館 2000) として一冊にまとめられた。

最近の動向として、比較的若手の研究者が何人か現れた。大原良通氏は古代チベットを視野に入れた東アジア史研究を続けているが、最近その諸成果を『王權の確立と授受- 唐・古代チベット帝國 (吐蕃) ・南詔國を中心として-』(東京: 汲古書院 2003) としてまとめられた。

石川巖氏は、1998 年に発表した「古代チベット語 chab srid および chu srid の語義」『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 13 号、35-54 頁、以来、主に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に拠り、古代チベットの歴史・宗教について多くの研究を發表している。列擧すると、次の通り。「吐蕃のルに関する一考察—『編年記』における khram「木簡帳簿」の用例から—」、『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IV (1999)、103-116 頁、「古代チベットにおける靈神祭儀の物語—敦煌文獻 P. T. 126 第二部の分析—」、『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菊池英夫教授 山崎利男教授古稀記念アジア史論叢』第 24 号 (2000)、169-186 頁、「古代チベットにおける靈神祭儀の物語 (翻譯編)」、『東方』第 16 号 (2001)、145-158 頁、「チベット文化はいかにして誕生したのであろうカーツァン地方西部における吐蕃王朝の統治状況—」、『東方』第 17 号 (2001)、111-122 頁、「羊同の地理比定に関する研究動向」、『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中央大學東洋史學專攻創設五十周年記念 アジア史論叢』第 26 号 (2002)、279-298 頁、「歸義軍期チベット語外交文書 P. T. 1082 について」、『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 18 号 (2003)、23-37 頁+2pls、「吐蕃帝國のマトム (rMa grom) について」、『日本西藏學會々報』第 49 号 (2003)、37-46 頁。

坂尻彰宏氏は主に敦煌漢語文獻によって歸義軍政權の研究を精力的にすすめているが、漢語文と併せて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も利用したのが、「歸義軍時代のチベット文牧畜關係文書」、『史學雜誌』第 111 編第 11 号 (2002)、57-84 頁である。P. t. 1124 に詳細な譯注を加え、併せて当時の漢語、チベット語公文書の書式について考察をしている。

また、筆者も最近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に拠って幾つかの研究を發表した：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戸」、『東洋史研究』第 59 卷第 3 号 (2001)、1-33 頁、「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を中心に—」、『史林』第 86 卷第 4 号 (2003)、1-31 頁、「吐蕃の万戸 (khri sde) について」、『日本西藏學會々報』第 30 号 (2004 印刷中)。

文獻學にとってデータベースの重要性は、昨今の漢語資料の状況を見れば一目瞭然である。特殊文字を余り使う必要がなく、翻字が電子テキストと比較的相性が良いこともあって、チベット語文獻のデータベース化は急速に進みつつあるが²、特に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に関しては、日本が拠点となっている。Yoshiro Imaeda, Tsuguhito Takeuchi, Izumi Hoshi, Yorimihi Ohara, Iwao Ishikawa (eds),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ome IV: Corpus Syllabique (Tokyo: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et Cultures d'Asie et d'Afrique (ILCAA) 2001) が、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から出版された。ペリオ蒐集敦煌チベット語文獻のうち宗教關係文獻の校訂テキスト選集・音節索引であり、1990 年にパリ國立圖書館から出版された同シリーズ Tome III (歴史關係文獻 11 点の校訂テキストとその音節索引、今枝由郎・武内紹人両氏編集) の続巻である。なお、Tome IV の編集者達は引き続き続巻の出版を計画中である。

Choix の編集陣が平行して進めているのが、「古代チベット語文獻オンライン」(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略称: OTDO) <http://www.aa.tufs.ac.jp/~hoshi/OTDO/>である。星泉氏(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を代表者とす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古代チベット語の文獻資料を電子化し、検索可能な形で提供するのが目的で、web上にて音節検索が出来、さらに Perl の正規表現を使うことによつて様々な条件付検索が可能である。校訂の過程で現物文獻の確認を必須としているので作業ペースは必ずしも早くないが、現在収録された文獻・碑文は 40 点弱だが、暫時増えていく予定である³。

【注】

- 1 なお、坂尻彰宏氏による書評があるので参照されたい。『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I、1996、139-150 頁。
- 2 代表的なものを挙げれば、チベット大藏經を中心とした電子テキストを提供する ACIP (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 <http://www.asianclassics.org/>や、チベットの人名、地名、書名その他をデータベース化する TBRC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http://www.tbrc.org/>がある。
- 3 将来的にこのチベット語文獻データベースを発展させ、古チベット語文獻のみならず、中世チベット語、現代チベット語文獻も包含しようと検討中である。

明海大學和敦煌學研究

荒見泰史(日本明海大學)

明海大學位於東京市中心東 15 公里之處，坐落在東京東郊的千葉縣浦安市內，距離東京迪士尼樂園 2、3 公里。雖然不在東京都裏面，而是在千葉縣裏，但是離東京市中心很近，交通等各個方面都很便利。

明海大學的前身是城西齒科大學，校園在東京西郊的埼玉縣阪戶市。1988 年在浦安市創立了外國語學部、不動產學部、經濟學部等文科三學部，從而演變成了總合性大學，同時改稱為明海大學了。

明海大學成為文科大學歷史並不久，因而圖書館、各個學部的資料室裏有關文科方面的資料並不是齊全，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有關敦煌、吐魯番研究方面的資料的數量和質量卻不容小覷，除了《敦煌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等基本資料外，還有不少基本工具書和論文資料等等。雖然不很齊全，但是對新興的文科學部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何況還藏有一些敦煌學早期的資料呢。難怪，創立外國語學部時候的教授名單上列有敦煌學者金岡照光先生的名字。

金岡照光先生 1930 年出生在埼玉縣。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後，從 1958 年到 1990 年在東洋大學任教，1968 年昇教授。日本國內在東方學、中國學方面有代表性的學會有東方學會、日本道教學會、日本中國學會，金岡照光先生擔任過理事、專門委員等重要工作。主要專著有《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東洋文庫、1971 年)、《敦煌の文學》(大藏出版社、1971 年)、《敦煌の民衆》(評論社、1972 年)、《敦煌文獻目錄》(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1990 年)等等。還參與了一系列《講座敦煌》的企畫和編輯工作，出版了《敦煌の文學文獻》(講座敦煌 9、大東出版社、1990 年)。

創設明海大學外國語學部當時，金岡先生雖然時任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所長，但是為創設明海大學的新學部做出了很大貢獻，之後被聘為外國語學部的特任教授。遺憾的是不久於 1990 年 3 月因為肝機能不全突然而逝。

後來，金岡照光先生生前所有的藏書、筆記和原稿等都被金岡先生的家屬捐獻給了明海大學的圖書館和中國語專科的研究室，如今這些“金岡文庫”成為明海大學所藏的敦煌吐魯番方面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來我一直在對金岡先生的筆記、原稿作整理工作，前不久在金岡先生的學生游佐昇先生(在任明海大學教授)主持下，編輯出版了《敦煌文獻と中國文學》(五曜書房、2000 年)一書，即將整理出版的還有《王陵變》、《李陵變文》等講史類變文的注釋部分。

去年 11 月明海大學主辦了日本道教學會第 54 回大會。道教學會是在日本國內很有代表性的組織，一年開辦一次大會，出版雜誌《東方宗教》。它的研究範圍不僅限於道教方面，還包括佛教、中國的民間信仰。這次大會敦煌學者落合俊典先生的主持下獲得了圓滿成

功，筆者在會上也發表了一些拙見，後來發表於《東方宗教》（103 號）。

如上所說，明海大學作為文科大學的歷史雖然時間不長，但是一向很重視中國文學、中國語學方面的研究，除了擁有敦煌學研究力量外，還有從事魯迅研究的伊藤虎丸先生、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尾上兼英先生、竹田晃先生、語言學方面的輿水優先生、史有為先生等，都大大充實了明海大學的學術力量。

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本に関する近刊二點 ——『敦煌寫本の書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三井文庫所藏本を中心として—』 と『三井文庫別館藏品圖録 敦煌寫經—北三井家』 辻正博 (滋賀醫科大學)

はじめに

2004 年 1 月 17 日から 2 月 22 日にかけて、東京の三井文庫別館にて「シルクロードの至寶敦煌寫經」と銘打った展観が開催され、筆者も參觀の機会を得た。展観に際して、圖録『三井文庫別館藏品圖録 敦煌寫經—北三井家』(2004 年 1 月發行。以下、『三井圖録』と略稱)が刊行され、また、これに先だつて赤尾榮慶氏(京都國立博物館)らによる研究の成果が『敦煌寫本の書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三井文庫所藏本を中心として—』(平成 15 年度科学研究費成果報告書、2003 年 3 月發行。以下、『報告書』と略稱)として刊行されている。小文は、これら 2 冊の紹介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

1、従來の目録と圖録

三井文庫所藏の敦煌寫本については、すでに施萍亭氏による目録があり、總數 112 點におよぶ敦煌寫本に新番號(北三井 001~112)を付して、名稱・首題・尾題・説明(毎紙の法量・行數や特徴など)の項目に分けて記述がなされている¹。

これ以前にも、戦前、羽田亨博士の企畫された“日本における敦煌出土經總目録”作成の一環として、東洋文庫の岩井大慧氏が 1942 年に行なつた調査に基づいて假目録(「燉煌出土經調書」)を作っている²。また、圖録としては、『第三十六回史學會大會 三井家主催展覽會圖録』(史學會編、1935 年 5 月發行)や『第貳拾五回大藏會展観目録』(東京大藏會、1939 年 12 月發行)が存する。いずれも、三井家ならびに三井文庫が學術界に裨益せんとして所藏品を展観に供した際に作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り、一部の經卷についてコロタイプ印刷の美しい寫眞が添えられている(表 1 参照)。

こうした戦前の動向から推測するに、戦時および戦後の社會混亂さえなければ、これら敦煌寫經の整理はもっと早い時期に行なわれていたように思われる。

2、『報告書』の研究史的意義

1991 年、施氏の調査申し込みを契機に着手された三井文庫の敦煌寫本整理は、2000~2002 年度にかけて行なわれた、赤尾氏を研究代表者とする科學研究費による調査研究によつて本格化し、所藏の敦煌寫本について徹底的な検討が加えられることとなつた。

『報告書』は、赤尾氏のほか、石塚晴通氏(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富田淳氏(東京國立博物館)、清水實氏(財團法人三井文庫)、樋口一貴氏(同前)らの執筆にかかる。その内容は、次のようである(括弧内は執筆者。敬稱略。(a)~(d)の符號は筆者が附した)。

はしがき

調査概要(赤尾)……(a)

圖版

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の傳來と調査の経緯(清水・樋口)……(b)

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目録

圖版解説(赤尾・石塚)

華嚴經卷第四十六の問題點(石塚)……(c)

張廣建について (富田) ……(d)

※ (a) (b) については英文譯と中文譯が、(c) (d) については中文譯が附されている。

調査内容とその成果とを概述した「調査概要」以下、『報告書』のうちで注目すべき点について列挙しておく。

(1) 調査の結果、三井文庫の藏品中には、世界的に見て貴重とされる寫本を含め、唐代 7・8 世紀に書寫された優品が多く存在す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た。『報告書』は、所謂「長安宮廷寫經」として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文庫番號: 025-014-009、施氏編號: 北三井 035。以下同じ)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025-014-010、北三井 04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025-010-031、北三井 032)

の 3 点を、則天武后期の優品として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025-010-014、北三井 056)

大乘密嚴經卷下 (025-010-048、北三井 097)

の 2 点を挙げ、また、景龍 2 年 (708) の奥書を有する首尾完存の貴重な經卷として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025-014-012、北三井 058)

を特筆している。

(2) 三井文庫所藏の敦煌寫經の多くが、かつて甘肅督軍をつとめた張廣建 (1867~?) の舊藏に繋ることに言及し、併せて三井文庫所藏の資料である「支那甘肅督軍張廣建舊藏燉煌發掘古寫經目錄」(1928 年) を紹介している。當時の評価 (上々・上中・中上・中・次の五段階) と買上げ金額 (總額 16,500 圓) を記したこの冊子は、全葉が精細なモノクロ寫真として圖版の部に収められているが、(b) において清水氏らが指摘するように、この冊子に記された經卷が現在の三井文庫所藏の敦煌寫本と完全に一致するとも言い難く、更に言えば、冊子作成に関する複雑な事情 (購入の経緯その他) も考慮せねばならず、その取扱いには慎重を要するようである。張廣建に関しては、(d) の記述が要領を得ている。

(3) 本『報告書』の最大の特徴は、偽寫本と考えられる寫本について、判断基準を明記した上で、目錄中に〈存疑〉と表記したことであろう。〈存疑〉と表記した場合の基準として、赤尾氏は (a) において次の 3 点を掲げている。

- ・ 料紙の風合いに關して…時代性の缺如および紙色の異常
 - ・ 書法や字體に關して…時代性の缺如や破綻した書法および字體の存在
- 料紙や書寫の形式に關して…同時代の寫本や僚卷と思われる寫本が有する一般的な傾向の缺如や破綻の存在

これらの基準に基づいて偽寫本と判断された寫本の中には、これまで 5 世紀の書寫とされてきた「政方華中等經」(025-014-001、北三井 049) 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六」(025-014-002、北三井 051) が含まれている。また、戦前の展観で公開された寫本も、かなりの部分が偽寫本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表 1 参照)。世界各地の敦煌文獻コレクション中における偽寫本の問題は、1998 年にロンドン・大英圖書館で開かれ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とその報告書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3: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2002. において熱心に議論され、あらためて學界の注目を集めるようになった。本『報告書』もそうした流れの上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が、それにしても、藏品中における偽寫本 (と指摘された經卷) の存在を、高い學問の見地に立つて認められた三井文庫の態度に對しては、深い敬意を表したい。

さて、これらの判断基準は、いずれも外見の觀察により得られる情報に據るものである。近年、自然科学 (物理学・化学) 的な分析手法による古寫本研究も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り、文献學の成果と相俟って着實な成果を収めつつある³。しかし、敦煌寫本の場合、分

析材料が採取できないことが多いように思われ、やはり非破壊的な分析方法を中心に据えて研究を進めざるを得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報告書』に記された真偽の判断は、赤尾氏らがこれまで見られてきた無数の敦煌寫本の観察結果から歸納的に得られたもの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⁴。石塚氏による (c) の文章や赤尾氏によ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六」の解説(『三井圖録』67頁)などは、こうした判断がどのようなプロセスを経て得られたかを知るよすがとなろう。

なお、『報告書』所載の寫眞は、數こそ多くないものの、既發表のものにはない優れた特徴を有している。おそらく、圖版解説において用紙の品質や罫目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いることに配慮してであろう、掲載されている寫眞はほとんど全て、寫本の背後から透過光を當てて撮影されたものである。『三井圖録』所掲の寫眞を併せ見ることによつて、讀者はより具體的な寫本のイメージを得られることであろう。

3、『三井圖録』公刊の意義

所藏する敦煌寫本の一般公開に際して公刊された『三井圖録』の内容は、次の通りである(括弧内は執筆者。敬稱略。(e)～(g)の符號は筆者が附した)。

はじめに

敦煌寫經研究の現在(石塚晴通)……(e)

圖版

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の傳來と調査の経緯(清水實・樋口一貴)……(f)

張廣建について……(g)

圖版解説(赤尾榮慶)

※巻末に、掲載圖版の英文リストが附されている。

上記(e)～(g)のうち、(f)は『報告書』所載の文章に加筆したもの、(g)は『報告書』所掲の文章の文字を修訂したもの、である。

今回の展覧は、「はじめに」及び(e)のなかで略述されているように、赤尾氏らが三井文庫とともに行なつた學術調査の成果を承けて開催された。展示された34點の敦煌寫經はいずれも、『報告書』において眞品(〈存疑〉ではない)と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なお、『報告書』において〈存疑〉とされ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六」が「參考出品」として展示された。本圖録によつて初めて寫眞が公表された寫本も少なくない(表1参照)。掲載された寫眞はすべてカラーで、寫本の巻頭と巻末の現在の姿が鮮明に示されている。

(e)において石塚氏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ように、「張廣建舊藏と傳えられ1928年當時の一級の敦煌本コレクション」であつた三井文庫の敦煌寫經にして、藏品112點のうち眞品は34點である。言い換えれば、所藏する敦煌寫經の70%が偽寫本であつ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この比率の評価については意見が分かるであろう。ただこの數字が、石塚氏の文章中に引用されたロシア・臺灣の研究者の、「これ(=スタイン第三次探檢時の収集品中の偽寫本—筆者注)が若し偽寫本ならば、自分たちのコレクションは七割までが偽寫本となつてしまう」という發言と偶然にも一致しているのは、興味深いことである。

また、『報告書』にて紹介された「支那甘肅督軍張廣建舊藏燉煌發掘古寫經目録」に名前が見え、北三井家の敦煌寫經購入に際して關與した人物である「田中三郎」について、『報告書』では未詳とされていたが、(f)では坂上康俊氏(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からの情報⁵などを總合して、およそ次のような経歴を紹介している。

田中三郎(1887～1934) 福岡縣生まれ。高等小學校卒業後、中國大陸に渡り商人と

して成功。のち、北京・宣武門外南横街にて普濟醫院を經營、1916 年に同醫院の婦長・星野ヨシ（芳子とも）と結婚。書畫・古錢の収集家でもあり、三井鑛山會社の瀨尾外與藏（號：向陵亭。1863～1927）と親交あり、新町三井家當主・高堅の知遇を得て、1929 年と 1931 年の 2 度にわたり戰國時代の古錢（河南省出土）を譲渡した他、その拓本収集に際しても仲介者の一人となっている（「李思訓碑」（項墨林本。1925 年仲介）、「集字聖教序」（邵松年本。1928 年仲介）、「孔子廟堂碑」（陝西本。1929 年仲介））。1929 年、夫人が死去し、1932 年に歸國、故郷の筑紫村に邸宅を構える（向陽庵）。1934 年、歿。戦後、そのコレクションは賣却され、その一部（敦煌寫經を含む）が 1949 年に九州大學の所藏に歸した。

なお、張廣建舊藏の敦煌寫經の多くは、白堅（1883～?）なる収集家の手を経て散出したとい⁶。その一部を 1928 年に三井家が購入するに至る過程で、白堅が何らかの形で關與していた可能性も考えられる。

4、むすびにかえて

その存在を廣く知られていながら、これまでごく一部しか知られてこなかつた三井文庫所藏の敦煌寫本が、一般に向けて展觀されたことは喜ばしい限りである。しかも、展觀に供された 34 點の寫本はいずれも、専門家による學術調査を経て「眞品」とされたものばかりであり、偽寫本と判断されたものは、「参考出品」（1 點）として明確に區別されていた。その意味で、このたびの展觀は學術的に見ても非常に意義深いものであつたと言ひ得る。これを契機に今後、日本國內の敦煌寫本コレクションの學術的研究が進展していくことを祈りつつ、拙ない紹介の筆を擱きたい。

【注】

- 1 施萍亭「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敍録（一）——三井文庫所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1993-2）。
- 2 清水實・樋口一貴「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經の傳來と調査の経緯」（『三井圖録』所收）52 頁。
- 3 石塚晴通「敦煌寫經研究の現在」（『三井圖録』所收）8 頁にて紹介されている國際シンポジウム「佛の來た道 2003 シルクロード文物と現代科學」（2003 年 9 月、龍谷大學にて開催）は、その一例である。
- 4 『報告書』は、張廣建の鑑藏印が捺された寫本 6 點のうち 4 點までを〈存疑〉としている（印影は圖版 1、7、参考圖版 1～4 に見える）。鑑藏印の有無が眞偽を判断する決め手にはならないことを、改めて思い知らされる。
- 5 詳細は、坂上康俊「九州大學文學部所藏『敦煌文書』の來歴」（『史淵』141、2004 年）を参照のこと。
- 6 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214 頁；富田淳「張廣建について」（『三井圖録』所收）55 頁。

讀《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劄記

鄭炳林 (蘭州大學)

李無虧是唐代沙州歷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在敦煌寫本《沙州都督府圖經》中多次記載到李無虧的事迹，從記載看李無虧是武周時期的人物，大約武則天載初年間出任沙州刺史，主要事迹為修建了苦水上的長城堰，對敦煌地區的驛站進行了調整，使其更加合理化，其次為了討好武則天，在敦煌地區製造很多祥瑞，為武則天當皇帝製造根據。最近《考古與文物》2004 年第 1 期發表了陝西楊陵區文物管理所王團戰文章《大周沙州刺史李無虧墓及徵集到的三方唐代墓誌》，其中就刊佈有李無虧墓誌銘，對於研究敦煌歷史地理非常重要。據王團戰先生的論文李無虧墓發現於 2002 年 3 月 27 日，地點在楊陵家和園，出土的有墓門和墓誌，墓門上繪製朱雀、青龍、白虎以及天王像，特別是李無虧墓誌銘最為珍貴。¹ 同期還刊登有李慧、曹發展合撰的《楊陵區文管所四方唐墓誌初探》一文對李無虧墓誌銘等四方唐墓誌擁有的學術價值作了力所能及的探討。² 從這篇論文內容看，論述還很不到位，有很多問題都沒有涉及或者論述很少。因此李無虧墓誌銘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根據王團戰文章，墓蓋一方，上有四行十二字篆書：“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墓誌一方，內容根據王團戰先生釋錄如下：

大周故太中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事守沙州刺史兼豆廬經略使上柱國長城縣開國公贈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使李府君墓誌銘並序

公諱無虧，字有待，本隴西成紀人，漢丞相蔡之後也。虎雲表夢，才子彰邁種之風；龍德在躬，上仙啓無為之績。宗為魏將，名重七雄；信總秦兵，威吞六合。成隴西之冠族，為上京之羽儀。九代祖崇，後魏幽州刺史，子孫因家焉，故今更為范陽郡人也。唐杜移晉，無褻世祿之榮；和壁入秦，不減連城之價。人物世載，鼎鼐 / 重光，逾四鉉於袁門，掩十輪於楊氏。曾祖子肅，北齊平原太守、范陽侯。祖叔琳，隋考功郎、齊州刺史，襲爵 / 范陽公。並道暎簪裾，器標瑚璉。熊旌犀節，膺方嶽之隆；白馬丹書，葉山河之誓。父行機，唐益州九隴縣令、梓州治中、上柱國、淮陰縣開國公。風情簡亮，志業祥和，懸明鏡於心台，植長松於識宇。才高百奏，學富五車，顧張束於錙銖，納王劉於掌握。縮銅章於劍右，事屈烹雞；轉星屏於郡中，初將展驥。東道之姿，方騁西 / 崦之景；遽淪（論）道長，運促位不充量。公資二象之淑靈，含五常之秀氣。渾金璞玉，絕名言之先；瓊樹瑤林，出 / 風塵之外。識用高朗，披明月於重雲；儀錶端凝，建標霞於層嶽。宏覽載籍，興屬清新，似夢靈蛟，如吐飛鳳。 / 至於白猿劍術；玄女兵符，不待黃石之期，暗合孫吳之旨。心契管樂，志立功名，逝將因海運而驥鱗，排天 / 關而舉翼。初為國子生，麟德二年以進士擢第，即選授秘書省讎校。遊道璧水，嘉譽比於林宗；射策金門， / 甲科同於稚主。校書之職，叔師播美於東京。秘閣之才，令思見稱於南晉。惟公英挺，歷駕前倚。總章二年 / 授定州北平縣丞，尋遷許州司兵，又改宋州司法。以棟梁之具，勞州縣之班。百煉含霜，尚蘊拂鍾之用；千 / 里絕電，未申噴玉之蹤。處順安排，蓋淡如也。永淳元年，除並州陽曲縣令。化若神明，澤豐雲雨，翔鸞感化， / 乳雉依仁。於時獫狁張，戎旗屢警，龍山晉水，烽燧相望，月滿風秋，煙塵不息。公下琴堂而赴軍幕，罷磬 / 學而議兵韜，奇正兼施，應變多緒。蕩孽鞮之孽，若火燎原；斬庶蠱之妖，如風卷檣。冰消雲徹，穀靜山空。朝廷嘉公之勳，特授上柱國，又就加朝散大夫，並降璽書慰勞。垂拱三年，授芮州府果毅，仍兼長 / 上致果之職。實掌外兵警衛，所資寄重中禁。千廬微道，彰懸猷之勞；七萃羽林，應司階之列。軍政綢繆，廊 / 廡增輝，四郡遐蕃，三危極裔。北鄰白虜，南接青羌，式遏疆垂，允歸人傑。載初元年，授公沙州刺史，兼豆廬 / 軍經略使。昔潁川太守，詎參五伐之謀；細柳將軍，豈總六條之務。公才兼文武，任光內外。仁明之政，共春 / 露同沾；金鼓之威，與秋霜比肅。匈奴遁迹，魏尚之在雲中；先零殄喪，段穎之征隴外。

長壽二年，加太中大 / 夫，又進爵長城縣開國公，並賞懋功也。雖頻剪逆徒，而余氛尚梗，狡虜數萬，來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 / 鐵石，奮不顧命，甘赴國憂。雖則斬將奪旗，雄心克振，然通中刮骨，其傷遂深。綏復之禍忽臻，馬革之悲俄 / 及。以延載元年八月七日終於官舍，時年五十八。 / 天子聞而傷之，乃下制曰：顯忠悼往，有國通規，圖勞飾終，列代彝訓。故沙州刺史李無虧，以狡寇 / 陸梁，鼠竊邊鄙，遂能被堅執銳，率衆先鋒。臨難忘生，捐軀徇節，英勇奮發，僵仆爲期。念茲誠概，良可嘉憫， / 口贈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並贈物七十段，還日官爲造靈輿。即以萬歲登封元年歲次景申壹 / 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葬於稷州武功縣三時原。玉門之關，雖非生入；石柱之境，即兆神塋。特旌加等之 / 榮，兼申贈綬之澤。長子涼州神鳥縣丞鳴鶴，承世德之基，奉義方之訓，踐霜庭而增慕，攀風樹而不追。因 / 心之哀，昊天閔極。以爲光昭令德，方胎終古，不鑄趙樓之字，誰辯滕城之墳。於是延翠石於他山，紀玄銘 / 於窆室。庶陵遷穀徙，永識南陽之阡；地久天長，不昧西邙之塚。乃爲文曰： / 緯降祉，川嶽炳靈，誕生世哲，郁號人英。渥水龍種，鍾山玉榮，泉河比量，晷耀齊明。(其一)肅肅風飄，森森矛 / 戟，道優從政，聲芬揚曆。爲龍爲光，如矜如璧，九萬風舉，三千水激。(其二)迢矣可右，悠哉塞垣，胡塵夕暗，羌笛 / 朝喧。秘略泉湧，英威電奔，狼居已禪，桃李無言。(其三)爰整龍旗，將清蟻結，精貫飛景，心貞蛟雪。陸陌無繼，浚 / 稽箭竭，尚理溫鬢，猶持何節。(其四)先軫不及，望之死事，寵以徽章，優其賄諡。何以送往，輕車秘器，何以贈行， / 銅符竹使。(其五)龍川南帶，鳳嶺北臨，佳城鬱鬱，駟馬駸駸。山門霧結，隴首風吟，征西之墓，名立身沈。(其六) / 大周萬歲登封元年歲次景申壹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窆 /

應當指出的是王團戰先生的釋文還有很多問題，如將沙州釋作沙洲，共出現了兩處，對照原文拓片照片，墓誌原作“州”，屬於釋文錯誤。其次錄文有“九代祖崇，後魏幽州刺史，子孫因家焉，故今更爲范陽乃人也。”乃，爲錯釋文字，按地名之後加乃字的現象幾乎沒有，范陽，漢涿郡之涿縣，曹魏文帝改爲范陽郡，晉爲范陽國，後魏爲范陽郡，隋爲涿縣，屬幽州。唐武德元年改爲幽州總管府，七年改爲大都督府，又改涿縣爲范陽，天寶元年改范陽郡。³ 武周時期沒有范陽郡設置，此處使用爲北朝舊望。根據《唐河陽節度押衙澤州高平鎮遏兵馬使元郇墓誌銘》稱：“公諱郇，字慕周，河南郡人也。”《曹謙墓誌銘》記載：“府君諱謙，字口退，宋州譙郡人也。”《唐趙留四墓誌銘》記載“君諱留四，本南陽郡人也。”《薛世感墓誌銘》記載“君諱世感，其先河東郡人也。”《廉元泰墓誌銘》記載“君諱元泰，河東郡人也。”《張京墓誌銘》記載“府君本封清河郡人也。”⁴ 我們查閱唐代墓誌，地名之後帶郡或者縣者有之，但是帶乃字還沒有發現。唐幽州曾置范陽郡，兩唐書地理志都記載爲幽州范陽郡，因此我們懷疑乃字很可能是郡之誤。由於原墓誌影印很小，比較模糊，象這類情況還有很多。

其次李慧、曹發展合撰的《楊陝區文管所四方唐墓誌初探》對這篇墓誌銘的論述也很不到位，所參考的文獻很有限。參考文獻只有郁賢皓先生所著《唐刺史考全編》中關於李無虧條，而《唐刺史考全編》僅僅引用了敦煌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廿祥瑞條中的三條記載，敘述到清泉驛、東泉驛也有關於李無虧的記載。實際上《沙州都督府圖》有很多關於李無虧的記載，可惜作者沒有去親自檢索一下，以至於失之交肩。更爲可惜的是作者對李無虧家世也沒有進行任何探討，認爲史書均無任何記載，並一筆帶過。

二、沙州刺史李無虧家世初探

沙州刺史李無虧家世中很多可以從歷史上找到其活動的脈絡，通過這些人物事迹的考訂，可以看出李無虧墓誌銘和敦煌文書記載都是有根據的。

《李無虧墓誌銘》記載到李無虧家世時稱：“公諱無虧，字有待，本隴西成紀人，漢丞相蔡之後也。虎雲表夢，才子彰邁種之風；龍德在躬，上仙啓無爲之績。宗爲魏將，名重七雄；信總秦兵，威吞六合。成隴西之冠族，爲上京之羽儀。九代祖崇，後魏幽州刺史，子孫因家焉，故今更爲范陽郡人也。”這與敦煌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長城堰條記載基本一致：“無虧，漢丞相蔡之後，自隴西徙居幽州之范陽。”兩者之間的矛盾地方是李無虧家族是漢代還是北魏從隴西成紀遷徙到幽州，從李無虧墓誌銘看，是其九代祖崇出任北魏幽州刺史時從隴西成紀遷徙到幽州范陽；而《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的時間是似乎是從漢代

李蔡之後就已經從隴西成紀遷徙到范陽，雖然這裏有追述成分，記載李無虧五代祖司空訴就已經生活在范陽。李無虧家族何時從隴西遷徙到幽州范陽，作為敦煌人也不是很清楚，或者圖經記載省略，將部分內容省略掉了，因此我們看到的記載與墓誌銘有所出入。

漢丞相李蔡，西漢武帝時期人，《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元狩元年“樂安侯李蔡為御史大夫。一年遷。”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五年“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殺。”⁵李蔡所犯罪自殺事件，《漢書·武帝紀》記載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顏師古注曰：“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墻地。’”⁶關於李蔡事迹《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⁷《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同。“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塚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⁸《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李蔡自殺原因：“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塚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⁹這樣我們知道李蔡與李廣為兄弟，史書記載到李廣時稱隴西成紀人，作為李蔡之後的李無虧稱祖籍隴西成紀人就是從這裏來的。

墓誌稱“信總秦兵，威吞六合。”信，指李信，《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¹⁰《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¹¹根據《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燕太子丹為燕王所殺以獻秦，《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二十年王翦“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¹²李信當是王翦手下將領，首先獲得燕太子丹之首而名顯於時。墓誌稱李信總秦兵，乃為失實，說他參與平定六國的戰爭，很有可能。

從以上文獻記載我們得知，李蔡為李廣從弟，原籍槐里人，後徙居隴西成紀，李蔡時因官遂得詔賜陽陵塚地，因此可以肯定李廣李蔡時，已經從隴西成紀遷回到楊陵，唐沙州刺史李無虧墓葬發現於楊陵，很可能是李無虧死後歸葬祖墳。根據《北史·李訴傳》記載文成即位賜爵李訴扶風公，表明李訴是由槐里徙居幽州的，當時李氏故居應當是漢武功槐里。武功三時原，就是古代槐里所在地。

墓誌銘稱：“九代祖崇，後魏幽州刺史，子孫因家焉，故今更為范陽郡人也。唐杜移晉，無褻世祿之榮；和壁入秦，不減連城之價。人物世載，鼎鼎重光，逾四鉉於袁門，掩十輪於楊氏。”李氏家族原籍隴西成紀人，為何徙居幽州范陽，根據《魏書·李訴傳》記載：“李訴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謚曰襄侯。”¹³李崇事迹亦見載《北史·李訴傳》。因此墓誌銘記載九代祖崇徙居幽州范陽是可靠的。至於《沙州都督府圖經》長城堰條的記載因省略文字而顯得不清楚。其次如果李崇是九代祖，李訴是李崇之子，應當是李無虧第八代祖，因此《沙州都督府圖經》長城堰條記載“五代伯祖司空訴”，誤，應當是八代祖訴。

但是墓誌銘沒有記載李訴，而 P. 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的記載正好補充了墓誌銘記載的不足：“五代伯祖司空訴，尚後魏太祖舅陽平王杜起女，後為公主，憶長安城，太祖於范陽為公主築長安城，俗號長安城李，隨時定氏族去其安字，直為長城李氏。”《魏書·李訴傳》記載：“訴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訴後必宦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曆官中書助教、博士，高宗時遷儀曹尚書賜爵扶風公，相州刺史，獻文帝時任太倉尚書攝南部事，顯祖崩“訴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訴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墓誌銘中為何要省略李訴，可能與文明太后於太和年間誅殺李訴事件有關，其出任太倉尚書後，“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賄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群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訴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僚莫不曲節以事之。”後被人告外叛，文明太后

誅之。其弟李璞“賜爵宜陽侯，太常卿。”¹⁴《北史·李詡傳》記載同。¹⁵

李詡有三子，根據《魏書·李詡傳》記載，“長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平東將軍。先詡卒。子晴，字誨明。逃竄，遇赦免。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邃弟令和、令度，與詡同時死。”其中李晴子李衡字伯琳，可能與叔琳為同輩人，年齡小於伯琳。叔琳根據墓誌銘記載其父為李子肅，“曾祖子肅，北齊平原太守、范陽侯。祖叔琳，隋考功郎、齊州刺史，襲爵范陽公。並道暎簪裾，器標瑚璉。熊旌犀節，膺方嶽之隆；白馬丹書，葉山河之誓。”¹⁶這裏有個問題，就是李子肅不見於《魏書·李詡傳》的記載，因為《魏書》記載到李邃、李令度、李令和，但是沒有記載到他們的字，或者令度、令和就是字，而名失載，如果是這樣，那麼李子肅可能就是其三人中某位的名或者字。三人中李令和、李令度受李詡牽連被誅，唯李邃早死免禍，因此我們推測子肅可能就是李邃的字，李叔琳就是李邃之子。關於李叔琳生平事迹正史沒有記載。

墓誌銘記載李無虧之父李行機稱：“父行機，唐益州九隴縣令、梓州治中、上柱國、淮陰縣開國公。風情簡亮，志業祥和，懸明鏡於心台，植長松於識宇。才高百奏，學富五車，顧張束於鎔銖，納王劉於掌握。縮銅章於劍右，事屈烹雞；轉星屏於郡中，初將展驥。東道之姿，方駢西崦之景；遽淪(論)道長，運促位不充量。”根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九隴縣屬彭州：“彭州濛陽郡，緊。垂拱二年析益州置。……九隴，望。武德三年以九隴、綿竹、導江置濛州。貞觀二年廢，縣皆來屬。”¹⁷《舊唐書·地理志》記載武德元年改陝蜀郡為益州，領十三縣中有九隴縣，三年分九隴三縣置濛州，貞觀二年廢濛州之九隴三縣來屬，“垂拱三年，分雒、九隴等十三縣置彭、蜀二州。”¹⁸可以斷定李行機出任益州九隴縣令時間應當貞觀二年之後、垂拱二年之前。梓州治郡縣，在劍州西南，所謂郡中、劍右都是指梓州治中之職。

通過以上考訂得知，《李無虧墓誌銘》記載人物事件基本上可以和正史典籍相印證，很多人物都可以從正史中找到其生平事迹和相關記載，特別是關於李氏家族遷徙過程的記載比較詳細，我們根據墓誌銘的相關記載結合歷史典籍，基本弄清楚李無虧家族遷徙過程是這樣的，李信時期由魏入秦，徙居隴西成紀，遂為隴西成紀人，李蔡、李廣仕宦漢朝文帝至武帝時期，可能這個時期由隴西成紀徙居槐里，十六國李崇仕北燕，入魏後任幽州刺史，徙居幽州范陽，成為幽州范陽人。李氏家族在歷史時期有兩次變故，第一次是西漢武帝時期，李廣、李蔡犯罪自殺，李氏家族遭到第一次重創；北魏文明皇后掌權，李詡被誣告被誅，二子並受牽連，其中一子早死，一子李晴逃脫免死，無疑這次事件對李氏家族衝擊很大，此後一直到唐代，李廣李蔡這支李氏家族幾乎沒有見到非常出名的人物。我們根據墓誌銘及政史有關記載將李氏家族的世系排列如下：

李宗——李信——李蔡——李產——李績——李崇——李詡——李子肅——李叔琳——李行機——李無虧——李鳴鶴。

其中還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如墓誌銘說李崇為九代祖，而 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為五代祖，之所以出現這一矛盾，主要是《沙州都督府圖經》和墓誌銘依據的始祖不同所致。其次部分人物我們還無法與正史對應，從中找出有關記載這些人的蛛絲馬迹來，因此這篇墓誌銘還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第三根據墓誌銘還無法一代接一代地將李無虧家族的世系排列下來，這一問題只有留待後人進行研究考訂。

三、沙州刺史李無虧生平事迹鉤沈

從墓誌銘記載看李無虧家族是一個書香門第名門望族，到其父親仍才高百奏、學富五車。李無虧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因此他文化造詣很高，根據墓誌銘記載看，“公資二象之淑靈，含五常之秀氣。渾金璞玉，絕名言之先；瓊樹瑤林，出風塵之外。識用高朗，披明月於重雲；儀錶端凝，建標霞於層嶽。宏覽載籍，興屬清新，似夢靈蛟，如吐飛鳳。至於白猿劍術；玄女兵符，不待黃石之期，暗合孫吳之旨。心契管樂，志立功名，逝將因海運而驥鱗，排天關而舉翼。”具有三方面的知識結構，首先是巨集覽載籍，其次是熟讀兵書，有高超的劍術，記載道玄女兵符、黃石公、孫吳等都是古代的兵家或者兵書，敦煌文獻中發現有兵書，特別是有關如何擺陣、將兵任將都有詳細的記載。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將這些文書與李無虧聯繫起來。

根據《沙州都督府圖經》的記載李無虧在沙州的事迹主要有三個方面，即在苦水上修築了長城堰、上奏改移部分沙州到瓜州間的驛站、發現和上奏沙州地區四條祥瑞，根據《李無虧墓誌銘》的記載李無虧於“載初元年，授公沙州刺史，兼豆廬 / 軍經略使。昔穎川太守，詎參五伐之謀；細柳將軍，豈總六條之務。公才兼文武，任光內外。仁明之政，共春 / 露同沾；金鼓之威，與秋霜比肅。匈奴遁迹，魏尚之在雲中；先零殄喪，段穎之征隴外。長壽二年，加太中大 / 夫。又進爵長城縣開國公，並賞懋功也。雖頻剪逆徒，而余氛尚梗，狡虜數萬，來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 / 鐵石，奮不顧命，甘赴國憂。雖則斬將奪旗，雄心克振，然通中刮骨，其傷遂深。綏復之禍忽臻，馬革之悲俄 / 及。以延載元年八月七日終於官舍，時年五十八。天子聞而傷之，乃下制曰：顯忠悼往，有國通規，圖勞飾終，列代彝訓。故沙州刺史李無虧，以狡寇 / 陸梁，鼠竊邊鄙，遂能被堅執銳，率衆先鋒。臨難忘生，捐軀徇節，英勇奮發，僵仆爲期。念茲誠概，良可嘉憫， / 口贈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並贈物七十段，還日官爲造靈輿。即以萬歲登封元年歲次申壹 / 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葬於稷州武功縣三時原。”由墓誌銘記載得知，李無虧於載初元年（689）出任沙州刺史，於延載元年（694）因戰傷病死於館舍之中，萬歲登封元年安葬於稷州武功縣三時原。李無虧在敦煌地區沙州刺史職位上只有短短的六年時間，但是卻留下了很多記載。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李無虧戰傷的原因和物件，因爲墓誌銘沒有明確記載與李無虧作戰致使其受傷病故的民族到底是誰。墓誌銘稱：“雖頻剪逆徒，而余氛尚梗，狡虜數萬，來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 / 鐵石，奮不顧命，甘赴國憂。”對沙州在城戰爭威脅的既有可能來自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吐谷渾，也有可能來自於蒙古高原上的突厥等民族，由於墓誌銘記載的曖昧，我們只有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進行考訂。

李無虧修築苦水長城堰，是李無虧在瓜沙農業經濟建設中重大舉措。長城堰，根據敦煌寫本 P. 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二所堰條記載：

長城堰，高一丈五尺，長三丈，闊二丈。

右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堰苦水以溉灌，刺史李無虧造成，百姓欣慶。無虧，漢丞相蔡之後，自隴西徙居幽州之范陽，五代伯祖司空，尚後魏太（世）祖舅陽平王杜起（超）女，後爲公主，憶長安城，太祖於范陽爲公主築長安城，俗號長安城李，隨（隋）時定氏族去其安字，直爲長城李氏。大周聖神皇帝賜無虧長城縣開國子，故時人名此堰。¹⁹

按此條稱李無虧封號爲長城縣開國子，而墓誌銘記載長壽二年（693）加大中大夫，進爵長城縣開國公，那麼李無虧什麼時候進爵長城縣開國子，這就牽扯到《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長城堰條的撰寫年代和長城堰的修築年代問題。李無虧進爵長城縣開國子的年代，雖然沒有明文記載，但是我們根據二十祥瑞條記載天授二年（690），也就是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的第二年，連續四次上奏祥瑞，並從《瑞應圖》找根據，甚至附會發揮，爲武則天當皇帝尋找理論根據，武則天賜爵長城縣開國子可能就是這一年或者次年，主要是爲了褒獎上奏祥瑞之功。

長城堰的具體位置，根據 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苦水，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餘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號爲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南，即向西北流至庶遷烽，西北廿餘里散入沙鹵。”²⁰而階亭驛位置根據一十九所驛條記載“階亭驛，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卅里。”所以，長城堰在階亭驛南苦水向西北轉彎處，李並成先生認爲這裏曾經在唐代有一塊綠洲。

關於李無虧上奏改移沙州驛站，主要見載於 P. 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一十九所驛記載：

清泉驛，右在州東北卅里，去橫澗驛廿里，承前驛路在瓜州常樂縣西南，刺史李無虧以就路石磧山險，迂曲近賊，奏請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敕移就北。其驛置在神泉觀莊側，故名神泉驛。今爲清泉戍，置在驛旁，因改爲清泉驛。

甘草驛，右在州東北一百卅五里，東南去階亭驛廿五里。前刺史李無虧爲中間路遠，兼有沙鹵，奏請奉敕移。驛側有甘草，因以爲號。

階亭驛，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卅里。同前奉敕移，爲置在階亭烽側，因烽爲號。

新井驛、廣顯驛、烏山驛，以上驛瓜州捉。右在州東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樂縣界。同前奉敕移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稍杆道行。……

雙泉驛，右在州東北四百七十七里六十步。瓜州常樂縣界。唐儀鳳三年閏十月奉敕移稍杆道就第五道莫賀延磧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稍杆道行。……

東泉驛，右在州卅里，東去其頭驛廿五里。刺史李無虧為其路山險迂曲，奏請就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其驛遂廢。

其頭驛，右在州東六十里，西去東泉驛廿五里，東去懸泉驛八十里，同前奉敕移廢。²¹從《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中得知，一十九所驛站就有九所驛站記載到刺史李無虧曾經奉敕改移。雖然原因很多，主要因為山迂險曲和接近少數民族不安全是主要原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等記載，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的時間，正好是吐蕃與東、西突厥聯合起來對河西及西域地區進行騷擾侵犯的時期，特別是吐蕃，直接形成了對瓜沙等河西諸州威脅，敦煌以南的南山是吐蕃活動的地區，如果瓜沙間的驛站分佈偏南，就容易受到吐蕃的威脅，因此，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之後，接連上奏朝廷將驛站向北移，主要是出於對驛道安全考慮。

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所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發現並上奏沙州四條祥瑞。《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有沙州祥瑞二十條，其中 12 條屬於唐代發現，唐代 12 條中有六條是武則天時期沙州上奏朝廷的，李無虧一人就單獨上奏四條，而且記載都非常詳細。

李無虧之前，沙州地區已經開始為武則天當政搜羅根據，不過這些祥瑞比起李無虧上奏的四條來，遜色很多。“甘露，右唐垂拱四年董行靖園內甘露降於樹上，垂流於地，晝夜不絕。野谷，右唐聖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於武興川，其苗藜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黃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粍，甘而不熱，收得數百行，以充軍糧。”²²甘露作為祥瑞歷史上很多地方都用，並不新奇，同時沒有同武則天當政這一歷史事件聯繫起來；野谷作為祥瑞運作就比前者高明，發現地點選擇在武興川，表示武氏家族興盛，但是野穀從字面分析，與正統之間畢竟有別，意義不是很大。而李無虧上奏的這四條祥瑞與前二條相比整個上了一個臺階，分別為五色鳥、日揚光慶雲、蒲昌海五色、白狼等。分別經百姓陰嗣鑿、支度崔振、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百姓寅守忠等發現狀稱，由李無虧從瑞應圖中找出理論根據並進行加工上報朝廷，收入官修《沙州都督府圖經》中，分別見載於 P. 2005 號《沙州都督府圖經》和 P. 2695《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現將內容轉錄如下：

五色鳥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陰嗣鑿於平康鄉界武孝園內見五色鳥，頭上有冠，翹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並往看，見群鳥隨之，青、黃、赤、白、黑五色具備，頭上有冠，性甚馴善。刺史李無虧奏：“謹檢《瑞應圖》曰：‘代樂鳥者，天下有則見也。’止於武孝通園內，又陰嗣鑿得之，臣以為，陰者，母道；鑿者，明也天顯。”

日揚光 慶雲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支度崔振等狀稱：“今日冬至卯時有五色雲扶日，闊一丈已上，其時大明，大校一倍以上。比至辰時，復有五色雲在日四邊抱日，光彩甚鮮。”見在官人百姓等同見，咸以為聖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曰：‘聖人在上，日有天光，天下和平。’又曰：‘田子孝則景雲出遊。’有人從己西己北己東來者咸云：諸處赦日，亦總見五色雲抱日。”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狀成：“其蒲昌海舊來濁黑混雜，自八月已來，水清明澈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聖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聖人知者。”刺史李無虧奏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升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平也。’天應魏國當塗之兆，明土德之昌也。”

白狼

右天授二年得百姓陰守忠狀稱：白狼頻到守忠莊邊，見小兒及畜生皆不傷，其色如雪者。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云：‘王者仁智明哲即至，動准法度，則見。’

又云：‘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服者。’天顯陛下仁智明哲，動准法度，四夷賓服之征也。又見於陰守忠之莊邊者，陰者，臣道，天告臣子並守忠於陛下也。前件四瑞，諸州皆見，並是天應陛下開天統，殊

征號，易服色，延聖壽者。是以陽鳥豐彩，映澄海以通輝；瑞鳥禱祥，對景雲而共色。胡戎唱和，議中國之有君；遐邇謳歌，嘉大同之應寶命。”²³

在《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二十祥瑞中應當說只有這四條記載最有意義，武則天稱皇帝之後，最大的問題是為自己作為女性做皇帝尋找理論根據，應當說李無虧任沙州刺史階段編的這四條祥瑞正迎合武則天的需要，可見用心良苦。如五色鳥的發現過程，先出現了陰嗣鑿發現五色鳥，地點設計在武姓家，就是一般常人也可以看出作為祥瑞的五色鳥出現於武姓人家的用意。又將五色鳥附會為代樂鳥，從《瑞應圖》得出有天下則見，武則天稱皇帝，敦煌地區武姓人家出現了代樂鳥——五色鳥，當然表示武則天稱帝是天命所歸。在日揚光、慶雲條中，李無虧借官人百姓之口，說出武則天需要的話和李無虧想說的話：“咸以為聖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在蒲昌海五色條中借用石城地區粟特人及印度僧人之口，表達了武則天需要的和李無虧要說的意思：“中國有聖天子，海水即清無波”。李無虧不但從《瑞應圖》中找出理論根據，而且加以發揮“天應魏國當塗之兆，明土德之昌也”。這裏之所以稱是魏國當塗之兆，因為武則天之父武士護在光宅元年“九月甲寅，大赦，改元。……己巳……考士護為太師、魏王，妣楊氏為王妃。”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考太師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²⁴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改元天授。次年臘月李無虧就上奏這條祥瑞，應當說來得很及時。特別是白狼條的記載最有意思，前邊陰嗣鑿條說“臣以為，陰者，母道”，這裏又說“陰者，臣道”，左右逢原，任意附會，完全是根據武則天的需要來編排演繹。

應當說李無虧他既是官員有很有學問，同時他與李唐皇室同姓。武則天上臺之後，遭到李氏家族和唐朝老臣的極力反對，不斷有人起兵反對，武則天一方面對反對者嚴厲鎮壓，另一方面對擁護者多方拉攏，特別是李氏家族的人員更是這樣，如李義府之流。作為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與武則天為加強西北邊防有密切關係，墓誌銘記載李無虧的知識結構非常淵博，特別是在軍事方面很有造詣，如墓誌銘稱“至於白狼劍術；玄女兵符，不待黃石之期，暗合孫吳之旨。”其次不可否認與武則天要拉攏更多李氏家族來擁護其政權也有關聯。

李無虧與敦煌地區的粟特人聚落的關係，我們看到的只有一條記載，就是天授二年臘月李無虧通過石城鎮過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狀向武則天進獻蒲昌海五色祥瑞，通過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狀引用印度婆羅門語言論證，李無虧自己又經過查閱《瑞應圖》進行加工。這就揭示出敦煌地區的沙州刺史與蒲昌海南岸石城鎮的粟特人康氏家族聚落有著密切的關係，關於石城鎮粟特人聚落敦煌文獻記載甚多，S. 367《沙州伊州地志》記載：

石城鎮，……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

屯城，……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康豔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名弩支城。

蒲桃城，……康豔典所築，種蒲桃此城中，因號蒲桃城。

薩毗城，……康豔典所築，其城近薩毗澤。²⁵

P. 5034《沙州地志》和《壽昌縣地境》均有相同的記載，惟《沙州地志》記載石城鎮“一所沃舍……存。”表明遲至 P. 5034《沙州地志》撰修時期，石城鎮的粟特人聚落還存在。石城鎮的粟特人聚落消失，根據陳國燦先生的研究，敦煌地區的粟特人聚落出現，是因為原居於塔里木盆地東部且末河流域播仙鎮的粟特人受到西突厥故將阿史那闕啜忠的劫掠騷擾，而逃往敦煌以期得到沙州刺史的保護，沙州政府對這批逃難而來的粟特人專門劃出地域進行安置，建立戶籍，其時間略早於景龍二年（707）。²⁶李無虧任沙州刺史的時間相距景龍二年不是很遠，因此我們懷疑敦煌縣從化鄉的建置很可能與李無虧有很大關係。

李無虧是因為“軍政綢繆，廊 / 廡增輝，四郡遐蕃，三危極裔。北鄰白虜，南接青羌，式遏疆垂，允歸人傑。載初元年，授公沙州刺史，兼豆廬 / 軍經略使。”這裏的四郡就是指河西四郡，三危指敦煌，敦煌文獻中將敦煌稱作三危記載很多，白虜指居住於蒙古高原上的突厥，青羌指居住於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敦煌地區具有阻隔羌狄聯合保衛邊疆的重任，因此，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肩負這種任務。載初元年九年改元天授，²⁷所以李無虧出任沙州刺史應當在正月至九月間。李無虧一到任就著手其工作，所謂上奏朝廷改移沙州驛道就是其實施的措施之一；上元二年石城鎮歸屬沙州管轄，李無虧到任後，加強了對石城地區的軍事管理。

李無虧在沙州地區的政績我們根據墓誌銘的記載：“昔潁川太守，詎參五伐之謀；細柳將軍，豈總六條之務。公才兼文武，任光內外。仁明之政，共春 / 露同沾；金鼓之威，與秋霜比肅。匈奴遁迹，魏尚之在雲中；先零殄喪，段穎之征隴外。”魏尚和段穎都是兩漢人，在防禦匈奴和先零的戰爭中作出了很大貢獻，這裏將李無虧比附為魏尚和段穎，表明李無虧功績主要在防禦突厥和吐蕃的過程中。根據《新唐書·則天皇后紀》記載，天授二年五月“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吐蕃。”但是中道召還，軍竟不出。十月來俊臣誣殺岑長倩。長壽元年“十月丙午，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敗吐蕃，克四鎮。”²⁸《資治通鑑》記載這次軍事行動比較詳細：“初，新豐王孝傑從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於闐、疏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²⁹很可能李無虧也參加這次軍事行動，並因軍功於“長壽二年，加太中大 / 夫，又進爵長城縣開國公，並賞懋功也。”就是指這件事情。

關於李無虧的死亡問題，墓誌銘記載到“雖頻剪逆徒，而餘氛尚梗，狡虜數萬，來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 / 鐵石，奮不顧命，甘赴國憂。雖則斬將擄旗，雄心克振，然通中刮骨，其傷遂深。綏復之禍忽臻，馬革之悲俄及。以延載元年八月七日終於官舍，時年五十八。天子聞而傷之，乃下制曰：顯忠悼往，有國通規，圖勞飾終，列代彝訓。故沙州刺史李無虧，以狡寇陸梁，鼠竊邊鄙，遂能被堅執銳，率眾先鋒。臨難忘生，捐軀殉節，英勇奮發，僵仆為期。念茲誠概，良可嘉憫，口贈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並贈物七十段，還日官為造靈輿。”從墓誌銘記載得知，李無虧的死亡因戰爭創傷所致，這次戰爭的時間應當發生在長壽二年（693）之後，延載元年（694）八月之前。根據《新唐書·則天皇后紀》記載：“延載元年臘月甲戌，突厥默啜寇靈州。右鷹揚大將軍李多祚敗之。”“二月庚午，薛懷義為伐逆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擊默啜。己卯，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及吐蕃戰於冷泉，敗之。”八月“戊辰，王孝傑為瀚海道行軍總管。”³⁰從墓誌銘的“狡虜數萬，來犯城池”記載看，這次戰爭應當發生於沙州轄區之內，因此不可能是在靈州對突厥默啜的戰爭，只能是王孝傑對吐蕃的戰爭，這次戰爭《資治通鑑》記載延載元年“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力、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可汗俟斤等萬餘人。”³¹因為這次戰爭發生於敦煌以西地區，王孝傑以武威道行軍總管身份作戰，因此李無虧只能參加這次戰爭，沙州地區西鄰安西四鎮地區，而敦煌地區是吐蕃與西突厥聯繫的必經之地。

通過以上探討得知，李無虧是敦煌地區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在軍事和音樂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出任沙州刺史後，修築了長城堰，改移瓜沙之間的很多驛站，並上奏四件祥瑞，加強同武則天為首的武周政權之間的關係，在同吐蕃、突厥之間的戰爭中，因功賜爵長城公，並因之負傷而病故。因此，他墓誌銘發現對研究敦煌史地非常重要。這篇墓誌銘中反映的很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如李子肅、李叔琳、李行機、李鳴鶴等人的事迹我們還沒有考證出來，李無虧墓門繪製圖像內容等也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

【注】

- ¹ 張團戰《大周沙州刺史李無虧墓及徵集到的三方唐代墓誌》，《考古與文物》2004 年第 1 期，第 20-26 頁。
- ² 李慧、曹發展《陝西楊陵區文物所四方唐墓誌初探》，《考古與文物》2004 年第 1 期，第 80-82 頁。
- ³ 參《新唐書》卷 39《地理三》、《舊唐書》卷 39《地理二》。
- ⁴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上》，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217、275、7、20、66、112 頁。
- ⁵ 《漢書》卷 19 下，《百官公卿表》第 7 下。
- ⁶ 《漢書》卷 6，《武帝紀》第 6。
- ⁷ 《史記》卷 109，《李將軍列傳》第 49。
- ⁸ 《史記》卷 109，《李將軍列傳》第 49；另見《漢書》卷 54，《李廣蘇建傳》第 24。
- ⁹ 《漢書》卷 54，《李廣蘇建傳》第 24。
- ¹⁰ 《史記》卷 109，《李將軍列傳》第 49。
- ¹¹ 《漢書》卷 54，《李廣蘇建傳》第 24。
- ¹² 《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第 6。

- ¹³ 《魏書》卷 46,《列傳》第 34。
- ¹⁴ 《魏書》卷 46,《列傳》第 34。
- ¹⁵ 《北史》卷 27,《列傳》第 15。
- ¹⁶ 《北史》卷 27,《列傳》第 15。
- ¹⁷ 《新唐書》卷 42,《志》第 32《地理六》。
- ¹⁸ 《舊唐書》卷 41,《志》第 21《地理四》。
- ¹⁹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8 頁。
- ²⁰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6 頁。
- ²¹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9-12 頁。
- ²² 《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17-18 頁。
- ²³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18-19 頁、第 35-36 頁。
- ²⁴ 《新唐書》卷 4《武則天紀》。
- ²⁵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65-66 頁。
- ²⁶ 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敦煌研究》,1989 年第 3 期。
- ²⁷ 《新唐書》卷 4《武則天紀》記載載初元年九月“壬午,改國號周。大赦,改元。”
- ²⁸ 《新唐書》卷 4,《本紀》第 4。
- ²⁹ 《資治通鑒》卷 205,則天後長壽元年。
- ³⁰ 《新唐書》卷 4,《本紀》第 4。
- ³¹ 《資治通鑒》卷 205,則天後延載元年。

讀《李無虧墓誌銘》三題

李宗俊 (蘭州大學)

《文物與考古》2004 年第 1 期刊載了王團戰的《大周沙州刺史李無虧墓及徵集到的三方唐代墓誌》一文，詳盡報導了李無虧墓的清理情況與墓誌錄文，為研究這一段時期的歷史又提供了一份極其實貴的新資料。藉此，李慧、曹發展合撰《陝西楊陵區文管所四方唐墓誌初探》一文，同前文載於《文物與考古》同一期，對墓誌作了深入探討，並已發現了許多補正史實的資料。但仍有三個可用此墓誌銘補正的問題，因沒被提及，故撰此文以就教於學界。

一、一場驚心動魄的沙州保衛戰

有關李無虧之死，《李無虧墓誌銘》有詳載：“雖頻剪逆叛，而余氣尚梗，狡虜數萬，來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鐵石，奮不顧命，甘赴國憂。雖則斬將搴旗，雄心克振，然通中刮骨，其傷遂深。綏復之禍忽臻，馬革之悲俄及。以延載元年八月七日終於官舍，時年五十八”。但是，有關這場戰爭卻記得十分含糊，史籍中亦無確切記載。那麼，這場由數萬入侵者發起的戰爭是在什麼時間，入侵者是什麼人？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在他死後朝廷竟然如此重視，甚至“天子聞而傷之”。這場戰爭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是否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首先，從載初元年李無虧上任沙州刺史時沙州所處的形勢去追溯。《沙洲都督府圖經》載初歌謠載：“黃山海水，蒲昌沙場。地鄰蕃服，家接渾鄉；昔年寇盜，禾麥凋凋傷；四人擾擾，百姓遑遑；聖人哀念，賜以惟良，既扶既育，或引或將”；另據《李無虧墓誌銘》載：“四郡遐蕃，三危極裔。北鄰白虜，南接青羌，式遏疆垂，允歸人傑”。由以上兩條材料我們可以看出，沙州此時處在三面環敵的危險境地。北面為“白虜”，即突厥；南面和西南面為“青羌，即青海一帶的吐蕃與吐谷渾。而且，在載初元年（690）前，沙州已不斷受到這些民族的入侵和掠奪，故出現了農業凋零，人心不穩，“式遏疆垂”的危機。

其次，從有關史籍中來看此時整個西北及沙州的局勢。從史籍看，自唐以來，威脅西北邊疆的力量主要有突厥、吐蕃、吐谷渾以及先後脅從於突厥和吐蕃的西域諸政權。至唐高宗與武周時期，威脅西北的首先是吐蕃。吐蕃自祿東贊主政以來迅速強大，高宗統治初期，吐蕃一面繼續與唐修好，一面積極控制吐谷渾。據吐蕃《大事紀》載：在吐谷渾與吐蕃相互攻伐中，祿東贊指揮吐蕃軍隊於高宗龍朔三年（663）攻滅了吐谷渾國。吐谷渾可汗慕容諾曷鉢被迫率數千帳走依涼州，大批的吐谷渾百姓從此淪於吐蕃統治之下，直至聖曆三年“餘部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¹。由此時吐谷渾力量的衰落可知，此時來寇沙州的絕非吐谷渾。相反，隨著吐蕃力量的進一步強大，吐蕃開始覬覦西域。《通鑑》201 卷載：咸亨元年（670），“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拔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²。調露元年（679），裴行儉智取四鎮，唐又暫時恢復了對四鎮的統治，但垂拱二年（686）又被吐蕃大軍攻陷，史載吐蕃“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逾高昌壁，曆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

賀延磧，以臨我敦煌”³。直到長壽元年(692)，王孝傑率大軍擊敗吐蕃，再次克復了安西四鎮⁴。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載初元年(690)李無虧上任沙州刺史前，安西四鎮已淪陷於吐蕃，沙州因沒了原四鎮之屏障而成了直接與吐蕃對壘交鋒的邊疆前哨。正如墓誌中記，沙州“北鄰白虜，南接青羌，式遏疆垂”。

但是，是不是由此便可說明這次來寇沙州的就是吐蕃呢？我們認為還不儘然。一是考慮此時吐蕃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域前線；另外，從墓誌中有“匈奴遁跡，魏尚之在雲中；先零殄喪，段穎之征隴外”句。這裏是用魏尚攻匈奴，段穎征先零的典故來說明長壽二年(693)之前李無虧擊退的是兩股力量。再結合墓誌“北鄰白虜，南接青羌”句，和“悠哉塞垣，胡塵夕暗，羌笛朝喧”句，以及李無虧墓墓門扇，線刻兩天王腳踩小鬼，其中東門扇天王踩的小鬼為高鼻深目，疑為突厥形象，說明此次來寇沙州的另一勢力可能就是突厥。究竟是否是突厥，讓我們再結合史籍去分析。

自隋唐以來，突厥是威脅中原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後雖經中原王朝的數次分化瓦解和連續征討，到唐高宗及武周時期其勢力已大不如從前，但其餘威尚存。而且在唐高宗時期就“謀取西、庭二州”⁵，又與吐蕃交通，屢次攻掠安西四鎮和西北各地。突厥與吐蕃這種遙相呼應，互通生氣的關係，從高宗以來與唐之間的數次戰爭就可明顯看出。而且，《通鑑》卷 202 調露元年(679)就確載：“初，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出師西方’”。

吐蕃與突厥的這種聯合一直到了長壽元年(692)，王孝傑克復安西四鎮時進一步明朗化，而且此時突厥各部對吐蕃的支援，從東到西，從西域前線到北部邊疆皆有。尤其 692 年由原唐朝冊立的興昔亡可汗阿史那元慶為酷吏來俊臣所鞠，定罪見誅，其長子阿史那綏子遂亡奔吐蕃，被冊為西突厥可汗，以之號令十姓，實際統治西域諸城⁶。而也就在 692 年武周政權經過周密策劃，任命一度沒蕃，諳熟蕃情的將領王孝傑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與原西突厥首領阿史那忠節聯兵，大破阿史那綏子，吐蕃欽陵贊婆統兵來救，復為所敗，“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⁷，“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鎮”⁸。694 年(延載元年)吐蕃與突厥阿史那綏子再次聯兵犯西域，又遭慘敗。《通鑑》卷 205 卷載：延載元年(694)“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三月，甲申……，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⁹。由此可見，此時中原王朝與突厥各部關係之緊張。而對於武周政權來說，為什麼與吐蕃的戰事尚未結束，就要急於去打突厥呢？尤其王孝傑 692 年和 694 年在西域同時與吐蕃、突厥皆發生戰爭，隨後就去專攻突厥。此正好說明，在王孝傑克復四鎮的戰役中，突厥不僅在前線直接支援吐蕃，而且在其他各處亦在用兵，以牽制和分散武周政權的力量。

由以上分析，從 692 年王孝傑克復四鎮時打敗的是吐蕃與突厥聯兵，694 年再次打敗者又是吐蕃與突厥聯兵。而這兩個時間又正好與《李無虧墓誌銘》所記 693 年(長壽二年)前李無虧擊敗兩股來犯之敵，被朝廷加爵為長城縣開國公；694 年李無虧再次與來犯之敵作戰，最終戰死於沙場的時間相吻合。這就充分

說明這兩次進攻沙州者皆為吐蕃與突厥聯兵，而且都與安西四鎮之爭奪有關。為什麼要重點進攻沙州呢？這是因為此時的沙州正好處於通向西域的咽喉要道，且為直接供給西域前線的大後方，只要攻下沙州，就可切斷王孝傑軍隊的歸路，置其於分兵作戰，首尾不能相顧的境地。加之，沙州所處又在吐蕃與突厥之間。這樣，此時的沙州肩負著十分艱巨的防禦任務。也正因如此，李無虧才頑強據守，主動出擊，積極配合著西域前線，並取得了擊退突厥與吐蕃戰爭的重大勝利。正因李無虧取得了勝利，所以受到了朝廷對他的嘉獎，“長壽二年，加太中大夫，又進爵長城縣開國公，並賞懋功也”。但是，突厥與吐蕃的進攻並未至此甘休，而是重新發起了更大規模的進攻。正如墓誌載：“雖頻剪逆叛，而余氣尚梗，狡虜數萬來犯城池”。此次來犯從墓誌中來看是在長壽二年(693)為李無虧加爵之後，到延載元年(694)八月李無虧死之前，此說明 694 年的吐蕃與突厥聯兵為再次爭奪已失手的四鎮而同時對沙州亦發起了進攻。而此時的沙州防禦力量主要是駐守在沙州城中的豆盧軍，其兵力依《元和郡縣圖》所記只有“管兵四千五百人，馬四百匹”。然而，李無虧毅然“奮不顧命，甘赴國憂”，領導沙州軍民投入到了這場保衛沙州的戰鬥中。這場眾寡懸殊的保衛戰，戰鬥之激烈在墓誌最後的贊文中有所表露：“爰整龍旗，將清蟻結，精貫飛景，心貞蛟雪。陸陌無繼，浚稽箭竭，尚理溫鬢，猶持向節”。在這種箭竭援絕，敵軍蟻結的情況下，李無虧仍領導沙州軍民頑強戰鬥，而且“斬將搴旗，雄心克振”，最終壯烈殉國。

這場驚心動魄的保衛戰結果如何，墓誌中沒有記述。但從李無虧“終於官舍”和歸葬長安的事實，可以斷定沙州軍民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那麼，何以說明這場沙州保衛戰的重大意義呢？要說明這一點必先充分認識王孝傑克復安西四鎮之重大意義。自唐貞觀以來安西四鎮的設置，不僅對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維護起著極重要的意義，而且還起著屏障敦煌和河西的巨大作用。但自從吐蕃向西域發展以來，唐與吐蕃幾乎每戰必敗，大損其大國形象。而這幾次王孝傑主持的戰役算是根本扭轉了雙方戰局，而且也正迎合了此時已穩定政局，急需規服西域，以建樹武功的武則天的心意。所以，當王孝傑克復四鎮後，史載：“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綾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為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台三品，封清源男”¹⁰。正是由於王孝傑克復四鎮其意義重大，而李無虧又戰死於克復安西四鎮的戰爭當中，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他領導沙州軍民英勇抗擊，保衛了沙州，確保了通向西域道路的暢通和對西域前線的接濟，所以在他死後“天子聞而傷之，乃下制曰：顯忠悼往，有國通規，圖勞飾終，列代彝訓。故沙州刺史李無虧，以狡寇陸梁，鼠竊邊鄙，遂能被堅執銳，率眾先鋒。臨難忘生，捐軀殉節，英勇奮發，僵僕為期。念茲誠慨，良可嘉憫，口贈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並贈物七十段，還日官為造靈輿”。

由以上論證我們得出：李無虧戰死於王孝傑克復安西四鎮時，發生在 694 年的一場抗擊突厥與吐蕃聯合進攻的沙州保衛戰中。這場保衛戰，對於武周政權收復四鎮發揮了巨大作用。遺憾的是，這樣一場驚心動魄的有關沙州軍民和李無虧英雄業績的沙州保衛戰，卻不為史書典籍所載，幾乎湮沒在了歷史的煙雲中。但從今天出土的敦煌藏經洞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中相關內容仍可與墓誌中所記相印證，其中新井驛條中有“至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敕，為沙州遭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竿道停，改於第五道來往”¹¹。這裏“沙

州遭賊”說的正是 694 年吐蕃與突厥聯兵對沙州的再次進犯和劫掠。從此後因沙州缺少維持和運轉驛道所需草料而稍竿道停的事實，就可想見當時戰爭的曠日持久和艱苦卓絕。這樣，我們就可以鉤沉起那段已被遺忘的歷史，使其重新彪炳史冊。

二、豆盧軍的建置時間

關於豆盧軍的建置時間，《新唐書·地理志》沙州條云“豆盧軍，神龍元年(705)置”；《唐會要》卷 78 稱：“豆盧軍，置在沙州，神龍元年九月置軍”；《元和郡縣圖志》卷 40 涼州條載“豆盧軍：沙州城內，以當匈奴要路，山川回闊，神龍初，置立豆盧軍以鎮之。管兵四千五百人，馬四百匹，去理所一千七百里”。在這些典籍裏，統一將豆盧軍的建置時間記為神龍元年(705)。

然而，近年來中外學者先是根據日本藏大谷文書，其中一件《長安二年十月豆盧軍牒敦煌縣為軍司死官馬事》印文為“豆盧軍兵馬使之印”，認為長安二年(702)已有豆盧軍。此後，1972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阿斯塔那 225 號墓中發現了一批來自敦煌的文書。陳國燦先生對此作了深入研究，並根據本墓所出聖曆二年(699)文書中有“豆盧軍經略使之印”，認為在長安以前的聖歷年間，已存在著豆盧軍的建置。此外，陳國燦先生根據《唐大詔令集》中有關墨離軍使兼瓜州都督，以及《沙州都督府圖經》中“張芝墨池”條載：“開元二年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事行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任”，認為“此條雖為開元初事，仍可證沙州刺史也是兼豆盧軍使的”¹²。

然而，根據今天出土的《李無虧墓誌》載：“載初元年(690)，授公沙州刺史，兼豆盧軍經略使”。此條一是印證了陳國燦先生推斷的正確性；二是又可將豆盧軍建置時間從聖歷年間已有的說法，推前到載初元年，推前了近十年。由此，再根據史書所記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唐被迫罷安西四鎮；垂拱二年(696)吐蕃大軍再次攻陷安西四鎮，兩次曾置沙州於抗擊吐蕃的邊疆前哨。我們進一步推斷，沙州豆盧軍建置時間很有可能就在這時期，即咸亨年間或垂拱年間；甚至根據當時沙州處在通向西域的要道，而北鄰突厥南接吐蕃和吐谷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等因素，我們又可推測，自永徽二年(651)沙州升格為都督府時就建置了豆盧軍¹³。

三、《沙州都督府圖經》的撰成時間

《沙州都督府圖經》P. 2005 卷與 P. 2695 卷，自發現以來，僅就其撰成時間問題，學術界就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現，而且頗有爭議。羅振玉¹⁴、王仲榮等人認為作於唐開元年間¹⁵；王重民¹⁶、周紹良認為當在“武周之世”¹⁷；而日本學者池田溫等人認為是根據上元三年(676)以後至證聖元年以前近二十年間成形的《沙州圖經》編纂基礎上，武周證聖元年(695)大幅補訂而成¹⁸。

今天，《李無虧墓誌銘》的問世，為我們準確判定《沙州都督府圖經》的撰成時間提供了重要線索。根據墓誌所記，李無虧於“長壽二年(693)，加太中大夫，又進爵長城縣開國公，並賞懋功也”。而《沙州

都督府圖經》長城堰條中記“大周聖神皇帝賜無虧長城縣開國子”；再根據《圖經》中所含強烈的政治用意等線索，說明《圖經》撰成在給李無虧進爵為“公”的長壽二年之前。另據《圖經》中提到李無虧的最晚時間為“蒲昌海五色”條中所記的“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即 691 年年底。由此判定《圖經》撰成當在長壽元年（692）。此後，根據《圖經》內容，武周證聖元年沙州刺史已為陳玄珪。加之，文書其他各處直稱“刺史李無虧”，而“甘草驛”條中稱他為“前”刺史李無虧，以及根據唐代前期圖經三年一編修和在開年編修的慣例，又可判定《圖經》於 695 年年底陳玄珪在任沙州刺史時又有一次補修；再根據《圖經》記事抵開元初，說明在開元初又二次續修。至於其撰成和續修及其它相關問題的詳細論證，筆者另有撰文，此不多談。

【注】

- 1 《新唐書》卷 221《西域傳上》第 6227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 2 《資治通鑒》卷 201 第 6363 頁，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 3 《全唐文》卷 219 第 2216 頁《拔四鎮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4 《資治通鑒》卷 205 第 6488 頁，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 5 《新唐書》卷 215《突厥傳下》第 606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 6 薛宗正《吐蕃王國的興衰》第 49 頁，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年。
- 7 《新唐書》卷 216，《吐蕃傳上》6079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 8 《舊唐書》卷 6《則天本紀》123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 9 《資治通鑒》卷 205 第 6493—6494 頁，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 10 《舊唐書》卷 93 第 2977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 11 法國巴黎藏敦煌文獻 P. 2005 號卷子。
- 12 陳國燦《敦煌學史事新證》第 185—189 頁，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13 《唐會要》第 1238 頁，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
- 14 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上虞羅氏排印本，1909 年。
- 15 王仲榮《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第 141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16 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敦煌創刊初集》第 138—140 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57 年。
- 17 周紹良《讀〈沙州圖經〉卷子》，《敦煌研究》1987 年第 2 期。
- 18 池田溫《敦煌漢文文獻》第 343—345 頁，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五年。

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第六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要

張涌泉 (浙江大學)

2004 年 4 月 15 日, 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第六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在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召開。省社聯副主席連曉鳴、省社聯學會處處長謝利根出席了會議。會議由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第五屆理事會副會長張涌泉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趙豐、盧向前、魯東明、徐忠良、毛建波、都興宙、褚良才、張毅清、許建平、張小豔。

首先, 學會副秘書長許建平通報了第六屆理事會理事的選舉情況, 經會員通訊表決, 毛建波、盧向前、許建平、張小豔、張涌泉、張毅清、趙豐、徐忠良、都興宙、黃征、黃笑山、魯東明、褚良才共十三位候選人當選為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第六屆理事會理事。

隨即新一屆理事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張涌泉教授為新一屆理事會會長, 趙豐 (常務)、盧向前、魯東明、徐忠良為副會長; 許建平為秘書長; 張小豔為副秘書長。並選舉張涌泉、趙豐、盧向前、魯東明、徐忠良、許建平、張小豔為常務理事會理事。會議秘書處仍設在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由於張涌泉會長已是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兼法定代表人, 故理事會推選秘書長許建平為浙江省敦煌學會法定代表人。

理事會推舉德高望重的王伯敏教授為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推舉張金泉教授為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顧問。

隨著國際敦煌學研究的發展, 敦煌學的研究範圍有所擴大, 其研究也向更深的層次發展。聯繫當前國內外敦煌學研究的態勢, 結合我省敦煌學研究的優勢, 理事會對學會的業務範圍提出了修改意見。

會議對下一階段的工作作了部署: 2004 年學會的工作重點是召開“敦煌學研討會”。這次會議有兩個主題: 舉辦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的紀念活動, 開展相關的學術討論會。紀念活動與浙江省博物館共同舉辦, 屆時將採用展覽、學術報告、研討會、出紀念專刊等多種形式進行。在常老精神感召下, 成長起來了一批積極從事敦煌學研究的浙江學人, 他們正從敦煌語言文字、敦煌歷史、敦煌藝術、敦煌文獻的數位化等方面開展研究。因此, 這次會議也要突出“敦煌學在浙江”或“浙江與敦煌學”的主題。

理事會推舉秘書長許建平為省社聯理事候選人。

會上, 省社聯副主席連曉鳴對我會的工作及發展提出了要求: 學會應以“學”為依託, 重在“會”。“會”大家的研究成果, 讓不同門類的學科在“會”上互相碰撞, 彼此交流; 同時, “會”也給能年輕人提供一個展現的舞臺。還須加強與國內外同行的合作、聯繫, 採用“走出去, 引進來”的思路, 積極整合力量, 不斷壯大隊伍, 努力拓展業務範圍, 使我省敦煌學研究更上一個臺階。

敦煌研究院將舉辦“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張培君 (敦煌研究院)

2004 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 60 周年，同時也是敦煌文物保護事業的創始人、原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敦煌研究院首任名譽院長、國際著名畫家和敦煌學家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敦煌研究院 60 年的歷史是中國石窟保護研究發展的一個縮影。以常書鴻先生為代表的幾代敦煌文物工作者為保護、研究敦煌石窟這一中華民族和人類文化遺產而艱苦奮鬥、無私奉獻、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也是文物工作者共同的精神財富。為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60 周年暨常書鴻先生誕辰 100 周年，將由甘肅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文物局主辦系列紀念活動。作為系列紀念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由敦煌研究院承辦的“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將於今年 8 月 15-20 日在敦煌莫高窟舉辦。

敦煌研究院從 2003 年即開始籌備“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經過兩輪徵詢工作，確定邀請 120 餘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佛教考古、佛教美術研究專家、學者，以及有關石窟管理、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其中將邀請中國大陸的金維諾、王伯敏、姜伯勤和臺灣的李玉璿，日本的上原和、百橋明穗，美國的胡素馨等著名學者參加會議。被邀請與會的還有河南龍門石窟研究院、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雲南劍川石鍾山石窟文物保護管理所、山東青州市文物管理所和甘肅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炳靈寺文物保護管理所、武威天梯山石窟管理處等十餘處國內石窟管理、研究單位的負責人及學者。

目前會議籌備工作進展順利。會議籌備組已經收到國內外學者提交的論文 50 餘篇。這些論文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一是紀念常書鴻先生對敦煌石窟保護、敦煌石窟考古和藝術研究，以及對新疆石窟藝術探索所作的貢獻，二是從各地石窟的建築、造像、壁畫等方面討論與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研究相關的學術問題，探討石窟研究工作在新世紀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屆時與會代表將共聚一堂，圍繞上述兩個方面主題展開熱烈討論。在學術討論的同時，還將安排學者們考察敦煌莫高窟、玉門關、雅丹國家地質公園和安西榆林窟。

“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將是繼“1987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之後敦煌研究院舉辦的又一屆較大規模的石窟研究專題國際學術會，也是國內石窟單位參加最多的一次學術交流活動。相信此次學術會議對於增進國內外石窟研究學者之間、石窟單位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促進石窟保護管理與研究工作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在此次學術會議期間，還將舉辦常書鴻先生紀念雕像的揭幕儀式、“常書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展（常書鴻先生故居）”、“莫高窟北區考古新發現展”等紀念活動。同時，《常書鴻敦煌學文論集》、《常書鴻畫集》、《賀世哲敦煌石窟論集》、《施萍婷敦煌習學集》等紀念出版物也將問世與讀者見面。

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問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在昆明召開

中國唐史學會秘書處

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問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 2004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28 日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雲南大學召開。這次會議由中國唐史學會與雲南大學共同主辦，雲南大學歷史系承辦。本次會議除了改選中國唐史學理事會及會長、副會長、秘書長等領導人員外，還舉辦以“唐宋社會變遷問題”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擬從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各方面，全面系統地探討其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情況，以推進對這一學術問題的更進一步研究，促進唐宋史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這次會議將邀請國內外從事唐宋史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參加，從報名的情況看，已有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國家地區及大陸學者共百餘名赴會。會議期間還將組織與會專家學者赴昆明市內及大理、麗江等地考察參觀。

《甘肅考古文化叢書·佛教藝術》出版

王義芝

胡同慶、安忠義著《甘肅考古文化叢書·佛教藝術》已於 2004 年 2 月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

全書分為十三部分：一、天雕人鑿的佛國世界；二、多姿多彩的石窟造像；三、燦爛輝煌的壁畫藝術；四、石窟寺以外的佛教寺院；五、零散石刻造像；六、零散泥塑造像；七、零散石窟壁畫；八、佛塔；九、金銅造像；十、布絹紙畫、唐卡；十一、佛經書法藝術；十二、佛教用具；十三、雜項佛教藝術品。

本書是第一次將石窟藝術與寺廟及零散文物等合編在一本書中，試圖通過對佛教文物的全面研究，進一步揭示甘肅古代佛教文化特有的源流、內涵及功用。

該書圖文並茂，融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使讀者瞭解佛教是如何從一個外來宗教逐漸被中國人接受、喜愛，並和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變成中國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並盡可能說明甘肅佛教藝術在中國美術史中的地位。

The introduction of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

Jean-Pierre Drége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E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Marc Kalinowki (ed.).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 672 pp. + 61 ill.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is the result of a collective work conducted between 1998 and 2002 within the project « Divin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China » located at the Research Center « Civilisation chinoise » of 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PHE/CNRS 8385). The aim of the project was to mak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place occupied by divin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sciences during the Tang (618-907) and Five Dynasties (907-960)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Its basic sources were provided by the 9th and 10th century calendars and manuscripts on magic and divination found in the Dunhuang Buddhist cav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Most of the manuscripts are preserve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elliot collection) an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Stein collection). The project and the publication have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Taipei).

These documents include the oldest Chinese star maps and printed almanacs, horoscopes, dream books, treatises on hemerology, cleromancy, geomancy and physiognomy, as well as manuals of magical medicine, exorcism and talismans. They provide invaluable information on poorly known aspects of divination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make possibl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mantic systems that for the most part took shape under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he manuscripts were brought together and divided into group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s used by Chinese bibliographers at that time.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clarif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ontents of these manuscripts and the older traditions recorded in pre-imperial and early Han excavated texts. A general index has been compiled to establish necessary cross-referencing between the groups and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the manuscripts by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precise loca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fer a particular propitious terrain for situa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traditional sciences i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the Dunhuang area between the end of the T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What was the function of the calendar-makers and diviners at the prefectural and district level ? What were the procedures of apprenticeship and of the transmission of mantic knowledge at this level ? How did local traditions differed from those current at the capital city of Chang'an, in the astronomical bureaus and within the immediate entourage of the emperor ? What we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v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ligions like Buddhism and Taoism ? In the course of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authors have tried to better situate divinatory practices within the field of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that determined and still determine today the modes of communal life in Chinese society.

The book is conceiv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may appeal to the specialist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ut also to the historian of premodern China and, more generally,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It includes an introduction and ten chapters followed by a thematic index of the manuscripts, a 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and a

bibliography. Each chapter corresponds to a group of manuscripts dealing with the same subject. They are divided in two parts. Firstly, a presentation article that makes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selected manuscripts, describes their contents, and bring forward the most relevant aspects of these texts for the related field. Secondly, an individual note for each manuscript that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the filiation of the text, and a detailed table of its contents to serve as a reading guide of the original. This composition in two parts enables the reader who is not specializ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a given group of texts without having to consult the individual notes that are more specifically meant for those who wish to study the manuscripts themselves. At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the authors have included illustrations taken from the manuscripts and other sources.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By Marc Kalinowski (EPHE, Paris)

Uranomancie. By Deng Wenkuan (Research Center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Peking)
and Liu Lexi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Calendriers. By Alain Arrault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and Jean-Claude
Martzloff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Paris)

Hémérologie. By Marc Kalinowski

Cléromancie. By Marc Kalinowski

Oniromancie. By Jean-Pierre Drège (EPHE, Paris) and Dimitri Drettas (Research Center
« Civilisation chinoise », Paris).

Talismans. By Christine Mollier (CNRS, Paris).

Auguromancie. By Catherine Despeux (Institut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Paris).

Physiognomonie. By Catherine Despeux (Institut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Paris).

Iatromancie. By Donald Har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opomancie. By Marc Kalinowski

Index, Glossary, Bibliography

《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介紹

關尾史郎 (日本新潟大學)

2004 年 3 月,《西北出土文獻研究》の創刊號を,新潟の西北出土文獻研究會の編輯によつて刊行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新潟大學には,《西北出土文獻を読む會(西北出土文獻讀書會)》があり,1995 年の創設以來,一貫して精装本《吐魯番出土文書》に収録された〈五胡〉時代の文書に對する検討を行つてきた。また 2000 年には,新潟大學プロジェクト推進經費によつて〈新潟大學人文・敦煌研討班〉が発足した。後者は 2002 年から〈中國國內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の歴史學的・文獻學的研究(敦煌科研)〉に發展し,2004 年も活動中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活動の成果を公表し,國內外の敦煌吐魯番學の專家から有益な批判を仰ぐべく,《西北出土文獻研究》という學術雜誌の刊行に踏み切つたしだいである,創刊號の内容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岩本篤志(新潟大學大学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助手):羽田記念館所藏「西域出土文獻寫真」766・767『十六國春秋』考—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つて中村威也(東京都立大學大学院生):Ⅱ×10698「尚書費誓」とⅡ×10698v「史書」について—P.3871 隸古定尚書・勵忠節抄との掇合をめぐつて町田隆吉(櫻美林大學國際學部教授):「唐咸亨四(673)年左憧憲生前功德及隨身錢物疏」をめぐつて—左憧憲研究覺書(Ⅰ)

關尾史郎(新潟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吐魯番將來,「五胡」時代契約文書簡介

鶴田一雄(新潟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教授):敦煌出土の書跡に關する一考察

船城俊太郎(新潟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平安時代の日本漢文に見られる中國俗語の疑問詞三種—多少・爭・早晚

6 名の執筆者のうち 4 名が敦煌研討班や敦煌科研のメンバーだが,學外からも中村・町田兩氏が寄稿されている。兩氏とも,編輯・發行人である關尾の趣旨に賛同し,寄稿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れぞれ敦煌出土文獻と吐魯番出土文書を取り上げている。また關尾は,ロシア・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ならびに香港オークション出展にかかる 5 點の契約文書の紹介と分析を行つた。

このように學内の西北出土文獻讀書會や敦煌科研の成果ばかりでなく,廣く學外からも寄稿を募りながら,今後も年刊での發行を計畫している。次號以下では,敦煌科研や,編輯・發行人が關與してきた吐魯番出土文書のプロジェクトなどの成果を順次誌上で發表すべく準備中である。

國內外の敦煌吐魯番學の專家には,送付・贈呈する豫定だが,未着の場合は,電子郵箱: ssekio@human.niigata-u.ac.jp に,面倒でも聯絡を乞うしだいである。

2003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陳麗萍 (首都師範大學)

2003 年中國大陸地區的敦煌學研究，在 2002 年的基礎上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本年度所出版的敦煌學專著數略少於 2002 年，但其中不少著作是近年一些敦煌學專題會議的論文集，所以本年度大陸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專題研究為主。因為論文集較多，使本年度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數明顯多於上年度。據我們不完全統計，2003 年國內出版的敦煌學專著有 42 部，公開發表論文 579 篇。現將 2003 年敦煌學研究的成果分為專著與論文兩大部分撰成目錄如下，以供學界同仁查閱。其中論文又分為概說、歷史地理、社會、宗教、少數民族語言與文獻、古籍、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藝術、語言文字、文學、敦煌學數據庫建設、書序與書評、學術動態與紀念文、其他等 15 個部分，分類排列。因個人能力有限，疏漏在所難免，懇請專家見諒。

一、專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9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0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2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3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2 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編輯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4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2 月。
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7 月。
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三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7 月。
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八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6 月。
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九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7 月。
F. W. Thomas 編著，劉忠、楊銘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3 月。
楊富學著《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6 月。
王啓濤著《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巴蜀書社，2003 年 4 月。
李小榮著《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周紹良、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作家出版社，2003 年 3 月。
項楚著《駐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7 月。
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全 12 冊），廣陵古籍刻印社，2003 年 1 月。
[法]童丕著，余欣、張建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03 年 2 月。
湛如著《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王昆吾著《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3 月。
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潘重規教授九五華秩並研究敦煌學一甲子紀念》，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編《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 (第一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吳健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西魏》，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 1 月。
- 關友惠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晚唐》，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 1 月。
- 關友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3《圖案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 月。
- 關友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4《圖案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 月。
- 楊東苗、金衛東編著《敦煌手姿——敦煌高昌古格手姿白描 600 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 4 月。
- 黃征、江吟主編《敦煌書法精品選 (二)》，西泠印社，2003 年 1 月。
- 蕭默著《敦煌建築研究》，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年 3 月。
- 李最雄著《絲綢之路古遺地保存》，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 月。
- 潘雲鶴、樊錦詩主編《敦煌：真實與虛擬》，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 年 4 月。
- 陸其國著《風起大漠：敦煌紀事》，百家出版社，2003 年 8 月。

二、論文

1、概說

- 柴劍虹《近十年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新特點》，《文史知識》2003 年 5 期。
- Fan Jinshi《Building Dunhuang Academy into a Worldclass Antiquities Museum》，《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3 年 1 期。
- 劉正平《國外敦煌學及敦煌佛教研究概述》，《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3 年 2 期。
- 李正宇《敦煌學概述》，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顏廷亮《敦煌文化及其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顏廷亮《關於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問題》，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德芳《簡論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正宇《敦煌遺書曠世之寶》，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范開宏《敦煌遺書及其價值淺說》，《山東圖書館季刊》2003 年 2 期。
- 朱雷《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民間講唱文藝作品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紀的展望》，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馬德《以史論窟以窟證史——談敦煌石窟與敦煌文獻的結合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素《敦煌本〈論語〉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李并成《敦煌學與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李正宇《敦煌歷史地理研究百年回眸》，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楊際平《敦煌出土文書與社會經濟史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林和平《試論敦煌文獻之輯佚價值》，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新發現的文獻及其學術價值》，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羅培《徽州歷史檔案與敦煌古文化共性探悉》，《檔案學研究》2003 年 4 期。
- 楊寶玉《敦煌漢文文書分類目錄（索引）述要》，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周義壘《對敦煌學文獻歸類的探討與研究》，《河西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 李鴻恩《從中文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敦煌學的發展狀況與趨勢》，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府憲展《俄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出版》，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柴劍虹《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兼談學習潘重規先生在“新亞”演講的體會》，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韓惠言《甘藏敦煌漢文文獻概況》，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葉貴良《〈甘肅藏敦煌文獻〉殘卷未識原因初探》，《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陳國燦《敦煌藏經洞魏晉寫經擊年訂補——紀念姜亮夫先生編撰〈莫高窟年表〉六十年》，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嚴向東《有關敦煌古卷的幾件事》，《中外文化交流》2003 年 9 期。
- [日]石塚晴通《敦煌文獻中混入日本抄本及偽抄本》，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朱雷《敦煌研究院藏〈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真偽辨》，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榮新江《入海遺編照明眼——潘重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讀後》，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徐曉麗、鄭炳林《讀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兩件敦煌文書劄記》，《蘭州大學學報》2003 年 2 期。
- 鄭炳林、徐曉麗《讀〈俄藏敦煌文獻〉第 12 冊幾件非佛經文獻劄記》，《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高啓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郝春文《〈敦煌寫本社邑文書輯校〉補遺（四）》，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武漢強《敦煌祭文分類綜述》，《河西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
- 李錦繡《敦煌文書中的譜牒研究》，《文史知識》2003 年 5 期。
- 關長龍《敦煌本夢書雜議》，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陳國燦《略論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王斐弘《輝煌與印證：敦煌〈文明判集殘卷〉研究》，《現代法學》2003 年 4 期。
- 姚培鋒《紹興人與敦煌學》，《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趙和平《試論浙江敦煌學研究的特色》，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周文馨《敦煌夢——敦煌研究院三代領導者的奮博足跡》，《西部人》2003 年 6 期。
- 施萍婷《敦煌學雜談之一》，《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張弓《羅振玉與敦煌典籍研究——20 世紀敦煌典籍研究回顧之一》，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朱瑞芬《羅振玉與敦煌文獻檔案的當代意義關照》，《檔案》2003 年 2 期。
- 榮新江《狩野直喜與王國維——早期敦煌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王冀青《榎一雄與英藏敦煌文獻攝影——紀念榎一雄先生誕辰九十周年暨英藏敦煌文獻縮微膠捲攝影五十周年》，《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樊錦詩、蔡偉堂《奧登堡敦煌資料的價值》，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日]茂木雅博、孫曉崗《中日關於華爾納的評價》，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馮志文《論王道士及其有關的人和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振國《是是非非王圓籙》，《世界宗教文化》2003 年 4 期。
- 孫聞浪《20 世紀：西方列強掠奪我國文物知多少》，《文史春秋》2003 年 2 期。
- 郝春文《如何評價 20 世紀初期外國“探險”隊在敦煌的活動》，《文史知識》2003 年 5 期。
- 彭傑《近代新疆考古探險與敦煌寶藏外流》，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謝方《也談斯坦因與敦煌文獻》，《文史知識》2003 年 5 期。
- 周勁思《斯坦因與敦煌文物的流失》，《華夏文化》2003 年 3 期。
- 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險與中國文物的外流》，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姜洪源《中華文化肌體上的傷痕——華爾納盜掘敦煌壁畫》，《絲綢之路》2003 年 6 期。
- 姜洪源《俄殘軍安置敦煌莫高窟的經過及史實訂誤》，《檔案》2003 年 6 期。

2、歷史地理

- 袁延勝《也談〈過長羅侯費用簿〉的史實》，《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葉愛國《〈過長羅侯費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錢伯泉《墨離軍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孫繼民《S. 11453 與 S. 11459 文書的初步考察——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之一》，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盧向前《唐代敦煌吐魯番地區的戍與長行坊——驛傳制度向長行制度變化之一側面》，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潘春暉《P. 2979〈唐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牒判集〉研究》，《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劉進寶《“敦煌”名稱的含義》，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褚良才《敦煌地理及歷史沿革》，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劉進寶《漢代對敦煌的開拓與經營》，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趙評春《西漢玉門關、縣及其長城建置時序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李正宇《敦煌郡的邊塞長城及烽警系統》，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紀宗安《絲綢之路新北道考實》，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王宗維《漢代河西與西域之間的相互關係》，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李明偉《隋唐經營西域的重要戰略措施》，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陸慶夫《唐代前期對河隴地區的經營及其效果》，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李正宇、李樹輝《絲綢之路與敦煌》，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吳初驥《玉門關與玉門關候》，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吳初驥《漢代玉門關及其入西域路線之變遷》，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勞貞一《陽關遺址的過去與未來》，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閻文儒《敦煌史地雜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陳夢家《玉門關與玉門縣》，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馬雍《西漢時期的玉門關和敦煌郡的西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吳初驥《河西漢代驛道語沿線古城小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張德芳《漢簡所反映的邊塞防禦設施和烽燧制度》，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張德芳《漢簡所見邊塞地區的官吏組織與候望系統》，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竇俠父《敦煌兩關長城歷史文化初探》，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紀忠元、紀永元《兩關研究之思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 李并成《東漢中期至宋初新舊玉門關並用考》，《西北師大學報》2003年4期。
- 李并成《魏晉時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縣城考》，《敦煌研究》2003年3期。
- 錢伯泉《〈西天路竟〉東段釋地及研究》，《西域研究》2003年1期。
- 朱悅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圖經〉纂修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敦煌研究》2003年5期。
- 施謝捷《〈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匡補（一）》，《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2期。
- 李并成《盛唐時期河西走廊的區位特點與開發》，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空間運作》，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
- 艾沖《唐代河西地區都督府建制的興廢》，《敦煌研究》2003年3期。

- 趙貞《敦煌所出靈州道文書述略——兼論朔方韓氏對靈州道的經營》，《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鄭炳林《晚唐五代歸義軍疆域演變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歸義軍行政區劃制度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歸義軍時期敦煌縣諸鄉置廢申論》，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村莊聚落輯考》，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又載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 年 1 期。
- 李并成《敦煌文獻與西北生態環境變遷研究》，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侯仁之《敦煌縣南湖綠洲沙漠化蠡測——河西走廊祁連山北麓綠洲的個案調查之一》，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馮培紅《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日]森安孝夫著，梁曉鵬譯《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官印及其編年》，《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王豔明《瓜州曹氏與甘州回鶻的兩次和親始末——兼論甘州回鶻可汗世系》，《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徐曉麗《曹議金與甘州回鶻天公主結親時間考——以 P. 2915 卷為中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徐曉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多妻制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 李并成《有關王玄策事迹的一條新史料》，《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鄭炳林《論晚唐敦煌文士張球即張景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乜小紅《唐五代敦煌音聲人試探》，《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馮培紅《P. 3254v〈軍籍殘卷〉與歸義軍初期的僧兵武裝》，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陸慶夫《歸義軍政權與蕃兵蕃將》，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馮培紅《二十世紀敦煌吐魯番官制研究回顧》，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敦煌文獻中的職官史料與唐五代藩鎮官制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唐五代歸義軍節院與節院軍使略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陸離《唐五代敦煌的司倉參軍、倉曹與倉司——兼論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倉廩制度》，《蘭州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 馮培紅《唐五代歸義軍軍資庫司初探》，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唐五代敦煌地區的酒行、酒戶和酒司》，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唐五代敦煌官府宴設機構考略》，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又載鄭炳林主編《敦

- 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客司與歸義軍的外交活動》，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吳麗娛《試論晚唐五代的客將、客司與客省》，《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3 年 2 期。
- 吳麗娛《敦煌書儀中的賀官》，《文史知識》2003 年 5 期。
- 馮培紅《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周邊地區之間的僧使交往》，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王蘭平《敦煌寫本 P. 06062〈歸義軍時期〈大般若經〉抄寫紙曆〉及其相關問題考釋》，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王克孝、閻廷亮《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手實文書的編制與類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耿虎《也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和長安三年括戶——與孟憲實先生商榷》，《歷史研究》2003 年 1 期。
- 馮培紅《唐五代敦煌的營田與營田使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馮培紅《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與水司管理機構初探》，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金聖翰《唐代均田制下寬鄉的給田基準額》，《中國史研究》2003 年 4 期。
- 劉進寶《再論晚唐五代的“地子”》，《歷史研究》2003 年 2 期；又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3 年 4 期。
- 劉進寶《敦煌歸義軍賦稅制的特點》，《南京師大學報》2003 年 4 期。
- 劉進寶《關於歸義軍時期稅草的兩個問題》，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劉進寶《P. 4525（8）〈官布籍〉所見歸義軍政權的賦稅免征》，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種植棉花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楊秀清《敦煌——絲綢之路上的國際商貿中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鄭學稼《唐代物價散論》，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鄭炳林、徐曉麗《論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 2 期。
- 鄭炳林《敦煌西域出土回鶻文文獻所載 qunbu 與漢文文獻所見官布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外來商品輯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等價物》，《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3 年 1 期；又載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乜曉紅《從吐魯番敦煌雇人放羊契看中國 7—10 世紀的雇傭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 年 1 期。
- 杜建錄、吳毅《西夏手工工匠考》，《寧夏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3、社會

- 鄭顯文《唐代債權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師大學報》2003 年 1 期。

- 陳永勝《敦煌吐魯番契約中的契約形式與契約制度》，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毛漢光《敦煌吐魯番居民生存權之個案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陳永勝《後晉開運二年（945）寡婦阿龍地產訴訟案》，《蘭州大學學報》2003 年 2 期。
- 李正宇《敦煌遺書一宗後晉時期敦煌民事訴訟檔案》，《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陳永勝《敦煌寫本〈寅年令狐寵賣牛契〉中的瑕疵擔保制度》，《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3 年 3 期。
- 蘇金花《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 2 期。
- 郝春文《〈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幾個問題〉商榷》，《中國史研究》2003 年 1 期；又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3 年 4 期。
- 史江《宋代經濟互助會社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 年 2 期。
- 趙貞《唐五代“春衣”發放考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3 期。
- 李金梅、路志俊《敦煌古代的弓箭文化與現代弓箭運動》，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潘春輝《晚唐五代敦煌僧尼飲酒原因考》，《青海社會科學》2003 年 4 期。
- 高啓安《敦煌飲食研究劄記三題》，《蘭州商學院學報》2003 年 3 期。
- 高啓安《敦煌文獻中的“須面”——我國最早的挂麵》，《揚州大學烹飪學報》2003 年 1 期。
- 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宴飲坐向和座次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003 年 2 期。
- 趙和平《唐代書儀中所見婦人書劄》，鄧小楠主編《唐代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黃正建《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姚平《論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學術月刊》2003 年 7 期。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為決定論》，《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王晶波《敦煌相術與佛教占相內容異同論》，《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鄭炳林《俄藏敦煌文獻 Дх. 10787〈解夢書〉劄記》，《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陳于柱《關於敦煌寫本宅經分類問題的再討論》，《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楊君《淺論敦煌符籙中的“善鬼護身”觀念》，《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余欣《禁忌、儀式與法術——敦煌文獻所見中古出行信仰之研究》，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4、宗教

- 暨遠志《北涼石塔所反映的佛教史問題》，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潘春暉《北周武帝滅佛莫高窟免原因蠱測》，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聖凱《1990 年以來日本學界中國禪宗研究熱點述評》，《中國禪學》第 2 卷，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
- 楊富學、王書慶《東山法門及其對敦煌修禪的影響》，《中國禪學》第 2 卷，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
- [日]田中昭良《神會研究與敦煌遺書》，《中國禪學》第 2 卷，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
- [日]伊吹敦《早期禪宗史研究之回顧和展望》，《中國禪學》第 2 卷，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
- 程正《近十年日本學者的中國禪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第 2 卷，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
- 張先堂《唐代淨土教宗師法照與五臺山、並州關係新探》，《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古正美《于闐與敦煌的毗沙門天王信仰》，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楊秀清《唐、宋敦煌地區的世俗信仰——以知識與思想為中心》，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袁德領《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的轉經活動》，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冀志剛《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燃燈與唐五代敦煌民衆的佛教信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5 期。
- 楊君《從敦煌寫經看佛經在唐朝民間的來源及其流傳》，《甘肅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 蕭登福《敦煌寫卷所見受道教避穀食氣思想影響的佛典》，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楊森《與敦煌和尚獅子吼相關的幾個問題》，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中印文化對敦煌寺院的影響》，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轉向人間化的特點》，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鄭炳林、徐曉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闡揚三教大法師與敦煌相容性形成》，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書所見都師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鄭炳林《北京圖書館藏〈吳和尚經論目錄〉有關問題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日]上山大俊著，劉永增譯《關於北圖劬 76 號吳和尚藏書目錄》，《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鄭阿財《敦煌疑偽經與靈驗記關係之考察》，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鄭阿財《敦煌寫本〈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總《疑偽經典與佛教藝術探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安忠義《甘肅省博物館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研究》，《絲綢之路》2003 年 S1 期。
- 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劉楚華《讀敦煌〈觀音經注〉——P. 3904》，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日]衣川賢次《唐玄宗〈禦注金剛般若經〉的復原與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楊君《〈金剛經〉與唐朝民衆崇經活動及其觀念》，《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6 期。
- 蔡榮婷《敦煌本〈佛說妙好寶車經〉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何照清《〈壇經〉研究方法的反省與拓展——從〈壇經〉的版本考證談起》，《中國禪學》第 2 卷，中華書局，2003 年 5 月。
- 邵慧莉《敦煌本〈佛說玉耶女經〉初探》，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饒宗頤《敦煌悉曇章與琴曲悉曇章》，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日]京戶慈光《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黃征《敦煌草書寫卷〈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考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 景盛軒、徐之明《敦煌佛經詞語考釋》，《貴州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期。
- 蔣宗福《敦煌禪宗文獻詞語劄記》，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錢興《〈父母恩重俗文〉俗字辨》，《鎮江高專學報》2003 年 3 期。
- 張子開《敦煌本〈六祖壇經〉的修飾》，《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董志翹《敦煌文獻中〈往五臺山巡禮記〉——兼談日僧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及日記的起源》，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董志翹《敦煌寫本〈諸山聖迹志〉校理》，《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 1 卷所收部分漢文佛經殘葉出處考》，《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汪娟《敦煌寫本〈降生禮文〉初探》，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汪娟《敦煌寫本〈瑜伽佛禮〉初探》，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柳存仁《〈老子化胡經〉卷八的成立年代》，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劉屹《試論敦煌本〈化胡經序〉的時代》，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楊森《武則天至玄宗時代敦煌的三洞法師中嶽先生述略》，《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李重申、蘇萱、李金梅《敦煌遺書〈道德經〉與養生術》，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道教“三洞經書”和“三乘”考論》，《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王承文《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考證》，《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馮利華《敦煌寫本道經〈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校讀》，《西域研究》2003 年 2 期。
- 馮利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校讀——以斯二三八〈金真玉光八景飛經〉為例》，《宗教學研究》2003 年 2 期。
- 葉貴良《介紹敦煌所見的一部道教佚經》，《中國道教》2003 年 4 期。
- 黃夏年《景教〈一神論〉之“魂魄”探》，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5、古籍

- 許建平《〈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以第 11—17 冊未定名殘片為重點》，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許建平《殘卷定名正補》，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彭海《敦煌寫本〈古文尚書〉與漢代孔府壁本〈尚書〉淵源辨析》，《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許建平《BD14681〈尚書〉殘卷考辨》，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李索《英藏敦煌文獻 S. 85〈春秋經傳集解〉（殘卷）校正》，《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李索《敦煌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學術價值新論》，《四川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
- 劉長東《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考論》，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劉長東《孔子項託相問事考論——以敦煌漢文本〈孔子項託相問書〉為中心》，《四川大學學報》2003 年 2

期。

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項託問答書〉簡論》，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朱大星《〈文子〉敦煌本與竹簡本、今本關係考論》，《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張涌泉《試論敦煌寫本類書的校勘價值——以〈勵忠節抄〉為例》，《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屈直敏《〈敦煌類書·勵忠節抄〉校注尚補》，《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李梅《試論敦煌本〈文選〉的語言文字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 年 3 期。

范志新《俄藏敦煌寫本 P. 242〈文選注〉與李善五臣陸善經諸家注的關係——兼論寫本的成書年代》，《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李銘敬《日本及敦煌文獻中所見〈文場秀句〉一書的考察》，《文學遺產》2003 年 2 期。

楊秀恩《〈玉篇殘卷〉等五種材料引〈說文〉研究》，《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003 年 2 期。

6、科技

王愛和《英藏 S. 681v 與俄藏 Пх. 01454、Пх. 02418v 的拼接綴合與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劉永明《唐宋之際曆日發展考論》，《甘肅社會科學》2003 年 1 期。

鄧文寬《敦煌曆日與戰國秦漢〈日書〉的文化關聯》，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鄧文寬《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兼論曆譜與曆書的區別》，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孟嗣徽《五星圖像考源——以藏經洞遺畫為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陳明《“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 年 1 期。

叢春雨《論敦煌中醫藥學的內涵及其學術價值》，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吳紅彥、劉喜平《敦煌遺書中有關方劑學的文獻研究》，《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沈樹農《敦煌醫藥文獻 P. 3596 若干文字問題考證》，《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 年 2 期。

王杏林、許建平《S. 202〈傷寒論〉寫本校正》，《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王天生《敦煌石窟〈灸法圖〉特點及臨床價值探討》，《中國針灸》2003 年 11 期。

張儂、王文《西北民間挑擦放寒方法的淵源及發展》，《中華醫史雜誌》2003 年 3 期。

張承文、郭郡浩、蔡輝《敦煌遺書〈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探究》，《安徽中醫學院學報》2003 年 3 期。

王鳳儀、李生財、李立、王小榮、楚惠媛、席時燕《敦煌古方“紫蘇煎”對慢性支氣管炎大鼠血清、肺組織中 SOD、MDA、NO 含量的影響》，《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7、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

陸慶夫《歸義軍與遼及甘州回鶻關係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陸慶夫《金山國與甘州回鶻關係考論》，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陸慶夫《歸義軍晚期的回鶻化與沙州回鶻政權》，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陸慶夫《唐宋之際的涼州嗚末》，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陸慶夫《黨項的崛起與對河西的爭奪》，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林冠群《〈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與唐代吐蕃史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林冠群《漢文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失實部分”之研究》，《中國藏學》2003 年 2 期。
- 石碩《附國與吐蕃》，《中國藏學》2003 年 3 期。
- 趙曉星《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國藏學》2003 年 2 期。
- 蘇航《試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基層組織 tshar——以 Ch. 73. xv. frag. 12 和 P. T. 2218 為中心》，《中國藏學》2003 年 2 期。
- 陸離《吐蕃統治敦煌基層兵制新考》，《中國史研究》2003 年 4 期。
- 金澄坤《吐蕃統治敦煌的戶籍制度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 1 期；又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3 年 3 期。
- 陸離《有關吐蕃太子的文書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楊森《五代宋時期于闐太子在敦煌的太子莊》，《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沙武田、趙曉星《歸義軍時期敦煌文書中之“太子”探微》，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沙武田、趙曉星《歸義軍時期敦煌文獻中的太子》，《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楊富學《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回鶻之彌勒信仰》，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譚蟬雪《敦煌的粟特居民及祇神祈賽》，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徐曉麗《回鶻天公主與敦煌佛教》，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曾雪梅《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日]高田時雄《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胡曉鵬、楊惠玲《敦煌古藏文寫本〈吐谷渾（阿豺）紀年〉殘卷再探》，《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仁欠卓瑪《〈羅摩衍那〉的敦煌古藏文譯本和漢文譯本的比較》，《西藏研究》2003 年 3 期。
- 楊銘《四件英藏敦煌藏文文書考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 B159 窟出土回鶻文〈別譯雜阿含經〉殘卷研究（二）》，《民族語文》2003 年 1 期。
- 張鐵山《莫高窟北區 B128 窟出土回鶻文《八十華嚴》殘頁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 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三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民族語文》2003 年 6 期。
- 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過眼記》，《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張鐵山《莫高窟北區出土兩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楊富學《回鶻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2003 年 3 期。
- 楊富學《從出土文獻看漢語對回鶻語的影響》，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楊富學《居庸關回鶻文功德記所見 uday 考》，《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
- 吳其昱《敦煌北窟敘利亞文課經（Lechonary）詩篇殘葉考釋》，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聶鴻音《西夏文〈五更轉〉殘葉考》，《寧夏社會科學》2003 年 5 期。
- 劉文鎖《依盧文契約文書之特徵》，《西域研究》2003 年 3 期。

8、考古與文物保護

- 蕭巍《雞首灶與雞》，《絲綢之路》2003 年 S1 期。
- 張瑞峰《敦煌市博物館藏“通信校尉”龜紐銀印淺識》，《文博》2003 年 2 期。
- 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縣文化館《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簡報》，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張德芳《敦煌懸泉置遺址》，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勞幹《兩關遺址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向達《兩關雜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方詩銘《玉門位置辨》，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趙永復《漢代敦煌郡西境河玉門關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正宇《敦煌大方盤城及河倉城新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并成《五代宋初的玉門關及其相關問題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并成《漢敦煌郡的鄉、里、南境塞牆和烽燧系統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并成《河西走廊西部漢長城遺迹及其相關問題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正宇《新玉門關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并成《漢代玉門關新考》，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并成《唐玉門關究竟在哪里》，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正宇《陽關區域古迹新探》，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李并成《古陽關下的又一處“古董灘”》，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賈應逸《藏經洞遺書和闐佛教遺址》，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殷光明《從北涼石塔看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建造年代》，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日]百橋明穗《敦煌莫高窟早期窟試論——隋代窟諸問題》，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裴珍達《敦煌莫高窟編年試論——以佛光形式為中心》，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党燕妮、王雅紅《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圖中幾則地名及其有關問題考》，《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張小剛《莫高窟第 256 窟至正年間“大宋國”題記考釋》，《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沙武田、段小強《莫高窟第 454 窟窟主的一點補充意見》，《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日]山崎淑子《試論敦煌莫高窟第 217 窟》，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斷代研究綜述》，《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謝繼勝《莫高窟第 465 窟壁畫繪於西夏考》，《中國藏學》2003 年 2 期。
- 劉永增《敦煌石窟中與禪觀相關的幾個問題》，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金申《榆林窟象牙龕佛像及想觀攜帶式龕像》，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沙武田《關於莫高窟窟前殿堂與窟簷建築的時代問題》，《考古與文物》2003 年 1 期。
- 沙武田《莫高窟第 98 窟及其對曹氏歸義軍時期大窟的營建之影響》，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沙武田《關於莫高窟第 130 窟窟前殿堂建築遺址的時代問題——兼及“藏經洞”封閉的年代關係》，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馬德《宋乾德四年重修敦煌北大像的“二期工程”——關於莫高窟第 96 窟前第 2 層遺址的時代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陳菊霞《〈大唐伊吾郡司馬上柱國潯陽翟府君修功德碑記〉考釋》，《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風墓胡人“酒如繩”祓祭畫像石圖像研究》，《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劉進玉《敦煌石窟藝術應用顏料的產地之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3 年 3 期。
- 馬贊峰、郭宏、王蕙貞、李最雄、Michael Schilling《敦煌莫高窟第 85 窟顏色監測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3 年 2 期。
- 馬利《中國畫顏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上海藝術家》2003 年 1 期。
- 周國信《古代顏料確有氯化鉛》，《敦煌研究》2003 年 6 期。
- 吳榮鑒《敦煌壁畫色彩應用與變色原因》，《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3 月 1 日起施行》，《絲綢之路》2003 年 4 期。
- 張燕、孫建榮《樊錦詩解讀〈條例〉》，《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馬學禮《敦煌石窟安防工程建設的若干思考》，《警察技術》2003 年 6 期。

9、藝術

- 孫果清《現存中國古代孤本、珍品輿圖賞析（六）》，《地圖》2003 年 6 期。
- 王劍武《敦煌·永樂宮》，《藝術界》2003 年 3 期。
- 劉玉慧《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中國審計》2003 年 Z1 期。
- 王承植《外來文化交彙下的唐代琵琶音樂》，《戲曲藝術》2003 年 3 期。
- 莊永平《唐樂古譜節拍探求》，《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
- 莊壯《敦煌壁畫上的吹奏樂器》，《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 陳應時《論敦煌樂譜的節奏解譯》，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王克芬、柴劍虹《對敦煌舞譜研究若干問題的再認識》，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高金榮《高麗樂在敦煌壁畫舞姿中的反映》，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日]水原渭江《北京圖書館藏敦煌舞譜殘卷（No. 820）解讀》，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克芬《敦煌舞蹈壁畫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陳明《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霍秀烽《敦煌石窟藝術內涵及其價值》，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榮新江《略談于闐對敦煌石窟的貢獻》，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

- 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上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小琴、鍾瑜、孫宜生《想觀極樂世界 意蘊大千圖式——敦煌壁畫中的思維與構圖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胡朝陽、胡同慶《論敦煌壁畫藝術中的節奏感與韻律》，《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胡朝陽、胡同慶《敦煌壁畫藝術的美學特徵》，《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吳曉雲《從敦煌壁畫的傳神寫照中看匠心》，《瀋陽建築工程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 高明《高貴華麗 形神兼備——敦煌唐代壁畫考察劄記》，《西北美術》2003 年 4 期。
- 鄒鋒《敦煌唐代彩塑中敷彩的作用》，《裝飾》2003 年 2 期。
- 穆紀光《希臘“對偶倒列”與“東方維納斯”》，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黃文昆《十六國的石窟寺與敦煌石窟藝術》，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楊雄《敦煌西晉壁畫與敦煌壁畫》，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沙武田、魏迎春《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石窟藝術程式化小議》，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劉永增《莫高窟第 249 窟天井畫內容新識》，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元林《淨土思想與仙界思想的合流——關於莫高窟第 249 窟窟頂西坡壁畫定名的再思考》，《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日]八木春生《敦煌莫高窟第 257 窟研究一得》，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賀世哲《石室劄記——重新解讀莫高窟第 285 窟北壁八佛》，《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謝成水《莫高窟北周第 290、296 窟中國線法的形式及其意義》，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小盾《從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詰經變看經變畫和講經文的體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吳榮鑒《榆林窟第 29 窟普賢經變畫現狀考略》，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李月伯《從榆林窟第 3 窟文殊變普賢變看中原文人畫對敦煌壁畫的影響》，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日]宮治昭著，賀小萍譯《宇宙主釋迦佛——從印度到中亞、中國》，《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陳雪靜《迦陵頻伽起源考》，《宗教》2003 年 1 期。
- 王惠民《敦煌隋至初唐的彌勒圖像考察》，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李玉瑁《敦煌初唐的彌勒經變》，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豔雲《河西石窟西夏壁畫中的彌勒經變》，《寧夏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 嚴智宏《唐朝前期的藥師經變》，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豔雲《西夏壁畫中的藥師經變與藥師佛形象》，《寧夏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
- 海住《莫高窟華嚴經變相的考察》，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

- 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沙武田《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考察》，《中國藏學》2003 年 2 期。
- 謝生保《敦煌壁畫中的刑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3 年 3 期。
- 史成禮、金海峰《敦煌壁畫中的性文化——沙彌守戒自殺》，《西部人》2003 年 6 期。
- 劉健《莫高窟壁畫中不同時期的三幅〈夜半逾城〉的藝術特點》，《社科縱橫》2003 年 6 期。
- 闕延龍《千手千眼觀音的藝術特色》，《藝術百家》2003 年 2 期。
- 王伯敏《敦煌莫高窟壁畫山水五探》，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趙聲良《敦煌唐代壁畫中山水的空間表現》，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孫機《中國墨竹》，《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 5 期。
- 謝生保《試論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婆薢仙和鹿頭梵志》，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張小剛《淺析敦煌藝術的鹿野苑中瑞像圖》，《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沙武田《敦煌壁畫翼馬圖像試析》，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孫儒儔《石窟造型的民族形式——帳在石窟造型中的運用》，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陳康《敦煌壁畫射箭圖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3 年 4 期。
- [日]小山滿《敦煌隋唐紋樣之與龍門古陽洞》，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李迅文《西夏時期敦煌裝飾圖案藝術》，《裝飾》2003 年 5 期。
- 胡文和《四川石窟密教造像的考察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英]韋陀《敦煌繪畫中的取經僧形象》，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俞美霞《從辭賦談敦煌壁畫中的道教圖像》，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石窟藝術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10、語言文字

- 李如龍《漢語辭彙衍生的方式及其流變》，《語言文字學》2003 年 2 期。
- 蔡忠霖《官定正字之外的通行文字——從敦煌漢文寫卷看俗字應有之地位》，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王繼如《敦煌俗字研究法》，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朱鳳玉《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陳明娥《從敦煌變文看中近古漢語詞綴的新變化》，《寧夏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 李永《敦煌變文可能態句法結構肯定與否定的不對稱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 年 9 期。
- 劉敬林《敦煌文牒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鄭賢章《敦煌音義寫卷若干俗字重考》，《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張小豔《刪字符號卜與敦煌文獻的解讀》，《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姜亮夫《敦煌寫本隋釋智騫楚辭音跋》，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 徐朝東《與蔣藏本〈唐韻〉相關的敦煌韻書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許建平《BD.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黃耀堃、黃海卓《道齋與〈楚辭音〉殘卷的作者新考》，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張涌泉《〈說文〉“連篆讀”發覆》，浙江大學古籍所編《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 張金泉《莫高窟新出土的古韻書〈排字韻〉》，浙江大學古籍所編《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 洪藝芳《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通用量詞探析》，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蘇暘《敦煌契約中的量詞》，《江南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 竺家甯《敦煌卷子 P.3006 詞彙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曾良《敦煌文獻字義劄記》，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項楚《敦煌變文新校》，《駐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7 月。
- 武建宇《敦煌變文校讀偶得》，《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黑維強《敦煌變文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項楚《讀變隨劄》，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金榮華《讀敦煌變文雜記》，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吳蘊慧《〈敦煌變文校注〉校勘零拾》，《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期。
- 吳蘊慧《〈敦煌變文校注〉校釋拾零》，《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 年 2 期。
- 武曉玲《〈敦煌變文校注·維摩詰講經文〉商補》，《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黃征《〈變文字義待質錄〉考辨》，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江學旺《〈敦煌遼真讚校錄並研究〉校錄指瑕》，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趙紅《〈敦煌碑銘贊輯釋〉補校》，《語言研究》2003 年 4 期。
- 張先堂《敦煌寫本〈晚唐佚名氏殘詩集〉新校》，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楊兆貴《敦煌本〈鶻冠子〉上卷注研究》，《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又載《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 4 期。
- 趙紅《〈駕幸溫泉賦〉校補》，《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項楚《〈廬山遠公話〉新校》，《駐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7 月。
- 武建宇《〈廬山遠公話〉校記三則》，《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楊秀英《敦煌願文社會交際稱謂詞初探》，《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黃征、曾良、洪玉雙《敦煌願文補校》，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張小平《〈敦煌願文集〉校補》，《西域研究》2003 年 2 期。
- 羅宗濤《敦煌變文裏詈罵及咒誓的探討》，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日]砂岡和子《日本平安古記錄文中的“件”——與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公文比較》，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日]玄幸子《校訂敦煌變文資料上的一個建議——“个”的問題》，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關緒良《敦煌寫本 S.1725 號“日別”考辨》，《文獻》2003 年 3 期。

- 郝招《敦煌新本〈雜集時要用字〉中“相撲”一詞述略》，《體育文化導刊》2003 年 11 期。
- 唐賢清《近代漢語副詞“可煞”的演變規律》，《中南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又載《語言文字學》2003 年 7 期。
- 楊永龍《句尾語氣詞“嗎”的語法化過程》，《語言科學》2003 年 1 期；又載《語言文字學》2003 年 7 期。
- 康保成《元雜劇的“賓白”與“表白”》，《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4 期。
- 王紹峰《說“捉搦”》，《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張小豔《“寐”字考》，《語言研究》2003 年 1 期。
- 張錫厚《是“恨”，還是“恨”——重讀敦煌本〈十恨〉詩》，《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 蔣冀騁《“歹”見於敦煌文獻嗎》，《古漢語研究》2003 年第 4 期。
- 袁賓《唐宋“煞”字考》，《中國語文》2003 年 2 期。
- 葉愛國《釋“床”、“餅”、“緝”》，《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11、文學

- 胡阿祥《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本土文學述論》，《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2 期。
- 顏廷亮《一筆珍貴的中國古代文學遺產》，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
- 劉瑞明《敦煌文學藝術性先驅作用例說》，《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張錫厚《敦煌文概說》，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日]荒見泰始《敦煌的故事綱要本》，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王繼如《敦煌變文研究尚有可為》，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伏俊璉《上古時期的看圖講經與變文的起源》，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李小榮《釋家變文原初意義之推考》，《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尚永琪《佛經義疏與講經文、因緣文及變文的關係探討》，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何國棟《“雅”“俗”轉關鍵條上的重要一環——敦煌講唱、歌辭類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全寅出《唐代變文話本小說初探》，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孫步忠《俗講及民間講書唱書促成了白話小說韻散相間體式的定型》，《敦煌研究》2003 年 3 期。
- 車錫倫《中國寶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態》，《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又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9 期。
- 郭淑雲《從敦煌變文套語運用看中國傳統口傳文學的創作藝術》，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又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 黎蕾《目連文化現象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小盾《從越南俗文學文獻看敦煌文學研究和文體研究的前景》，《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 1 期；又載《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3 年 2 期；又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4 期。
- 王昊《試論敦煌話本小說的情節藝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 年 6 期。

- 全弘哲《敦煌講唱文學的口頭表演特徵》，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何劍平《〈維摩詰講經文〉的撰寫年代》，《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何劍平《敦煌維摩詰文學中的金粟如來》，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孫昌武《敦煌寫卷〈維摩詰講經文〉的文學意義》，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李樹輝《S. 6551〈講經文〉寫作年代及相關史事考辨》，《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王三慶《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王三慶《敦煌文獻中齋願文的內容分析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張承東《試論敦煌寫本齋文的駢文特色》，《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王國良《〈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探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黃征《〈降魔變〉殘卷考證》，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霍旭初《印度、龜茲、敦煌降魔變文比較——佛教哲理通俗化的衍變》，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日]砂岡和子《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降魔變文〉補校》，《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 杜貴晨《〈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源流考論——兼論話本與變文的關係以及“三國學”的視野與方法》，《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又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6 期。
- 李莉《試論敦煌本秋胡故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 年 5 期。
- 李莉《敦煌本秋胡故事結局探析》，《甘肅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4 期。
- 王曉平《〈萬葉集〉中的親情與孝道》，《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3 期。
- 歐天發《隱語與說唱文學之關係研究——以〈韓朋賦〉、〈武子胥變文〉為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謝海平《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整治措施》，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賈雯鶴《〈舜子變〉故事演變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
- 黃亞平《武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以敦煌變文為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楊挺《不存在兒郎偉文體和兒郎偉曲調》，《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又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6 期。
- 劉潔《從敦煌歌辭看中古時期中國女性的情愛觀念及表情方式特點》，《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項楚《〈敦煌歌辭總編〉佛教歌辭匡補舉例》，《駐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7 月。
- 許建平《伯三六〇二殘卷作者考》，浙江大學古籍所編《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 項楚《令章大師李稍雲》，《駐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7 月。
- 項楚《王梵誌詩中的他人作品》，《駐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7 月。
- 陳慶浩、朱鳳玉《王梵誌詩之整理與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陳學芬《應當重視歷代詠敦煌詩的研究》，《絲綢之路》2003 年 S2 期。

- 湯君《敦煌曲子詞辨》，《成都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
- 湯君《敦煌曲子詞與中原文化》，《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3 期。
- 張子開《敦煌文獻中的白話禪詩》，《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張子開《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宗教學研究》2003 年 4 期。
- 胡大浚《敦煌寫卷中幾首佚名詩考釋》，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徐俊《敦煌先唐詩考》，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劉景雲《後漢秦嘉徐淑詩文考》，《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絮之一》，《文獻》2003 年 2 期。
- 劉楚華《讀〈維摩詰經十四品詩〉》，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李誠《〈十吉祥〉研究》，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
- 趙望泰《敦煌遺書 S. 5744〈祭某詩文抄〉本事探真》，《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 王勳成《從敦煌唐卷看劉商〈胡笳十八拍〉的寫作年代》，《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諸葛憶兵《論唐五代北宋詞的“雅化”進程》，《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又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7 期。
- 張承鳳、李文莉《柳永詞律斟議》，《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期。
- 張鴻勳《敦煌賦研究的幾點思考》，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伏俊璉《百年敦煌賦研究》，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1900-2000（歷史文化卷）》（下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伏俊璉《敦煌賦及其作者、寫本諸問題》，《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 趙永橋《〈燕子賦〉與唐代司法制度》，《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3 年 2 期。
- 黃征《〈鶯子賦〉研究》，浙江大學古籍所編《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又載《敦煌研究》2003 年 1 期。

12、學術動態與紀念文

- 陳麗萍、江海雲《2002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樓笑笑《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教授紀念會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目錄》，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馮培紅《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位化國際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2003 年 2 期。
- 徐曉麗《21 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歷史學》2003 年 1 期。
- 姚永銘《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教授紀念會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 《“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藏學》2003 年 2 期。
- 姜波《夏鼐先生的學術思想》，《華夏考古》2003 年 1 期；又載《歷史學》2003 年 9 期。
- 周文駿、王紅元《王重民先生的學術成就——紀念先生誕生 100 周年》，《圖書情報工作》2003 年 6 期。
- 羅德運《王重民：敦煌學界的一代泰斗》，《圖書與情報》2003 年 3 期。
- 周文駿《王重民目錄學研究述要——紀念先師王重民教授誕辰 100 周年》，《北京大學學報》2003 年 3 期。
- 李玉梅《陳寅恪西北學の後現代主義色彩》，《寧夏大學學報》2003 年 5 期。
- 陳其泰《陳寅恪治史風格續議》，《中州學刊》2003 年 4 期。
- 傅傑《姜亮夫先生傳略》，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

- 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方一新《蔣禮鴻先生傳略》,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張涌泉《郭在貽先生傳略》,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雷公《納桑鋪路煥新彩 無私師表引路人——緬懷恩師潘絮茲》, 《絲綢之路》2003 年 1 期。
- 沈建中《敦煌石窟寫經生——記臺灣敦煌學一代宗師潘重規教授》, 《台聲》2003 年 3 期。
- 陳滯冬《夢魂三匝繞敦煌——紀念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壁畫六十周年》, 《四川文物》2003 年 2 期。

13、書序與書評

- 季羨林《〈敦煌學研究叢書〉序》, 《敦煌研究》2003 年 2 期。
- 姜伯勤《〈敦煌壁畫樂舞研究〉序》, 《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張廣達《〈敦煌吐魯番天文曆法研究〉序》, 《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柴劍虹《〈敦煌學通論〉序》, 《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蘇遠鳴、梁曉鵬《〈伯希和敦煌漢文文書目錄〉第 5 卷〈序言〉》, 《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趙逵夫《學海述航——寫在〈古典文獻論叢〉之前》, 《中國文化研究》2003 年 3 期。
- 曾昭聰《面對新世紀的訓詁學研究——讀〈訓詁問學叢稿〉》, 《中國圖書評論》2003 年 9 期。
- 范志新《構建文選學基礎工程的遺憾——略議〈敦煌吐魯番本文選〉》, 《中國圖書評論》2003 年 5 期。
- 郭淵《精心打造 意在創新——旅遊圖書〈敦煌鑒賞〉簡評》, 《美術之友》2003 年 6 期。
- 柴劍虹《普及敦煌文化的開創之作——重新認識〈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的歷史價值》,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 3 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凍國棟《評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 《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 年 3 期。
- 解梅《縝思明辨 洞見幽微——朱雷先生〈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評價》, 《西域研究》2003 年 1 期。
- 王素《讀〈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劄記》, 《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 1 期。
- 陳習剛《一部高水準的講過所制度的學術專著——程喜霖先生〈唐代過所研究〉讀後》, 《湖北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
- 韋寶宏《新世紀的學術關懷——評榮新江先生的〈敦煌學十八講〉》, 《敦煌學輯刊》2003 年 1 期。
- 張小貴《讀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 《歷史學》2003 年 5 期。
- 巢乃鵬《飛天裊裊會棲霞——讀〈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2 期。
- 王義芝《〈考證與辯析——西域佛教文化論稿〉和〈敦煌密教文獻論稿〉出版》, 《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14、敦煌學數據庫建設

- 劉華、趙雅潔、高大慶、趙書城《敦煌學數字圖書館遺書元數據標準的設計與結構》,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3 年 S1 期。
- 林世田、孫利平《IDP 項目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數字化》, 《國家圖書館學刊》2003 年 1 期。
- 李鴻恩《敦煌研究文獻資料主題分析與標引》, 《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向君、盧秀文《開發專題文獻數據庫為敦煌學研究提供信息保障》, 《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邵惠莉、沈子君《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開發與應用》, 梁尉英主編《2000 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紀念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 1900-2000 (歷史文化卷)》(上冊), 甘肅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 楊西寧、杜義濤、趙書城《敦煌石窟藝術元數據標準的設計及實現》,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3 年 S1 期。
- 陳任、魯東明、潘雲鶴《多維度對象數字化信息記錄技術研究》, 《測繪學報》2003 年 4 期。
- 徐文華、魏寶剛、潘雲鶴《基於紋理合成的圖像藝術風格學習》, 《武漢大學學報》2003 年 3 期。
- 劉剛、魯東明《敦煌壁畫的數字化》, 《敦煌研究》2003 年 4 期。
- 潘雲鶴、魯東明《古代敦煌壁畫的數字化保護與修復》, 《系統仿真學報》2003 年 3 期。

15、其他

- 王恬《人類四大文化的交會聖地——敦煌》，《中學地理教學參考》2003 年 Z2 期。
- 一凡《中國世界遺產之旅》，《語文世界（小學版）》2003 年 Z1 期。
- 石江年、魏爭光《敦煌壁畫和文書中的馬文化》，《安徽體育科技》2003 年 4 期。
- 楊俊《唐代葡萄紋花磚》，《絲綢之路》2003 年 S2 期。
- 張梅《敦煌鳴沙山月牙泉景觀的成因》，《絲綢之路》2003 年 S 期。
- 李滄《在探本求源中尋找出路》，《美術觀察》2003 年 10 期。
- 趙紅《論敦煌服飾的開發》，王亨通、顏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 豁然《陽關博物館正式開館》，《敦煌研究》2003 年 5 期。
- 王鵬鳴《論“敦煌餐飲形象模式”的可推廣性》，《甘肅科技》，2003 年 9 期。
- 賀榮敏《晚霞中的莫高窟》，《西北美術》2003 年 2 期。
- 高爾泰《敦煌四題》，《讀書》2003 年 1 期。
- 若塵《敦煌之旅》，《西部人》2003 年 6 期。
- 曹懷新《莫高窟敘述的秘密》，《首都經濟》2003 年 1 期。
- 雒社揚《〈敦煌魂〉三議》，《當代戲劇》2003 年 1 期。
- 王玉珍《談歌曲〈敦煌故事〉的分析與處理》，《美與時代》2003 年 10 期。
- 高耀峰《敦煌魔影》，《公安月刊》2003 年 15 期。
- 段兼善、吳允寬《敦煌傳統發新枝——段兼善繪畫藝術》，《絲綢之路》2003 年 9 期。
- 王無際《心向敦煌的永恒魅力——曾浩敦煌油畫作品初探》，《美術》2003 年 7 期。
- 盛新鳳《全息整合 多元對話——〈敦煌莫高窟〉（第二課時）教學設計》，《小學教學設計》2003 年 23 期。
- 楊根源《好一首優美的對話體散文詩——聽盛新鳳老師執教〈敦煌莫高窟〉》，《小學語文教學》2003 年 Z1 期。
- 于平、尚奮斗《敦煌女孩》，《西部人》2003 年 8 期。
- 葉文玲《平山鬱夫的“敦煌情結”》，《文化交流》2003 年 4 期。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 一、本刊由“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主辦，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主編：郝春文。本刊的內容以國際敦煌學學術信息為主，刊發的文章的文種包括中文（規範繁體字）、日文和英文，每年出版兩期。每年第 1 期的截稿日期為 5 月底，第二期的截稿日期為 11 月底。
- 二、本刊的主要欄目有：每年的各國敦煌學研究綜述（包括項目動態及熱點爭鳴與點評）、新書訊、各國召開敦煌學學術會議的有關信息、簡要的新書評介、對國際敦煌學發展的建議、重要的學術論文提要等，歡迎就以上內容投稿。來稿請寄：北京西三環北路 105 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金澄坤，郵政編碼：100037，電子郵箱：ykjin2000@163.com。
- 三、來稿請附作者姓名、性別、工作單位和職稱、詳細地址和郵政編碼以及電子郵箱，歡迎通過電子郵件用電子文本投稿。